

# 怎样读史之风庆轮

双方都明白，如果处于僵持，那必须想方设法摆脱僵持。两个对立的阶级，摩拳擦掌。一个经受了重创但逐步扳回战局。一个正在且战且退并意欲反攻。

这就是 1972 年重建工青妇以后总的形势。

在这背景下，无产阶级造反派们抓住了一次绝好的战机，利用“风庆轮”发动逆袭，趁着邓小平复出立足未稳且踌躇满志之时，打了周恩来邓小平集团一个措手不及，初期让他们陷于慌乱之中。

有些人觉得四人帮们要“国船国造”挺有嗨点。于是，左讴歌“国船国造”，右讴歌“小平同志的理性爱国主义”。反正，又扯了一大通，还是一样。

\*\*\*\*\*

为了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就必须向国外购买船只，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利国利民”是正确的废话。自打出现国家机器以来，人类干的任何一件事，必须利国利民。没有利益，就不会干。生辰纲也是利国利民的，问问从高俅到手下督工的马仔就知道了，没有老高整生辰纲，穷帮工拿啥吃饭呢？对吧。

河蟹暴力强拆，难道祸国殃民？不见得吧。比如今年广州的地铁规划，偏就某个穷逼密集的城中村没有安排站点。有左逼为民请命。他也不想，城中村那么多“淳朴”的农民小业主，看着地铁拆迁跟狼见到肉，猪见到糠一样，立马就把“腐朽无能”的“官僚资本”全给吓跑了。因为“官僚资本”现在不玩“暴力强拆”啦，想讹老子，没门儿。

同一件事儿，对某些人是祸国殃民，对某些人是利国利民。总之，Y 愣是不谈阶级，俺就一定认为，人类干的所有事儿，都是利国利民滴。

\*\*\*\*\*

为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早在 1964 年，周恩来就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XX 和 XX 并举”这种句型也是正确的废话。把话说全说满，是件很容易的事儿。自己造船，能满足所有需求么？全部外购，有那么多钱么？可见，“并举”，这是猪都能出的主意。这里亮出老毛的朵号，说老毛“同意”。怎么个同意法？老大一天到晚都会“同意”很

多事儿，一天到晚要签署很多文件。小秘捧着文件过来，CEO 看都不看就署上大名这潇洒劲。因为这必定是些不重要的事儿。Y 跟我“请示”，“发展远洋业务赚大钱，好不好呀”，我当然得说“好”，Y 再跟我“请示”，“边造边买，好不好呀”，我当然也得说“好”。为啥不好呢？这是正确的废话。老大能容忍正确的废话，不在于老大是傻逼，而在于，老大关心的不是要不要做，而是 Y 怎样做。

\*\*\*\*\*

20 世纪 70 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远洋运输也不景气，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的 20% 就能买来。于是，周恩来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经周恩来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四人帮”对此大为不满。

-----一艘万吨巨轮要 100 万，而我们的八八大发号只需要 9 万 9 千 8，九万九千八人民币！只有最后 10 艘了耶。面对低价，四人帮不为所动，显得很没品。反过来，拿着电视购物当耍猴看的观众们也挺没品的。

作者恶心四人帮，无非在表明，他爱玩电视购物。这里面有三件事是真的。第一，作者喜欢电视购物。第二，四人帮不喜欢电视购物。第三，船价确实降到 2 成，就跟电视购物一样，价格确实是 998。为嘛我那么确定呢？因为观众付的帐就是 998 嘛。所以前面早说了，我们不质疑尿料的“真实性”。998 就是 998，我信了。

但，尿料只提了这是“价格”的 2 成，至于是不是“价值”的 2 成，不好意思，俺只能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发挥了。市场经济越是成熟，那么凡是提及“原价打折”就越是扯淡。跟左逼们意淫老板们遵循价值规律完全不同，越是竞争充分，老板们对“价格”采取的就越是一种轻佻的态度。难道当今商场不是满目的“9.9 元”，“99 元”，“199 元”么？这不过是营销把戏而已，实际上，这套把戏最早正是从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老美那传过来的。在美国，真的很难发现不带 9 字的标价。

所以，我们质疑的不是“原价的 20%”，而是“原价”，到底是神马。运输业不景气，并不一定需要贱卖资产。河蟹去年远洋航运同样不景气，但中国远洋集团等大型企业提出的要求，竟是扩大提前报废船只的补贴范围，他们指出“原来很多海运船舶的报废期是 33 年，现在 18 年甚至 15 年船龄的船，就可以提前报废拆解，这样做虽然有点浪费，但航运业需要‘去产能，再平衡’。”面临危机的船业老板，“贱卖”不见得比“报废”更能回笼资金。前者还必须支付一系列的交易成本。除了交易税赋外，为了让二手船卖相更好，还得加上一笔起码的翻修费，并且不得不养着一批企图捞回水的销售员。

其实在 08 年经济危机中，民族逼大嚷抄底，事后又抄了多少底呢？洋老板们要么封存资产静候翻盘时机，要么就砸烂资产，还犯得着跟 Y 啰嗦讨价还价变卖资产么？

更重要的是，既然周恩来集团精明到利用资本主义价格杠杆牟利，那么航运市场不景气也必然导致货运价格下跌。此时，还真是“买不如租”嘛。为嘛一直租船的周恩来集团，这时候反而不坚定的走下去呢？Y在扯神马蛋呢？

\*\*\*\*\*

在购买外国船只的同时，我国也大力发展自己的造船业，风庆轮便是上海江南造船厂1973年建造成的一艘万吨巨轮。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拒绝购买贱卖商品貌似是件很没智商的事儿。但大多数人也不买“电视购物”的帐。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原价”是件不靠谱的事儿。那么，站在生产者的角度，反对购买贱卖商品，就更容易理解了。既然中国也在大力发展造船业，既然上海江南造船厂全体工人卯足了劲瞄准远洋船舶这个目标，那么“经周恩来批准，外贸部门动用贷款买了一批”老外的二手货，四人帮对此大为不满，就不仅仅是四人帮的情绪了，而是全体工人的情绪了；不仅仅是四人帮的利益，而是全体工人的利益了。

可见，阶级斗争从来不是无缘无故蹦出来的，也从来不是少数几个英雄人物在单打独斗，更加不是为了神马崇高目标和神圣道德展开的。河蟹史书越要渲染四人帮螳臂挡车，就越跟四人帮搅屎的巨大能量相左，就越清晰的暴露出当年激烈的阶级对抗。周恩来集团有他的群众基础，四人帮造反派也有自己的群众基础。于是，他们之间的对决，不可能是渲染的那种阴谋家和阴谋家的单打独斗，而是两大阵营，两个阶级为了各自生存而展开的大规模搏杀。际上，只要被卷入斗争，那么“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各阶级都很容易理解。

SOWHAT?! 理解了又如何?!

\*\*\*\*\*

交通部所属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买下风庆轮后认为：该轮的主机性能不适于远洋航行。规定其只能在近海航行。但在“批林批孔中”，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

-----有两个营销信条：“顾客是上帝”和“8成销售额来自2成顾客”。一眼就看出，这明明是两条对立的信条，这明明是足以让老板们灵魂和肉体分裂的信条。前者是幌子，后者是行动。后者直接导致，不是每个顾客都是上帝，不是所有顾客都“自由平等”滴，最核心的是，面对“大顾客”，所有“生产者”与之都不是平等的。于是，仅仅两条营销信条，就让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博爱，自个爆了自个的菊花。

回头看“风庆轮事件”。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就是上文提到的要求大批报废船只的精明能干的资本主义国企的前身）是江南造船厂的大客户。中远是甲方，江南造船是乙方。甲方吃乙方，市场经济每天都在上演的剧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嘛是“浩劫”？在这里可见一斑。灰头土脸的“乙方”，居然贴大字报，斗“甲方”。更为“浩劫”的是，原本应该跟着“甲方”狐假虎威的甲方工人-----风庆轮海员，也跟着贴大字报斗自己东家。（几十年后中远集团出了本《党委大事记》承认，当年中远海员为了支持国产船舶，也“强烈要求”风庆轮远航。对甲方老板来说，甲方工人联合乙方造反是件稀罕事儿，以至于在“大屎记”也得提一下，就跟古人记录哈雷彗星一样。。。）

资本主义不是这样玩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1. 甲方老板拽，甲方手下的奴才更拽，不学鲸鱼（鼻子出气）及吊睛白额虎（翻白眼）不能显摆自己给甲方打工。
2. 甲方老板拽，甲方手下奴才收了钱，态度多云转晴，有降低验收标准的，有及时通报验收状态让乙方尽快整改的。
3. 甲方老板急需乙方产品，指示手下工人与乙方共同实施工程，特事特办，甚至可以抛开甲方既有的流程。
4. 甲方老板拽，手下工人不买账，耐心细致跟乙方工屁共同实施工程。遇到问题，及时反馈给乙方工人，而不是马上捅给上头。

第4种，很少。大多数是1，2。也有部分是3。很正常。如果4居多，那市场经济就无法维稳了。只有十年“浩劫”，才能让4成为主流，那无非就是全国无产者联合起来。

风庆轮的船员，作为甲方职工，按照资的洗脑，他们应该骄傲自豪荣耀的以“消费者”的面目出现，他们有权利要求这艘船上的雷达是最好的，气缸套是最耐腐蚀的，轮机质量是最可靠的（下面读者会看到，这些部件统统出现故障）。总之，整艘船最好是365天走着也不带一个故障的。

对不觉悟的工人来说，最好是自己活少干，或者快点干完，搁家里一躺，爽！问题是，越幻想这样，就越无法实现。活儿真要是能“快点干完”，老板自然认为工资给高了，活儿给少了；轮船质量高度可靠，船员也该精简了，而且对船员的要求也降低了，工资当然也降低了。总之，只要幻想利用市场来“维权”，就越是遭到市场的报复。因为市场经济就应该让工人成为穷逼。

文化大革命，不是左逼热衷的“文艺大革命”，“戏曲大革命”。更加不是道德逼理解的神马“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发动的全民道德提升运动。要这样，还不如玩“五讲四美三热爱”更实际些。起码小朋友们都学会不随地吐痰。而陈永贵在务农时，肯定是随地吐痰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的明明是工人们完全彻底的摒弃整个私有制世代所带来的文化枷锁，这就是，一个穷逼要玩单打独斗，是绝对玩不转的。在新的“文化”体系下，穷逼在社会事务上积极进取，睚眦必报，分毫必争。

于是，醒悟过来的甲方工人，只能选择跟乙方工人站在一起。在资时代，中远集团和江南造船集团是买卖关系，或者是合伙关系。在社时代，这是全体劳工在一块做世界创伟业。这是咱们共同的事儿。让甲方乙方见鬼去吧，让“生产方”和“接船方”见鬼去吧。

\*\*\*\*\*

1974年4月，在大字报和大批判的重重压力下，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建造以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情况的技术状况，批准了远洋运输公司的申请，决定让风庆轮运送一万多吨粮食到罗马尼亚，5月启航。

这下倒是出乎了“四人帮”之流的意料。起初，他们曾大叫大嚷要求风庆轮远航，那是他们以为交通部不会批准，他们就可以随意诬蔑交通部。现在他们的提议批准了，又有点进退两难。因为他们对远航心里没底，说白了，先前的叫嚷只是政治手段而已。一旦真的要远航，上海亲信们赶紧变了口风。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声称：“有人故意下令远航，是要整我们，想要我们好看。”当时的市委常委、叫喊远航最凶的黄涛等人也一改以前的说辞，表示“风庆轮远航不该一下就跑这么远，风险太大，该先跑几趟近洋。”倒是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看法比他们的党羽更高明些，他阴阴地冷笑一声说：“风庆轮即使沉了，也是个胜利。”

-----作者在欣赏完电视购物后，换了个台，直播了张春桥“阴阴的冷笑一声”，于是作者也“阴阴的冷笑一声”，把这VCR录了下来。“阴阴”对“阴阴”，“冷笑”对“冷笑”，Y以为自个儿是西门吹雪。左逼也好右逼也好，不管神马逼，他们的历史观不过如此，充满鸟阴谋。

然而，全是阳谋。光在密室中策划的“阴谋”不大白于天下，那是没有意义滴。阴谋的共同目标就是变成阳谋。

有这么一群人，当咱们要钢铁工业大跃进时，他们说那就弄小高炉大炼钢铁。

有这么一群人，当咱们要农业大跃进时，他们说那就一块玩密植吧，还亲自站草垛上代言。

有这么一群人，当咱们要减轻贫下中农家庭负担兴办农村食堂时，他们说食堂随便吃。

有这么一群人，当咱们要重新调整集体和私人的关系时，他们说把集体分光吧。

有这么一群人，当咱们要清洗走资当权派时，他们说就按会计事务所的玩法清农村账目吧，从卫生纸到草稿纸，查了个底儿掉。

有这么一群人，当咱们要嗨起来斗翻走资派时，他们说那就按出身斗历史反革命，专打死老虎吧。

有这么一群人，当咱们紧跟毛主席战天斗地时，他们说必须以雕塑像章和舞蹈来表忠心，谁不服就弄死 Y。

有这么一群人，当咱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引导贫农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他们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全部自留地，杀掉私人养殖的一切动物，耗子除外。

于是，顺理成章的，同样是这样一群人，长期阻挠国产船舶实施远洋作业后，突然在 1974 年 4 月决定，让这艘万吨货轮满载一万余吨粮食执行远洋作业，启航日期是 1974 年 5 月 4 日。

也就是说，这艘自打 1973 年完工，一直被交通部用几条指标拒之门外不拿正眼瞅的轮船，突然被要求，执行满额负载极限航程的任务，准备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月。

今时今日，这群人装出一副无辜样，说自己无非在公事公办，顺应民意，群众既然强烈要嗨，那就嗨吧。还能指责老子神马呢？

这屎搅的当然无可挑剔。这水平确实值得所有穷逼学习。至于谈到“指责”，也的确无可指责。公事公办嘛。

风庆轮的远航作业，是甲乙方工人联手斗争获得的，得偿所愿，接下来就得争分夺秒的展开下一步的工作-----远航准备！

于是，就有了文中几位造反先锋队的对话。这些对话，必须是真的，包括“阴阴的冷笑一声”。因为这些都是几年后的四人帮审讯材料而已。

关键是，这又如何？上海市革委会这场内部谈话，难道不是一场求真务实的谈话么？

1. 难道马天水说的不是事实么？难道这不是走资派的挑衅么？作者你敢说这不叫挑衅么？Y 在挑战咱们浪迹社会这几十年的智商么？造反派从来不否认“夺取远航权”是对走资派的挑衅，那就麻烦老爷们也坦诚一点，勇敢一点，承认自己也在挑衅嘛。各阶级的生存斗争本来就谈不上干净，何苦偏就把 Y 嫖娼就说成玩爱情呢？

2. 难道黄涛说的不是事实么？如果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交通部”，纵使他们平时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忽视，贬低甚至阻挠国产装备的应用，那么在面对群众批判时，他们最应该

做的就是用一份实事求是的，稳打稳扎的，逐步推广国产装备的规划表来回应群众，以此表明他们洗心革面，跟群众携手奋斗的决心。于是，“远航不该一下就跑这么远，风险太大，该先跑几趟近洋”，这难道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规划么？交通部有么？尸位素餐，不该滚蛋么？

3. 难道张春桥的最后决断不符合事实么？简直让我们拍手称快。这才像个先锋队的样子嘛。先锋队就应该有这种一锤定音的勇气。船沉了，也是个胜利！这就意味着，风庆轮，无论如何，都要争取胜利了。还有别的含义么？还有啥想不通的么？还有啥好犹豫的么？还有啥好患得患失的么？没有了。接下来，那就是争分夺秒的准备准备再准备了。

只是，我们得指出造反派们此时本应该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咱们完全可以同样“公事公办”的指出，既然交通部老爷们过去一系列严谨的科学的坚持真理的不怕权贵的实验都表明，国产轮船无法远航，那他们短时间内推翻过去的结论，这就表明，过去的实验极有可能是个不严谨的不科学的不坚持真理的迫于权贵压力的。

在咱们忙于为风庆轮航行做准备的时候，希望周恩来先生对上面问题查一查，这问题很严重啊。咱们很忙，先不代劳了，但咱们会一直关注调查进展滴。咱知道老周身体不大好啊，但革命不等人，要保持调查进度哟，不行就委托别人搞嘛，咱知道老周下面人才济济。

若是这么一搅，在那不到一个月里，压力就不是光落到工人身上鸟。阶级斗争，可不就得有难同当共度时艰么？咱们很忙，Y也不能闲着嘛。造反派还是经验不足，人太实诚了。下面就会看到，这个失误，马上就被周恩来集团利用了。

\*\*\*\*\*

全部国产设备的万吨轮“风庆”号，第一次航行就远赴欧洲，这是前无古人的业绩。一些人胡说，这是要出“风头”，有些人则是忧心忡忡。同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截然相反，“风庆”轮全船上下，一片欢腾，象迎接盛大的节日。他们认为，“风庆”轮远航是大长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志气。

在出航前的时间里，船员们一边批林批孔，一边紧张而认真地进行准备工作，进一步熟悉船上各类设备。二副带领一个小组负责维护导航仪器，他们一丝不苟地学习技术。船上各类电器线路，交织如网。电机员朱恒福带领三名新手，从上到下，从船头到船尾，看着图纸，把每条线路的来龙去脉摸得清清楚楚。江南造船厂和各配件厂的工人也纷纷上船，帮助船员熟悉各种设备的性能。船员和工人对于我国自己建造的万吨轮，千抚摸，万端详，热爱船上每一个螺丝，每一根管道和阀门，每一个部件。这种感情，鲜明地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他们决心让“风庆”轮漂漂亮亮地跨入世界远洋船队的行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间一座友谊的桥梁。



-----屎料里没有这段。关于 1974 年 4-5 月，这篇屎料没有吐出更多的货。很简单，工人很忙，老板很闲，他们一面被迫靠边站，一面也乐于靠边站。装无辜，扮逍遥，这是他们的必杀技。于是，确实也没啥好写的。没办法，我只能把文革新闻稿搬出来。既然老板留了空白，我们就得填上。

社会化大生产，多工种协作很平常。不但是生产力发展所必须的，而且有助于形成穷逼的阶级意识。再孤僻的人，在项目压力下，在集体压力下，他也不得不融进这种气氛中，沉默的人慢慢话多了，木讷的人慢慢风趣了，共同的话题慢慢多起来了，情绪也慢慢高涨起来了。

所以当代工人对这篇新闻稿提到的场面非常亲切。比如“帮助船员熟悉设备性能”，在企业里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提供配件时，就经常发生。技术人员谁都不愿意自己设计的东西交给同事使用时出乱子，在交接时会不厌其烦的反复交代。

这表明文革的对立双方在现实中广泛存在。文革并没有无中生有创造出任何东西，相反，工人阶级一块做世界，在资时代是可以找到物质基础的。只是，资产阶级把工人分割在不同的公司而已。这种分割，在文革照样存在，比如周恩来禁止工人参加串联，要求工人造反派按照行业和工厂组建。比如李富春要求工人只能在 8 小时以外“闹革命”。

资时代的工人依照老板的私有产权而分割成相互撕斗的集团并被灌输一堆“爱厂”的洗脑，而周恩来集团控制下的工人也被分割为“造船方”和“接船方”，分割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二者并无异处。

阶级斗争就沿着这条缝隙猛烈爆破了。。文革的伟大成就在于它在一个时段内让工人的力量超过或者跟老板们打成平手，从而让当时的工人们比我们 70 后 80 后 90 后更加自信更加强悍。除此之外，参与文革的对立双方都不过是从属各阶级的普通人而已。

\*\*\*\*\*

交通部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两名干部——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文广随船工作，加强远航领导，并且任命李国堂担任风庆轮副政委，顾文广担任实习三副。“四人帮”的党羽认为，交通部来者不善，不怀好意，他们也在船上安插了他们的人，其中包括上海远洋分公司党委委员、风庆轮政委朱栋。

-----造反派的失误，周恩来集团也同样观察到，并马上娴熟的运用“掺沙子”的伎俩扩大战果。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残酷！在上一篇《读史》，我们同样看到，只要无产阶级稍一动摇，工青妇马上就重建了，只要无产阶级稍一动摇，一堆吴桂贤般的“劳模”就进了政治局。



当工人们得知自己生产的装备终于可以派上用场，那种激情无需多言；当工人们得知装备很快就要面临严峻的考验，那种压力也无需多言。工人们热情的投入到战前准备，是完全合理的。

但这只是斗争的一条线，这条线落在了基层，由于之前的坚决斗争，老板们已经从基层退却，龟缩到上层。基层完全是觉悟无产者的天下，是先锋队最坚固的根据地，此时此刻，基层的斗争早就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剩下的“战前准备”，从技术角度看工作量很大，但从政治角度，大局已定，基层工人完全可以搞定，是可以被完全信赖的。

深谋远虑的先锋队，必须把精力集中起来，牢牢盯住另一条线，即上层政治斗争。必须继续保持进攻的态势。可实际上，进攻被削弱了。

最明显的例证，当风庆轮启航时，码头上连个像样的欢送仪式都没有，报刊杂志也没有热烈的报道。这是严重的失误。是在这个月内一系列政治斗争处于下风的必然结果。

前面说过，风庆轮首次执行任务就是满负荷+极限航程。胜败难料。从儒家腐朽传统来看，所谓“谦受益，满招损”，宣传上不宜太过。周恩来集团抓住这点，企图从各方面施加压力，诱使无产者犯错。这是很一般的“疑兵之计”。在基层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唱着“四面楚歌”，让基层工作者精神紧绷，让意志软弱者倒下去。

撑开保护伞，掩护基层群众，这是先锋队应尽的义务。尽管风庆轮还没启航，尽管面临很大风险，但我们手中依然有多张好牌，足以在一个月乃至整个航行期间形成周恩来集团被动挨打的局面，至少也是一个对攻的局面。

1. 接船方的验收标准问题。完全可以把这议题炒热炒火，并且该议题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造船业，变成甲方乙方的问题，变成甲方乙方工人大联合的问题。再不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对立，用户和厂家的对立，这是周恩来集团所希望看到的。在产业链中，这个链条的用户，只不过是下一个链条的厂家。工人大联合，就是大伙一块把整个产业做好。这分明是波及全国产业的大议题，涉及到几千万的工人干部的利益，把他们卷进来，越乱越好。

2. 工业规划问题。在整个风庆轮事件中，工人们从不否认国产装备比进口装备在整体技术水平上是有差距的。相反，文革新闻稿中，说的最多的正是工人组织生产时面临的困境，以及“接船方”的诸多刁难。因此，先锋队根本不需要因为装备技术水平的不足而自我矮化。越是这样，周恩来集团就越是揪着不放。我们完全不需要讳言存在的问题，恰恰相反，先锋队务必启发群众，务必大鸣大放存在的问题。在下面我们还会看到“缆绳制造”和“船用柴油机制造”的例子。在毛主席 1957 年提出组建我国强大的远洋船队后，十多年过去了，船用配套工业之落后，这难道不是周恩来集团的责任么？难道十多年里把持造船工业规划乃至其余一切工业规划的不正是周恩来集团么？难道十多年里把持造船工业管理乃至其余一切工业管理的不正是周恩来集团么？

只要先锋队放弃了进攻，敌人就必定反攻。于是，我们看到，周恩来集团从容的部署了几条好狗来“加强远航领导”。资产先锋副政委李国堂 VS 无产先锋政委朱栋。真是针尖对麦芒。好样的。

在左逼【右而左】的文革评书里，历史如死寂一般，一边是已入涅槃无所不能的毛主席，一边是亿万屎壳郎般乱拱的屁民。而通过工人的眼睛，看到的分明是血海深仇，剑拔弩张，战鼓轰鸣！

\*\*\*\*\*

远航途中，朱栋组织船员批所谓的“买船问题”，说买船就是“崇洋媚外”。李国堂、顾文广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反驳说：在目前国内造船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的情况下，买一些外国船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用以摆脱长期租用外轮受制于人，使大量外汇流失的局面，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周总理决定并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怎么能说成是崇洋媚外？

-----周恩来集团如愿以偿的通过安插马仔，让远航的风庆轮剑拔弩张。掺沙子，不需要多，几颗就足以让你不爽。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有段时间，我司和另外两家一块联合调试，三家工人关系都处的不错。有天，其中一家派来一个中层干部，这家伙特别积极，一边催促自家的进度，一边也狗咬耗子催促我们的进度。当我们休息时聊些怪话，他还不乐意，说这会拖慢进度，还说搞明白我们进度延误的原因了，就是因为有些老油条在说怪话。我立马把领导的电话号码给他，让他告状。他拿了号码却犹豫不决，我们一块起哄，弄得他恼羞成怒，愤然离去。老板们只需要派出这样一个人，就足以让我们几天都不爽了。

风庆轮航行期间到底辩论了什么？屎料没有多提。大概就是“买船”是不是“崇洋媚外”。“你是汉奸”，“我不是”，“你就是”，“我就不是”。要这样吵，那不叫辩论，而是复读机。大鸣大放辩论显然不是这样玩滴。

组建远洋船队，是否需要进口，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答案。

一个车间的活儿忙不过来，就得要其余车间支援。一条产线满足不了需求，就得开新的产线支援。如果这样理解“进口”，显然没问题。没有工人会拒绝这种援助，不会管这叫“崇洋媚外”。

一个车间很受领导重视，其余车间靠边站，领导说，你们干不干都一个鸟样，散伙了最好。我有一个车间就够了。没有工人会喜欢这样的“进口”。这意味着，不但自己干的活儿毫无意义，而且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了。工人骂娘，“崇洋媚外”，这不过是口号，关键不在于“汉奸卖国”，而在于，除了那个车间以外，咱们都被废了。

屎料认为：国产船不能满足“需求”，而买船组建船队，以后不用花外汇租船了。

这逻辑跟老板认为某个业务由于研发生产成本太高不玩了改外购是一样的。这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周恩来集团打着“革命”的旗号却要玩这个把戏，就太装逼了。

引用周恩来经济秘书供述的材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

很明显，周恩来集团把“远洋运输”看成一桩“连本带利赚回来”的买卖。

再来一份屎料，问题就越发清楚：

1973年，美国把美元和黄金脱钩，引发世界货币体系的大震荡，李强就给周恩来打报告，提出要利用时机，扩大外贸范围，为国家多赚取外汇。然后李强搞起倒买倒卖黄金和商品期货，整个外贸的局面为之活跃。1973-75年间，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

单独看，挺不错的。但只要跟造船工业规划问题，跟把远洋运输做成大买卖的发展规划问题，汇总分析，周恩来集团已经在文革悄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经济路线。这是他们在文革搅屎的经济后盾。

与之相关的最后一则屎料，真相大白：

李先念表扬金融工作者：“你们干得不错，赚了30多亿美元。”30多亿美元比1972年的出口额还多，当时一年的进出口总额也就7，80亿美元。陈云坐镇，李先念给钱，外贸部办事，中联部打听。

任何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背后总是经济屁股的对抗。很明显，围剿文化大革命，绝非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无法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而是在其背后，早就围绕另一条经济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集财政，外贸，情报，内政于一体，里面聚拢了周恩来集团最精英的人物，相比之下，重建的“工青妇”，只是在积蓄后备军而已。

河蟹1978开始“改革”，左王（左逼之王）【邓力群】在1979年初即发表讲话鼓吹生产资料商品化，即在1年不到的时间内已经在理论上抛弃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生产资料的核心定论，其速度之快令人咂舌。在1979年中，组建中国信托投资公司，1981年即在日本发行债券。其现实中的资本化进程快如闪电（弱弱问一下左逼们，河蟹还叫“修”么？修修Y的腿毛吧）。

这一切高速的发展，不可能仅在 1978 年才起步。今天我们已经明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前赴后继的构筑了这样的资产阶级集团，其政治面目，从刘少奇模糊的右倾，到周恩来老谋深算的修正主义，再到邓小平彻底的资本主义，不断清晰，愈加鲜明。这一切，完全是在与中国无产阶级的激烈对抗中锤炼出来的。

在 1974 年，面对这样一个逐步恢复元气的敌人，无产阶级先锋队及群众，依然用“崇洋媚外”来认识他们，已显得苍白无力。这是他们犯下的第二个重大失误，也是最为致命的一个。下文还会给予重点分析。

\*\*\*\*\*

在风庆轮航行到罗马尼亚后，大家对出国以来的航程工作进行了总结。李国堂、顾文广认为，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不足，为胜利返航做准备。朱栋认为，风庆轮之所以能够远航，是批判“崇洋媚外”的结果，而李国堂、顾文广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从中国到罗马尼亚万余海里，屎料惜字如金，恍如司马迁再世。周恩来集团派的好狗李国堂一句“实事求是总结经验和不足”，官腔十足，臭不可闻。朱栋同志说的好，风庆轮能远航，这是斗争的结果！否则，以下的事迹全部是空中楼阁，只剩下周恩来集团为“连本带利赚回来”而开怀大笑,请看吧：

“开争气船，做争气人”，这是“风庆”轮船员在远航中提出的响亮的口号。他们怀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兢兢业业，艰苦工作，维护和保养好每一项设备，每一个部件，每一件货物。“风庆”轮装载着一万一千多吨大米，运往罗马尼亚。大米是很难运的一种货物，它在货舱里堆藏有两个月，由于船舶航行地区的纬度不同，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气候的变化。在各种险恶的环境里，大副周钧庭带领护粮小组的全体同志，坚持每天三次到五个货舱去逐个检查，根据不同的气温、舱温、米温，适当调节温度。他们在货舱里爬来爬去，累得满头大汗。两次经过赤道时，大舱气温高达四十度，护粮小组的同志日夜注意通风，由于船的水密性能良好，空气调节设备先进，米温始终没有超过三十度。一万一千多吨大米保质保量运到交了货。

在黑海之滨的一个港口，引水员上船时面露愁容。原来，“风庆”轮要去靠泊的码头，挤满了船只，航道狭窄。引水员十分担心主机和舵机的性能是否良好。事实给了他最好的回答。“风庆”轮在船员熟练的操纵下，左右、进退，每一个动作从发出口令到机器运转，都在几秒钟内就准确地完成了。当“风庆”轮安全靠上码头，引水员露出满意的微笑，连声说：“船好，船员技术也好！”

好望角航程，是对万匹主机的一次严峻考验。那时，主机连续不停地运转了十八天半，在绕过好望角时，又遇到了八级大风巨浪。好望角天气变化大，从来就有“好望不好过”的说法。这天，大风在整个洋面掀起万顷狂涛。浪乘风势，风助浪威，雷电交加，雨雾茫茫，整个洋面激烈地动荡，船只一会儿被托上高高的波峰，一会儿又钻进深深的浪谷。然而，

“争气机”照样铿锵有声地飞快转动，“风庆”轮劈风斩浪，高速前进。银色的飞鱼随着浪尖抛上甲板。船员们风趣地说：“海龙王见了新船新主人，送来的礼物我们收下了。”

曾经有人定出这样的清规戒律：“国产船不装备进口的雷达，不得航行远洋。”有人说：“国产雷达只能显出三哩内的影像，没有用。”事实给了他们最好的回答：在波涛起伏的太平洋之滨，一天傍晚，根据推算，五十哩外有几个岛屿。国产雷达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现出几个光点，在四十八哩外正是某岛。船长又移动荧光屏上的扫描中心点，五十哩外的目标也显现出来。在五个月的使用中，国产雷达性能始终良好，完全符合远洋航海的要求。

电罗经是指示航行方向的重要仪器。有人也曾经断定，国产电罗经经不起赤道高温的考验，不适应远航。然而，上海航海仪器厂工人想方设法提高了这种产品的质量，使电罗经的工作温度从摄氏四十五度提升到五十五度，这次航程中工作一百二十天，始终保持了良好的技术状况。

不是有人担心国产的收发报机灵敏度差吗？事实是：国产的收发报机频率始终稳定，灵敏度高，选择性好。

-----我们永远铭记这些工人前辈！

1974年8月，在风庆轮航行到罗马尼亚后，《人民日报》发了消息。张春桥准备发难，他严厉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刊登在报缝里，并下令在风庆轮回来后要刊登头版头条，要搞连续报道，要进行大宣传，因为这是“路线问题”。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要求上海宣传部门要大批“洋奴哲学”。《解放日报》请风庆轮组织几篇文章批判“洋奴哲学”。在“四人帮”的指示传到风庆轮上后，朱栋的气焰更加嚣张，肆无忌惮地对李国堂、顾文广进行迫害。

-----这表明，从风庆轮进入战前准备至到达目的地的5个月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传机器一直保持沉默。也许他们沿用“引而不发，后发制人”的战术，但面对咄咄逼人，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周恩来集团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

从军事角度，大战前的静默是为了迷惑敌人，在出其不意的方向突然发起猛攻撕碎防线。但风庆轮的远航，明明已经经历了长达大半年的激战。双方都已经准确无误把对方视为敌人。双方也准确无误的清楚日后必定再兴波澜。那么在之后长达半年先锋队保持沉默，是毫无必要的，这只能给周恩来邓小平集团以喘息的机会。事实上，接下来就会看到，敌人已经摸清了四人帮的套路。

毛泽东认为，文革应该缓一缓了。实际上，文革却只是刚开了头。如前所述，风庆轮事件所暴露的是深刻的阶级矛盾。

它所揭露的明明是在文革进行到第 8 个年头，工人仍然没能实现大联合，而被行业壁垒所束缚。周恩来集团盘踞的工业管理层，顽强的阻击着工人联合的趋势；

它所揭露的明明是在文革进行到第 8 个年头，在建国第 25 个年头，无产阶级在全国依然处于少数。周恩来集团盘踞的工业规划决策层，顽强的阻击着工人扩大的趋势。

有工人才有利润。但老板们清醒意识到，在文革的背景下，工人力量的增长对自己是灭顶之灾。周恩来集团必须全力延缓中国工业战线的进展，全力分化工人和贫农的联盟，同时企图在“贸易管理”，“期货管理”，“外汇管理”，“工业管理”上聚拢自己的班子，维持自己的力量。

建国前 17 年，阶级矛盾暗流涌动，并以党内斗争表现出来；

在文革前期，把阶级矛盾赤裸裸暴露在全社会之中，引起了社会集团的公开对立和分裂，这段时期“要文斗不要武斗”，“大鸣大放大辩论”，不是为了克服分裂，而是为了进一步暴露和加速分裂，要成长，必须先分裂！

那么到了 1974 年，这种分裂已经到了剑拔弩张山雨欲来的地步。此时，“安定团结”，“不要武斗”，只能是作茧自缚，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重大失误，最终沦为可怜的幻想。

从材料可以看出，即便四人帮指示要做好批判的准备，但他们一面声称这是“路线问题”，一面却落在“洋奴哲学”上。流于道德层面的批判，对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来说，用处已经不大，8 年的交锋，敌人已经摸清了先锋队的套路，步步紧逼；先锋队在声势上虽然还占上风，实质已在步步后退。

\*\*\*\*\*

“风庆”轮在毛里求斯停泊，正是当地春季初临的时候。华侨们把“风庆”轮抵港比作“春燕第一只”，扶老携幼地一批又一批登轮参观，在五星红旗下摄影留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华侨听说“风庆”轮上没有一件外国设备，激动得热泪纵横。他说：“踏上‘风庆’轮的甲板，就象踏在祖国的土地上，倍觉亲切。感谢毛主席领导得好啊！”当地的华侨报纸用显著地位和醒目标题，刊登“风庆”轮远航的消息和文章。“风庆”轮将要离港时，侨胞们还不断赶来，他们连摸一摸国产轮船也感到高兴。他们含着热泪高声喊道：“祖国的船，要经常来啊！”

-----屎料没有介绍风庆轮在海外受到华侨的欢迎。这里引用文革新闻稿，填补空白。

由此也可看到，当年对风庆轮宣传存在的偏差，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斗争方向上的偏差，用“民族自豪感”掩盖了周恩来集团的巨大威胁。



其实什么老华侨，什么扶老携幼，这种褒奖，有，固然是好事，但对崛起中的中国无产阶级意义不大。“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啊”，那你就回来嘛。很多当地华侨不过是小业主而已，衣食无忧，但又没钱没胆回老家，看到中国的船，买也好，租也好，造也好，只要挂上五星红旗，他们都觉得老家来人了，这种嗨点极低的夸奖，也就是餐后水果，当不得米饭滴。

对当代工人来说，神马“祖国的船要经常来”，这类煽情，还是省省吧。任何斗争，如果不是牢牢落在阶级利益之上，那是不能持久的，也必定被敌人利用并瓦解的。当然，我保证，左逼民族逼看到这段必定很嗨。不妨请读者自我测试一下。

\*\*\*\*\*

1974年9月9日，风庆轮在印度洋航行时主机增压器出现故障，不得不停下来修理47小时。美军飞机3次在风庆轮上空盘旋，情况十分严峻。鉴于情况严重，政委李国堂建议向公司发电报，而随船远航的“四人帮”爪牙朱栋不准，反诬李国堂“胆小怕死”，指使人在黑板报上辱骂李国堂是“假洋鬼子”。顾文广看不惯他们的行为，就提出这样做违反了不许在远洋船上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朱栋却在第二天亲自在黑板报上写出：“你们这些假洋鬼子，跳海去吧！”

-----装备出问题是稀松平常的事儿。有问题不要紧，能修就行。经常出差的都知道，现场遇到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可修复的，关键是有备件。在风庆轮出航前一个月，工人们已经储备了足够的备件。

前面早说过了，工人们特别是工人的先锋队们，本来就不需要为质量问题自我矮化。工人为人实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直到今天，我们还经常发现，明明工人加班加点干活，明明受着惨重的剥削，结果出了点质量问题，工人还弄得挺不好意思，貌似干了什么很丢人的事儿。工人越是这样，老板越揪着不放，显得理直气壮。

比如河蟹的《上海远洋航运志》就不厌其烦的记录了这些小事：

5月下旬，“风庆”轮航行印度洋上，发现主机有三个高压油柱活塞开裂，两个油头裂纹，一台分油机弹子盘严重损坏。经过抢修，更换零部件，恢复了正常航行。

6月17日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港再次加油补水，进行机械检修和精心保养后又踏上航程。

6月28日到达罗马尼亚康斯坦萨港。借助装卸货的机会，对船舶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更换备件，加以修理。

也就是说，在前半段航行期间，突发事故1次，常规维护2次。这到底有神马值得自惭形秽的呢？再加上1973年试航期间发生的“汽缸套磨损较大”，这到底是些什么让老板们趾高气昂的问题呢？分油机，汽缸套的故障，跟柴油质量是直接相关的。杂质多，腐蚀大，损



耗当然就大。这反过来也可以拿来批判周恩来集团的工业规划问题-----啥时候能让柴油工业大发展呢？

所以，不管是过去的工人还是当代的，一定要学会在技术问题上搅屎。其实老板们揪着技术，压根就不在于他们对技术有多严谨-----问问雷军小米手机刚开始返修率有多少就知道啦，技术问题都可以随着量产逐步解决滴-----而在于他们要压工钱，压奖金。老板们那才叫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人们心里总想着活儿要干的完美无缺才能“理直气壮”，那就活该受罪吧。

在返航途中，出的最大事故就数“增压器故障”了。增压器的工况比分油机更加恶劣，后者只负责分离重油的杂质，增压器还得压缩空气，而海面空气还带盐雾，腐蚀更加严重。以上发生故障的船用设备，直到今天依然是故障率最高的。特别是增压器故障，至今也不得不在海上漂流检修。

47 小时，不到 2 天，搞定重大故障，可喜可贺。周恩来集团的狗，果然忠心耿耿，立马就狂跳乱吠起来。工人最腻烦的就是那些一有问题就马上给领导打报告的家伙。我就遇到过一个工贼，明知道设备没调好，就强行测试然后把问题汇报给领导。还有一次，这位小工贼看到我们忙着解决问题，他不断想从我们嘴里了解出什么问题。我们没功夫搭理，他就打电话给领导说我们不配合工作。

可以想象，当时对周恩来集团派出的李国堂副政委最腻烦的，还不是政委朱栋同志，而是一直参与保养维护柴油机的工人们。要给老总发电报？Y 有病吧。这故障修不了么？罕见么？都不是嘛。有备件就行了，剩下就是投入人力去干，慌个屁。

美国灰机在上头侦察？那就更不应该慌嘛。Y 发电报到底为了神马？让祖国派辽宁号航母营救？还是索马里海盗营救？还是要派老爷们驾朵祥云过来？Y 扯神马蛋呢？

冷战时期，美帝苏修一直在监控全球海洋。风庆轮这种大家伙一个都逃不了。利用货轮掩护军事行动，大国们一直都在做。比如苏联就曾经让潜艇躲自家货轮正下方掩护着闯过了北约反潜网。

风庆轮为嘛在海上飘着呢？老美显然是吃不准，不然就不会灰过来查三遍。“形势严峻”？这是指李国堂先生的菊花吧。Y 一发电报，不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明摆着掀腩挨爆。

好狗李国堂先生要发报，显然不是为了“救”。正如我遇到的那位小工贼，给领导打小报告，也显然不是为了拉外援。这种伎俩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能瞅出来。

假设电报发出去，用本棍多年阅读文革史的经验，都能想象出来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拿着这份电报会怎样搅屎，更别提那些亲手与之交锋的造反派们。

咱不妨玩玩推理：

1. 外交抗议。周恩来集团盘踞的外交部立马跟打鸡血一样，大义凛然的向美方提出抗议。玩抗议，这个优良传统，从清朝到国民党到 21 世纪，一直保持着。50 年代，老美灰机经常犯境，犯一次就抗议一次。最后整的老毛都烦了，老毛说，尼玛能否凑够十几次再抗议一次呢？周恩来一听，主席英明啊，原来抗议也可以玩打包啊。。。。。。这次抗议什么呢？抗议美帝灰机骚扰中国轮船，本船执行和平运输任务，因故停航检修，美帝已经威胁到了检修进行。强烈要求美帝停止一切让事态恶化的行径，回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来。骂完后，风庆轮故障的消息也就传遍全世界，想必那位“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的老华侨得改口跟孙子讲国货不行吧。

2. 学雷锋见行动。就跟周恩来 50 年代“帮助”高岗一样，外交部抗议后，周恩来打拼在最前面，成鸟“帮助”风庆轮的雷锋一号。高岗在周恩来的启发教育下，深刻意识到自己真的好无耻给党添乱鸟，就自裁了事。同样，交通部老爷们也深刻意识到，由着群众自嗨也给总理添乱了。第二天下派工作组，调取风庆轮试航数据，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国产轮船不适合远洋。这是严重质量安全事故。尼玛谁在破坏制度呢？还有木有王法？谁？谁？谁？都他妈给老子关学习班。

3. 举一反三。风庆轮事件教训深刻。全国各行各业必整顿验收程序，从严把关。Y 没有 2 年以上质保都别想发货。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大批发达国家的好设备滞销，咱们的股神李强斩获颇丰，有的是钱引进，再干几年就翻本啦。

是不是真的呀？没法验证了。一切都让政委朱栋给毁了。屎料怒斥朱栋“反诬李国堂胆小怕死”。这还用诬么？把老美放一边，单说“朱栋不准”，李国堂就不敢发，Y 就是个怂蛋。Y 要真觉得必须得发电报，为嘛不来硬的呢？怕被扔太平洋当水鬼，对吧。周恩来集团的叭儿狗们明显清楚自己会犯众怒，这点他们倒不傻。

不过 75 年邓小平大整顿，第 2,3 点终成现实。只是政委朱栋把这计划推迟 1 年，真是小人物创造大历史。不知左逼【右而左】有何感想？

屎料还自曝了更有趣的一幕，周恩来集团的另一条好狗宣传委员顾文广先生看不惯极左分子的倒行逆施，就提出这样做违反了不许在远洋船上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

哟西！原来远洋船不允许大鸣大放大辩论啊！在 1966 年，李富春先生就号召全国劳模，在 8 小时内不得搞文革，下班了才搞，当然下班之前还会宣布加班滴。而在 1974 年，在文革进入到了第 8 个年头，周恩来集团依然实行这个政策。文革可以缓一缓么？文革可以“安定团结”么？完全不行呀，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很多盖子都没有掀起呀。革命是停不下来滴，谁的指示都不管用，矛盾只能越发激烈，不可调和，文斗只能变武斗。

一下子就让我们明白了好些事儿。要知道，周恩来集团制定的远洋船队方略中，起初是“买不如租”，后来八八大发号打两折，改为“造不如买”。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洋公司的职工们不得不给船东打工，Y要跟这几万苦逼讲，咱们搞的是社会主义，那是鬼都不信的。因为这几万苦逼一年到头跑国外，在洋船给洋老板打工，外加周恩来指示，要注意国际影响，少谈政治，全心全意干活。日本AV有个“时间停止”系列（本棍最爱），里面女优挨打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这帮苦逼真苦啊，比女优还惨啊。眼瞅着国内文革如火如荼，苦逼们穷则思变，也得琢磨事儿，于是才有了前面提到的，远洋海员（甲方）跟造船工人（乙方）一块儿走资派的大好局面。

既然压制四大民主，猪都能想象宣传委员顾文广先生也就是小学黑板报的水平。无非就是上面画小红旗儿，画小人儿，写小抄儿，比如红领巾小张今天要冲太平洋吐痰，小队长小周发现了，赶忙制止，我们都是祖国的花骨朵，讲文明讲礼貌，要让美国人看到了就损害祖国声誉啦。中队长小邓还说，这样就会被评最不受欢迎游客啦。

极左分子从来不买账，远洋几万里，就批它个几万里。极左分子政委朱栋在黑板上写着“你们这些假洋鬼子，跳海去吧！”真是掷地有声，让叭儿狗好没面子。

顺带指出，远洋轮船用黑板写大字报，这也是个创举。本棍发现，好多老工人家里用小黑板记账。俺大伯去世后，家里黑板有段文字：冰棍五分。本棍从小看到大。大伯真迹，以前没擦，以后也不擦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文革遗风。

\*\*\*\*\*

1974年10月到11月间，在上海，围绕“风庆轮事件”，各种参观会、报告会绵延不绝。“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组织风庆轮政委朱栋等人四处作报告达上百个场次，组织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借机批判所谓“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他们还组织《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风庆轮于1974年9月底回到上海。无产阶级掀起了宣传高潮。形势自然一片大好。但越是这样，先锋队就越得注意，敌人到底在何处。先锋队在4-10月沉默太久了，已给敌人留出太多时间了。繁荣未必强大。火力这么猛，打的却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这就打偏了。

\*\*\*\*\*

在风庆轮返回上海港后，江青等人利用此事指责国务院，说国产万吨巨轮早就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巨轮没有及早远航。由于“四人帮”掌握了舆论大权，自此以后，京沪报刊上有关“风庆轮事件”大批“卖国主义”的通讯、评论、诗歌、小说、故事、说唱，连篇累牍，连绵数月。

-----因为挡着周恩来集团要发财的去路，一批国产远洋巨轮被迫近海航行。江青准确的指出这点。屎料说四人帮“掌握了舆论大权”，这未必是实情，上文就提到，张春桥对人民日报只在夹缝刊登风庆轮抵达目的地很恼火，可见一斑。但四人帮在舆论上的实力，绝对是周恩来集团的心腹大患。没有他们反复搅屎，工人们就难以充分动员起来，搅出了足足大半年的好局，让老爷们退出基层，让工人局部的掌握了工业管理。

但接下来，先锋队却转去攻击“卖国主义”。理论上的偏差，直接导致实践上的巨大错误。从此，先锋队和基层脱节了。再强的“舆论”，只要不紧密结合阶级利益，都只能成为空话。周恩来集团要赚大钱，要当股神，要当大船东，这跟“卖国”还是“爱国”，八竿子打不着。这只不过是，他们要当老板。老板是没有神马“祖国”的，工人也木有“祖国”。在 70 年代，从国际到国内，阶级对抗已经远远超过“民族解放”运动的框架。沿用旧的理论体系，不足以指导工人运动了。先锋队和基层工人的脱节，给敌人留出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

\*\*\*\*\*

风庆轮结束远航回到上海港的时候，正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正进入最后确定国务院领导人选的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张安定团结，并为此酝酿新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不甘心。他们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反对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所谓的“风庆轮事件”，便成为他们认为已经导演成熟的一出好戏。“四人帮”抡起“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大棍子，叫嚷要掀“风庆轮事件”的“大后台”。

-----把风庆轮跟人大筹备联系在一起，无非想说四人帮在争权夺利。这对左逼很有杀伤力。想测试对方是否左逼，有个很快捷的方法，那就是骂他，Y 想当官，Y 是既得利益集团。左逼马上就会跳起来：我不想当官，我也没有利益。言下之意，挺老毛的都是一帮没有任何利益的也不打算斗争在最前线的“老百姓”。

比如【右而左】，曾有人调侃他是穷酸书生（对灯发誓不是我，哈哈），他就火冒三丈，说他 80 年代就给村里发钱，走共富道路，90 年代就在北京买大房子。还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混的不错。话里话外的意思，他在市场经济如鱼得水。总之，要不是跟毛大师有缘，他绝不会当左逼。

比如左逼【邈邈道人】，当过市长和房地产商，油画不错，弹得一手好钢琴。平时喜欢周游列国。这也是个财务自由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主儿。总之，要不是跟毛大师有缘，他也不会当左逼。

至于左逼【卢麒元】，就更别提了。自个明明给外资当金融高管，屡屡写文章为金融卖国痛心疾首。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呗，废那么多话。还是赵匡胤狠啊，后主一句“一江春水向东流”都得掉脑袋。卢麒元叨逼叨那么多汉奸卖国，肿么还没被杀头呢

“没利益”的也不全是左逼，比如吴敬琏，篇文章一上来就“既得利益集团”，俨然以无产者自居，文革时这孙子就觉得“越穷越革命”，至今还这德行，妥妥的文革余孽

不过卢麒元可贵在于喊出了左逼心声，他直截了当指出：泛左翼要谋求在野，并甘于在野。在这个问题上，左逼大师中再无比卢麒元更坦白的了。最近还看到一个小左逼的微博：真正的无产阶级应该是主动放弃对物的占有的觉悟的群体。这位爷更狠，明摆着要穷逼跳楼自杀。

四人帮应不应该利用风庆轮来搅四届人大的屎？显然嘛。几十万工人都嗨起来了，还不一鼓作气抢位置？

左逼为啥鼓吹“甘于在野”。因为朝堂都是他们自己人，也就乐得浮生半日闲。工人不行，建国搞了 25 年，人口都 8 亿了，工人还不到 8 千万，中央的人数就更少了。工人在上层建筑得有人。

无产阶级先锋队，就得夺权。

经过 8 年激烈交锋，四人帮和周恩来邓小平集团都相互明白对方是敌人。这点江青比老毛看的更清楚。“安定团结”是扯不上的了，光一个风庆轮，就能引起这么大的对抗，而且才刚开头，怎么能团结呢？跟谁团结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团结是以分裂为前提的。要团结，不妨让老周撕掉他的组阁名单，他干不？他不干，凭啥我干？

所谓“中华民族利益”，早就在四人帮和周恩来集团的残酷斗争中荡然无存。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全面转入资本主义的时代，是资无激烈对抗的时代，民族的统一战线早已消失。

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错误，不在于“篡党夺权”，而在于他们的理论武器相当贫乏：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拿着这种理论指导实践，无疑拿着匕首长矛冲击重机枪阵地。

这样的理论，在先锋队和基层工人之间撕开了大口子。工人嗨了半天，突然发现，咱们到底得到了神马？难道我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干革命，得到的只是揪出一两个“卖国贼”么？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在哪儿？无产阶级的大扩编在哪儿？难道我们加班加点劳作，只是为了出口气，为了让老华侨赞一个“毛主席领导的好”么？为了让老外称赞国产设备好么？为了让“中华民族”跻身民族之林，不如一块搓麻将吧，费那么大劲儿干嘛？

“已经导演成熟的一出好戏”-----屎料讲的不错！周恩来集团已经进化到了“股神”的阶段，从这个高度，回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贫乏理论，回看四人帮的斗争套路，那真的就是“导演成熟”了，再无新意了。

\*\*\*\*\*

李国堂、顾文广受到了批斗。王洪文下令扣留在上海，接受批斗。在此后 1 个月内，他们接受了大小批斗 25 次，被戴上了“假洋鬼子”、“洋奴”、“汉奸”、“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交通部派来的特务”、“风庆轮上的错误路线代表”、“攻击中央首长”等“帽子”和“罪行”。11 月李国堂、顾文广被押解回到北京，翌日，迫于压力，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宣布：李国堂停职审查、交待问题、接受批判；顾文广回宣传处交待问题、暂不工作、接受批判。回京后，他们接受大小批判 5 次。

-----只有“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风庆轮上的错误路线代表”两颗子弹打中目标，其余都是乱放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贫乏，直接导致基层的混乱，看这种杂乱无章的攻击就知道了。有经验的战士，一听枪响就知道对方训练程度如何了。像周邓这样的人，想必都在开怀大笑，早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批判”对这种人已经没用了。周恩来跟一个老龟命亲口讲，“坚持下去”。多贴心啊。神马“停职审查、交待问题”，都是扯淡，神马“接受批斗”多少次，也是扯淡。

那“批判”能否起到教育围观者的作用呢？也不行。核心依然是指导思想的时空错乱。很多人想不明白，靠远洋航运赚钱，肿么就是卖国了呢？搞个商品期货，大赚一笔，肿么是汉奸呢？

搅屎棍们成年累月对马恩列斯毛展开热烈紧张的探讨，有一点是越发清楚了：任何理论都必须落实到阶级利益上。经济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经济。我们根本不屑于谈道德，民族，国家之类的玩意，节约子弹，专打要害。

为嘛 Y 是错误路线代表？因为 Y 不让我们吃饱饭，吃好饭！我们造的设备，你们掐着不用，不用 Y 还让我们搞神马搞？搞出来不用，经费不落实，工资不涨，粮票不加，Y 想玩什么？我们不爽，你们爽，如果这叫正确路线那就见鬼了。

为嘛 Y 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Y 要玩天地君亲师，Y 让我们好好干活，不让我们玩四大民主，Y 安的是神马心？孔老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孔老二就是世界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你们爱玩管卡压，压经费，压编制，小马拉火车，一边拉一边还埋怨落后，你们全是吃人不吐血的剥削者。

围着经济屁股紧追不舍，工人才能嗨下去！否则只能累了自个。

\*\*\*\*\*

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借“风庆轮事件”逼迫中央政治局成员当场表态。江青煞有介事地提出风庆轮和交通部“崇洋媚外”的问题，逼着邓小平表态。邓小平绵里藏针地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看还是要调查一下哩！”江青逼问道：“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正色予以反驳：“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

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嘛！一定要写成赞成你的意见吗？”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跳起来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漫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后，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上一篇《怎样读史》中提到，对于政治局里面的斗争，吴桂贤已经司空见惯了。她说看不懂。但终归看出江青跟邓小平是敌对的。江青立场很鲜明，可惜对敌人杀伤不大。

在这场关于“洋奴哲学”的辩论中，邓小平根本不屑于正面回复，他把话题扯到了“平等”“合作”。这种自信根本不像是一个靠写检讨书蒙混过关重新复出的政客。四人帮对他的批判，已经毫无力度。

看上去江青等人对周恩来集团是没有幻想的，但其斗争，总显得还是把敌人当作犯“右倾错误”的“同志”。这令我们很困惑。

\*\*\*\*\*

毛泽东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

-----老毛的立场，从重建工青妇上就已经在动摇。论述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领袖在文革的失误乃至错误，并非本文的任务。但仅就“江青还这么闹”这句来说，老毛说的没错。如前所述，“逼着表态”，把政治局当“辩论会”，当“议会”，就是小孩玩过家家。关键是，你跟你的敌人坐在一间屋子，到底要怎么玩？阶级之间的谈判。如破裂，就有破裂的玩法，如不破裂，那就得达成新的决议。就我们的经验而言，在同一个阶级同志之间可以吵翻天，吵得面红耳赤，“愤然离场”都没问题，但跟敌人谈判，气氛反而应该淡定的多。

而老毛认为“风庆轮问题本是小事”，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不但是老毛的错误，还是四人帮的重大失误。正是先锋队自己，把大事弄成了小事，把阶级立场弄成了道德问题，把最激烈的阶级对抗弄成了最陈旧也是最无关紧要的“崇洋媚外”的问题。

反观李先念是怎么“解决”的呢？各位记住，在“股神李强”的那段中，李先念是“给钱”的角色，在周恩来集团的财神爷。李财神针对风庆轮做了如下指示：

1.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应当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加快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

-----第一段尼玛的官腔。周恩来集团笑咪咪的顺坡下驴的把风庆轮说成是否要“自力更生”的问题，四人帮是理解跑偏，而敌人是故意而为。当今河蟹早就说了，“集成创新”也



是自主创新之一，也就是哪怕买了部件自己装配，也属于自力更生。可见“自力更生”这玩意，是很容易搅屎的。

2. 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这是根本的。但并不排除在有利条件下从国外适当购买一些船只。因为我们现在的船舶太不够了，每年花掉租费就要三亿美元，数目太大。为了加强我国海上运输的能力，适当购买一些船只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东欧一些国家，生意还可以多做些。

-----这一段没有新意。周恩来集团一讲到生意，从上到下都没新意。表明他们最在意的正是“生意还可以多做些”。明明可以用“工业规划”，“工人联合”，“编制扩大”来对抗，但先锋队没有这样做，而是“洋奴哲学”。

3. 广东、上海以油为原料的大化肥厂，一旦建成就需要有较大的油船，如五万吨的或更大一些的，建议早点筹办。否则，只靠火车运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另外，我们也在进口矿石，装运矿石万吨船不行，吨位要大，也要考虑解决。

-----总之一聊到生意经，周恩来集团来来去去也就这几样。需求旺盛呀，供不应求呀。先锋队以不变应对不变就够了，关键在于发动群众，而且群众确实已经发动了。但先锋队没法提炼出基层群众的需求，转化为理论。

从李财神的指示，足以看出周恩来集团已经形成独立的经济路线，有独立的经济屁股。另一面，工人的实践早就蕴含了正确的理论萌芽，而先锋队却无法提炼系统的理论，那无产阶级就无法从根子上识别敌人，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认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产生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更多的有经验有工作能力的老干部进入了国务院的工作班子，为以后进行全面整顿准备了好的工作基础，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围绕“风庆轮事件”所进行的篡权阴谋。

-----四人帮为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指导思想，激战一年的风庆轮事件尘埃落定，无产者组阁失败。在转折性的1974年，无产者和老板们展开了大规模角逐，当年经济增长率为1.4%，是文革十年继1967,1968年之外最低的。每一次资无决战，都带来经济增长率的猛烈下跌。这是必然的，也是战斗激烈程度的指标。不同的是在67,68年，无产者获得了阶段性的大捷，而在1974年，无产者先胜后败。

此后，周恩来集团开始了为期 10 月的大整顿，大江南北无数忠于先锋队的基层群众被清洗。以无产者血肉所构筑起来的，正是被敌人称之为“拨乱反正”，“大有希望”的时期，1975 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11.9%。

周恩来集团在这个时期巩固了对工业的控制，变得更有自信，他们的胜利促使他们坚定了信念：当代资本的剥削效率是最高的，巩固资本主义是大有可为的事业。他们的目光更加远大，斗志更加昂扬。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安并于 1975 年底撤除了邓小平职务。

但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更重要的是，周恩来集团已经进入到了邓小平时期，这是最终蛹化成完全的资本主义的时期。新兴的经受了残酷斗争磨练的中国垄断资产阶级最终走上历史舞台。

## 棍子扯文革（十）清洗造反派

清洗一轮接着一轮，六八年末开始借清理阶级队伍之机清理造反派，然后是在“一打三反”（1970 年春广泛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中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紧接着是“两清一批”（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扬，批判极“左”思潮）运动。一轮比一轮残酷，三轮清洗之后，造反派死的死，关的关，基本上被一网打尽。造反运动陷入最低谷。这个过程中，文革派并没有采取神马有效的反制措施。

1968 年 8 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8.15 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钢、武船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造反派开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会议的会议纪要，记得是周总理主持会议，点名要李想玉发言，汇报武钢的生产情况。李想玉说，造反派在挨整，武钢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军代表在负责，责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讲话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中央首长们很难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江青插话说：“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像讲外国话。”回武汉以后，警司就将武钢钢九一三头头胡启生、张克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杨连成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头头”。这是曾思玉、刘丰在湖北、武汉抓得最早的造反派头头。

从此，整造反派头头就开始了。最先打击的就是跳得高的头头，他们开始排挤一部分不听话的头头，找一些他们认为“听话”的人来“充数”，取代造反派头头。他们就是在这时找出了董明会，推荐他去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安排到中共武汉市委任书记。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会这样的人，而是为了排挤钢九一三上层的造反派头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最有威信、最有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头头打下去。曾思玉等决不会因为胡厚民是党员而重用他、喜欢他，决不让胡厚民这样头上长角、身

上长刺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胡厚民当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一遇到整人的适当时机，胡厚民就会首当其冲地挨整。（《悲欣交集话文革》）

（哈哈，“周总理主持会议”。六八年八月就开始整造反派，算是大清洗的前奏。周仲尼随时压着文革小组，江青有话说不出。曾刘当然不会傻到看不出来这形势，于是开完会后立即采取行动，抓捕造反骨干。）

七二〇事件中央表态以后，一治造反派已经掌握了实权，成立了自己的生产指挥部，也解放了一线抓生产施工的领导干部，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派大好，比七二〇前造反派被打得无家可归好得多。（《悲欣交集话文革》）

（抓好革命，自然促进生产。文革期间生产形势最好的时候恰恰是造反派掌握生产的时候。这样的所谓动乱不是好得很么？周仲尼们也促生产，那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周仲尼们也抓革命，那是抓资产阶级复辟的反革命。周仲尼们以促生产为名，来压革命，就是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压制社会主义革命。）

曾、刘首长派空军一个姓张的团参谋长带了一工作组到一治“支左”。他们一进一治，开始和造反派头头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还帮助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他们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一治的主要头头都请到洪山宾馆住下来。另一方面，向一治下属的十几个县团级企业也派出“支左”领导小组，开始各单位只派几个人，后来就偷偷不停地增加人员。又派 7252 部队的一批人将空军的张参谋长换走，从各级领导班子里面不声不响地全面夺了造反派的权，开始对一治实行全面整顿，重点是为了打击我。（《悲欣交集话文革》）

（支左套路：先礼后兵。所谓礼，那就是客气地把造反骨干请到宾馆，参加学习班；不用参加生产，有吃有喝，多好。所谓兵，那就是直接抓起来，投进监狱。礼也好，兵也罢，都是把造反骨干隔离出来，把自己人塞进去占坑。）

1968年10月，派到一冶支左的师级干部叫于合，他来一冶根本不找我，一直在幕后指挥。他派一个姓杨的参谋长和我们打交道。我们称杨参谋长为“杨四号”。“杨四号”很和气地向我征询对一冶干部的使用意见，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一冶解放干部可以选用三人：一个叫卞道科，是位正处级干部，他干事认真负责，有长期领导施工的经验。第二个叫王长财，也是工人出身的处级技术干部。第三个是原一冶负责施工的副经理王秉政，但要做好他的转化工作，取得工人群众的谅解才能使用。我的意见，在成立一冶革命委员会时基本上被支左的军代表采纳。卞道科被结合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长财被结合为革命委员会常委，几个月后，王秉政也被任命为一冶抓生产的主要负责干部。但是，一冶革命委员会结合群众代表的人选，他们完全不问我，而是暗箱操作。一冶军代表和省委部分领导策划，拼凑了一个把我和一冶主要造反派头头完全排除在外的“革委会”。（《悲欣交集话文革》）

一冶成立革委会那天，我被软禁在学习班里，外面锣鼓喧天，我却蒙在鼓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看到了一冶革委会的成员名单，觉察到几个问题：

一、军队干部开始在一冶造反派中揪坏头头，他们开始算我们揪刘丰、通牒警司、揪幕后黑手的罪行，这个坏头头就是我曹承义。

二、一冶革委会的成立是在中央召开“815冶金工作会议”以后，在这次会议上，武钢就揪出了坏头头胡启生、张克勤等人。

三、曾思玉、刘丰等这时已经成为林彪死党，陈再道、钟汉华的第二，林彪体系的军政权对文革及造反派的仇恨甚至远远超过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悲欣交集话文革》）

一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军代表从来也不尊重被他们挑选出来当陪衬和摆设的造反派代表，凡属重大问题，都是军队干部或几个人事先研究，然后就作出决定。有时提交一冶革委会通过，不过是一种假象。一冶革委会只是他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一块招牌。革委会刚成立就名存实亡。军代表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敢于在各种场合为造反派群众讲话，这是军代表没有预料到的。（《悲欣交集话文革》）

1968年10月底，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参加这场运动的广大工人、学生却遭到了灭顶

之灾。曾思玉、刘丰自以为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揪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李迎希、孟夫唐、刘真、张华等革命领导干部，又开始整造反派了。

（《悲欣交集话文革》）

（嘴上宣布胜利，实际开始撤退。）

六八年十月，毛泽东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毛泽东传》）

1969年元月，我被一治军代表称为“坏头头”、“反革命”，强制送到驻扎在湖北应山的7252部队营房，开始了五不准的“学习班”。我失去了自由，被关进了“牛棚”。军代表把我和所谓的汉奸、特务、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编进了一个班，关押起来，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全面向造反派反攻倒算，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众秋后算帐，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文化革命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被他们夺了权，他们才真正是篡党夺权啊！把我从武汉、从一治赶到农村、军营，军代表“支左”的内容就成为彻底打击、镇压造反派了。一治一切反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在这些“支左”的军人支持下又死灰复燃、全面复辟了。

文革有一个真相被后来的主流媒体扭曲，说什么造反派用关牛棚的手段伤害了許多人，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技术权威、工程师、教授等。其实在湖北、武汉，恰恰相反，这些事全是官方干的，有不少是军代表干的，或是官方以各种名义操纵保守派一些打手干的。干这些事的从来不是造反派，因为造反派一直被当权者和保守派看作是“牛鬼蛇神”，所以把造反派头头、文革的骨干分子和所谓的“牛鬼蛇神”一起都关进了牛棚。我在应山军营牛棚被隔离关押、管制，和“牛鬼蛇神”编成一个班。早上起床“斗私批修”，背诵“老三篇”，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如同苦役。我为之奋斗的“革命委员会”成了镇压我的专政机构。（《悲欣交集话文革》）

（党政军走资派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是属于内部斗争；丫们整造反派，那是敌我矛盾。改开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平反，重享荣华富贵。官商学握手言和，一起发财。资复

辟的改开大道上，党政军保驾护航，各路资冲锋陷阵，师爷们歌功颂德。然后又联手镇压清洗队伍中残留的造反分子，联手谱写“大动乱的十年浩劫”史。这个地球上，恐怕从来没有，也不会再有河蟹师爷这样齷齪的物种了。）

正在党的九大隆重召开的时候，大约4月底，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鲜血为人民》传遍湖北省、武汉市，“反复旧”斗争在武汉已成燎原之势。武汉造反派群众在全市举行火把游行。在应山军营武钢、一冶学习班庆祝“五·一”大会上，有人偷偷告诉我武汉正在“反复旧”的情况，并且告诉我，中央已经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头头请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解决“反复旧”的问题。我立即决定返回武汉，参加“反复旧”斗争。

几天后我在武汉投入了造反派的“反复旧”斗争，活跃在武汉和一冶的斗争前沿。中央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5.27指示”发表以后，在军营办学习班的“牛棚”也跟着垮了，学习班也彻底失败了。但是曾思玉、刘丰又开始利用中央批评武汉“反复旧”的“5.27指示”和批判“北决扬”的“9·27”指示，肆无忌惮地镇压造反派。他们大整黑材料，在全省抓“五一六”“北决扬”，把数十万人打成了反革命。（《悲欣交集话文革》）

（走资见缝插针，办学习班就是个说辞，实际就是软禁造反头头，把他们统统隔离开来。造反群众群龙无首，组织程度直线下降，战斗力自然跟着下滑。

所谓“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思想异端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这个群体没神马组织性，松散的很，规模也很小，没多少人。不过，这并不妨碍走资们把它打造成有后台、有纪律、有纲领的反革命组织。然后，就可以借着清查北决扬的幌子围剿各路造反派了。

所谓“五一六”，本来是指一个叫五一六兵团的学生组织，后来被走资们搞成遍布全国的反革命组织。清查规模要远远超出对北决扬的清理。成为造反派遭受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镇压。也是整个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清洗。河蟹把刘少奇案吹成文革第一大冤案，俺们觉得很可笑。

1967年夏天，以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为首的一批大、中学生，组织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但此风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制止。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从此掀“五一六”掀起新的高潮。1970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在清查中，“五一六”的罪名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成为祸及全国的特大冤案、假案。在各地实际上以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为主要清查对象，在清查中大量出现严刑逼供，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难以统计。据称，在清查“五一六”中，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

看周仲尼一路的表现，不难发现丫的资屁股。五一六兵团炮打周仲尼，肯定是窥见了丫的资屁股。早在工作组时期，就有不少学生看出了周仲尼的屁股，在运动中打出批周的标语。五一六兵团也只是个代表，肯定还有其他人看破了周仲尼的真实面目。但肯定没有几百上千万的规模。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中央命令已经下达，“五一六”就是筐，啥都往里装。由此，走资派疯狂清理“五一六”，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场清理运动，周仲尼集团积极投入。

曾思玉、刘丰在武汉文革中，从来没有真正批判过一次刘少奇、王任重，从来没有搞过真正的革命大批判，而是大张旗鼓地把斗争的矛头向下，打击革命的群众，打击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造反派头头。在“两清一批”中，他们总结出“上联刘，下连牛，中间火烧头”的经验。向上联系刘少奇是假，向下连接牛鬼蛇神是真，“中间火烧头”就是叫造反派头头自己整自己。

这次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后，全部人员回到各自单位。我被一治赶到汉阳县西南边水洪口附近的一治五七干校报到，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湖塘野地施工建平房，搬运砖瓦沙石，与一治广大造反派群众隔离。而背后，军代表则继续抓紧整我的黑材料，准备将我按坏头头抓捕。这时，一治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头头，已经被他们整的整、抓的抓、关的关、赶的赶。他们为此用尽了一切手段。“支左”的军代表和被他们“解放”的干部重新恢复了他们的天堂，一切都与造反派无关了。他们拆除各处的大字报栏，用消防车高压水龙去冲洗、清除一切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的痕迹，用红色的油漆涂满他们想覆盖的一切地方，大搞所谓的“红海洋”。（《悲欣交集话文革》）

纵观这一阶段，造反派承受周仲尼们围剿连防守之力都没有，遑论还手之能。文革小组取消，文革派虽成为委员，却没有实质性的权力。最重要的军事、经济、组织各部门依然掌握在走资势力当文革派趁势发起进攻，但只掌握宣传部门，所以没能对周仲尼帮造成实质性伤害，也没能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导致了最终的败局，。

赏

## 暴躁皮皮：姚文元究竟“文痞”在哪里？



红卒按：清官，是左逼最爱宣传的对象；贪官，是右逼最爱讽刺的对象。值此反腐斗争红红火火之际，各路左逼无不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拍手叫好，奔走相告，歌颂明君的魄力与担当。很多不明所以的苦逼也是跟着瞎乐呵，甚至觉得翻身有望了，好日子就要来了。清官之清，就在于有清醒的阶级意识，有清楚的阶级立场，有清晰的阶级路线；对于破坏阶级利益的同僚，敢于斗争，敢于批评，以斗争批评求团结；对于破坏阶级利益的上司，敢于直谏，敢于顶撞，以直谏顶撞谋发展；对于破坏阶级利益的暴民，敢于镇压，敢于屠戮，以镇压屠戮赢稳定。贪官固然可恶，清官更为可怕，后者是一切造反者最凶恶的敌人。苦逼们，醒醒吧，认清你们的敌人是谁，认清你们苦难的根源何在，认清你们真正的出路何在。不要被左左右右的口水战蒙住了双眼，不要被贪官清官的情感戏搅乱了头脑。时刻警惕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阶级斗争不是无聊的游戏，而是鲜活的生死斗争；阶级分析不是庸俗的扣帽，而是深入的辩证考察；阶级立场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实践根基。一切苦逼，都要从对实际斗争的反思中，从对作为过去斗争的历史的阅读中，从对斗争进行总结的理论经典的学习中，成长起来，觉悟起来，坚定起来。下文为暴皮同志（博客名暴躁皮皮）所作，其中对资产阶级左逼吴晗进行了揭批，更对封建地主阶级左逼海瑞进行了揭批，对我们的无产阶级前辈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进行了分析。其中除对西洋知识分子的论述本博有不同意见外，余者甚好，故转发如下。

### 姚文元究竟“文痞”在哪里？

—

姚文元同志的名字总是同“文痞”、“四人帮打人的棍子”、“文字狱”联系在一起。一个人若只听那些宣传，必然得出这种印象：姚文元擅写迎合政治风向的大批判文章，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罗织罪名，靠着这一手吓得全国人民说话写字都胆战心惊。我找来他最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了读。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这所谓“掀起现代文字狱”的文章，原来是一篇批判反动辫子戏的雄文，无论文采还是思想都极佳，分明应该节选入中小学课本来让孩子从小背诵。

吴晗的戏剧《海瑞罢官》写的是什么呢？明朝土地兼并严重，以退休首相徐阶为代表的豪强地主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农民哭告无门。海瑞海青天来到当地当巡抚，铁面无私，不顾徐家在朝廷的强大势力的阻扰，平冤狱，退田地，杀贪官，除恶霸。民众感恩戴德，海瑞却被朝廷罢了官。

这是一个迎合封建士大夫趣味、格调低下的剧本。社会如此糟糕是因为当官的太坏，只要换个那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的“青天”过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恶人被抓起来了，人民又安居乐业了，民风又变得纯朴了，官场又变得清明了，民族复兴又有望了……当然，可恨的是皇帝身边老有坏人，老是让海瑞这样的清官不受重用……

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为何总是“昏君奸臣”多呢？为何让大家唏嘘的海青天这么少呢？难道是中华民族人种上有缺陷不成？还要问：既然海青天这么有效，那共产党当初杀官造反干什么呢？为何不拥戴某个青天呢？国民党的官员里不可能一个青天都没有。国民党当初也不该造反，满清政府里总也能找到某个青天的嘛。

姚写长文批驳吴晗，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这种戏剧实际上美化封建统治，同共产党主张的人民主体性格格不入，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放到正常国度都要受批判的。

如果只是如此，虽然该批判，也还不值得大张旗鼓。姚仔细研究了吴剧中涉及的历史（他研读大量明史资料，又向明史学者们请教，花了半年多才写成），发现吴晗这辫子戏还不是一般的丑。

原来当时的“民怨”并非地主强夺农民田地，而是官僚地主强夺中小地主的土地。顾炎武的《日知录》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自耕农阶层早已被掠夺得快消失了，官僚地主便开始掠夺中小地主。“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明朝最后就是因为大地主们不肯交税，朝廷财政崩溃，不得不变本加厉搜刮农民，于是在农民起义和外寇入侵中一命呜呼。海瑞在应天府巡抚任上，要解决的就是官僚地主霸占几乎所有土地，朝廷收不上税的问题。所谓退田，就是把那些田地从依法不纳税的官僚地主手中退给那些依法必须纳税的中小地主。

海瑞从来没有像吴剧中写的为穷苦的佃户、农民做什么主。对底层民众，海瑞的态度非常粗暴。有人来告状，他先看是地主还是平民，“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个“体”他解释说就是“贵贱之别”。他还称“江南民风刁伪”。为了解决这些刁民的“刁讼”，他的衙门前总是展出一批带枷哀号的犯人，让刁民们进门前先好好参观，体会下我大明衙门的威严。有胆大的还敢进来“刁讼”，就不分青红皂白先痛打一顿板子，待

灭掉那股刁气，变成在海青天面前嗦嗦发抖、说一句话磕一个头的良民了再问话……他还拿这当为官的优秀经验吹嘘。活脱脱一个戏台上的狗官形象，堪称当代法西斯监狱的鼻祖！

吴剧中写海瑞正气凛然，为民做主，把贪官撤职斩首，把徐阶的儿子也斩了。而历史上根本无此事。海瑞一个官也没杀过，也没撤过。他要解决的是中小地主失去土地，国家收不上税的问题，对代表国家的官僚地主怎会那么苦大仇深？

历史人物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海瑞是统治大明王朝的封建地主贵族中有头脑有作为、意志坚强的人物。他看到这个阶级日益荒淫腐化，正在掘自己的坟墓，因此对他的贵族同僚们进忠言，身体力行儒家道德来做表率，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尽自己所能为他们的统治秩序修修补补。这是值得赞扬的。但他从未想过这个阶级腐化的根源，从未对那套封建文化有过任何反思，相反，他以为国家崩溃是因为这套文化大家还学得不够。他限制官僚地主们的过度跋扈，为中小地主们做了一些好事，这也值得赞扬，但只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官僚大地主们的共同利益，并非像现代改革家一样因为同情、喜爱这些人们，要为他们的利益奋斗，所以他绝不会像吴剧中刻画的要为“民”报仇雪恨。“退田”也不能专美于他，他打击的那些官僚地主在位时也搞过，只是，就像当代有些人高喊反腐，最后却成了大腐败家族，被下一个“清官”揪住不放。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不好，所以在任上时都豪言壮语，颇想为民做主一番，卸任时却都赚得盆满钵满、安心养老去了。对小民，海瑞是非常粗暴残忍的，因为这些人对他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没有用处。大概是《官场现形记》中曾说，清官比贪官更可怕，贪官还有点人性，清官以为自己不贪，所作所为便都如圣贤般正义，对“刁民”毫不留情。海瑞在中小地主眼里是个海青天，在小民眼里，恐怕正是这种毫无人性的“清官”。

姚文列举了这些史料后说，“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吴晗的《海瑞罢官》不是一个普通的辫子戏，是一个极端反动的辫子戏！他作为明史专家，不可能不清楚历史，但他却如此委曲事实，将海瑞写成一个为穷人的利益挺身而出、与地主阶级殊死搏斗、赔上了自己仕途的大英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告诉人民，地主阶级其实是好的，与民众间不存在根本的阶级矛盾，只是有些官太坏，要相信“清官”能为民做主？这是要告诉人民，封建文化是没问题的，只要大家都去学海瑞苦心维护的那套封建文化，中华民族就能复兴？这是在暗示，皇帝太坏，应该把彭德怀这种现代海青天放出来“为民做主”？

我们再看看姚文开篇描述的当时的氛围。“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

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这样一个辫子戏，竟得到了如此肉麻的吹捧，没一个人指出它的荒唐。当真大家都爱辫子戏？肯定不是，只是所有批评的声音都被压下去了。姚文元在毛和江青、张春桥的保护下花了半年，写了这篇水平极高的批评，但所有报刊竟然一家都不登。上海登出来了，北京照样不登。毛打了招呼，仍然不登。出单行本，新华书店不卖！到底是谁在压制谁的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论自由就是吴晗们有发表辫子戏的自由，别人却没有批评的自由。他们的言论自由就是允许你批评，但辫子戏还是照演照捧。

彭真的《二月提纲》说姚文是“学阀武断”文风。但谁若不抱偏见去读一遍，就知此文的事实与逻辑都无可反驳，词句也平和，毫无可以称为“学阀武断”的地方。所以毛看到《二月提纲》后大怒，反骂为“反动学术权威”！这些类似吴晗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报刊上互相吹捧，操控舆论，又有政治后台，乌烟瘴气之极。姚文元文章就是捅了这股乌烟瘴气的马蜂窝。若不是毛保护，他当时就会被刘邓司令部当“现行反革命”、“汉奸儿子”、“攻击党的文艺政策的黑帮分子”抓进去整死。

姚文的末尾指出：【《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一切辱骂姚文元的人都驳不了此文主体部分，只好拿这个结论做文章，说这是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制造文字狱。吴晗说他发表剧本时“单干风”、“翻案风”还没发生，所以他没有政治影射的企图。但姚写得清清楚楚：“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吴晗和他背后的人群，尽管自称共产党，并且

相信自己确实是共产党，但头脑里那种“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不自觉地就充斥他们掌管的文化领域。姚文元只是指出了他们的本质。

我们请辱骂姚文元的人回答这几个问题：鲁迅因梁实秋的言论骂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是不是上纲上线、罗织罪名、阶级斗争思维、文痞？吴晗和他背后的那批人，是不是后来确实搞了“单干风”、“翻案风”？

姚把辫子戏提到政治高度批，批得对不对，这几十年的历史是最好的说明。当年反对“清官”的文革左派，从柯庆施、谢富治、康生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个个都很清廉，政敌挖空心思也找不到他们贪腐的证据。王洪文是年轻的工人造反派出身，在政治局里斗不过邓，心浮气躁，躲上海借酒浇愁，这是他们抓到的唯一“腐败”把柄。而四人帮失败后，一边是腐败盛行，一边是赞清官的辫子戏大行其道。而现实也正如海瑞那时候，铁面无私的“清官”逼工人下岗，防农民刁讼，从来没打算为他们做点好事。他们的“清”就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秩序，抑制官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过度侵吞。闹到最后，家族都坐拥巨资，让下一个登台表演的清官很为难……我们不能不佩服姚文元同志火眼金睛，早就把“清官”的本质揭示得一清二楚。

## 二

如果说姚文元同志的这篇文章有什么缺陷，就是只针对了吴晗的辫子戏本身，没有展开对海瑞所维护的封建文化的批判。直到文革末期的“评法批儒”才补上。我在这里岔开谈谈。

明王朝的崩溃，归根结底是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文化的腐朽性。这种儒家文化压抑人性，把整个民族变成僵而不死、毫无生命力的东西。我们不谈那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上的死气沉沉，就以最现实不过的朝廷政治举例。儒家文化编造出了“昏君奸臣”的历史观。譬如躲在深宫抽烟片、几十年不见大臣的万历皇帝，被视为昏君典型，仿佛明王朝是被他害的。其实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点都不昏，起码文化修养不会比任何骂他的“贤臣”们差。一个皇帝的教育，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小时候，应该常常跑出去游玩，回来后气喘吁吁地告诉老师，他在外边看到的新鲜事物，老师围绕那些事物向他讲述各种人文知识；他周围应该有精选出来的贵族孩子和他一起上学，作为他的玩伴；大一点，他应该练习骑马射箭；到快成人时，就应该去兵营里和士兵军官们呆一起，他作为一个皇帝没必要学太多文化，有空时由随身的学者们慢慢讲授些就好；成人后，他应该花很长时间巡视边疆，在军队中树立威信，这是他作为皇帝的本职；他的后半生，如果愿意，可以在征战中度过，如果不愿意，专心于国内事务也可，只要他注意保持军队对他的忠诚。但万历受到的儒家教育是这样的：儿童时，他每天在宫里背四书五经，偷懒了犯困了犯错了就像每个私塾里的孩子一样挨打；没有孩子来陪他玩，没有同龄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了少

年时，他有了点自由，放纵了一下，和一些近侍饮酒取乐了一晚上，立刻遭到最严厉的训斥，太后说要废他另立，他苦苦哀求才得免；十四岁时，他们就给他找了个十三岁的皇后，宫女的数量就更多了，他可以自由满足性欲，他们也希望他多发泄性欲，好多多传种接代，但他没有爱情，只是个生育机器；长大后，他希望按四书五经里教导的那样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当个好皇帝，但立刻发现这是无法做到的。他想去视察边疆、检阅军队、整顿国防，不行，国君轻动，不合体统。他想巡视各地，接触人民，不行，那是劳民伤财。他想去宫门外溜达，散散心，不行，立刻就有言官上本斥他耽于逸乐。他只能躲在宫里，对着山一样的奏折批个不停，而这也不行。大臣中因籍贯、亲属、你提拔我、我提拔我形成了各种党派倾轧，个个都上奏称政敌是奸臣，不管他怎么批示，总有一派骂他是昏君。他严厉批示，要制止这种闹剧，立刻有大臣上本称他不虚心听取臣子意见，像个桀纣。他被惹得火起，把上本的臣子拉到殿外杖打，但被打的臣子觉得很光荣，更多的奏折送上来来了，更多的臣子跪在殿外求打，以示对昏君的抗议。不久御史大夫们又上本，称被打的臣子都是忠臣，要皇帝重新启用，他无可奈何只能准奏。万历要当个好皇帝的雄心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闹剧中消耗殆尽。最后，他学乖了，你们不是动不动就以集体罢工来要挟我吗，我也会啊，我躺在宫里抽鸦片，任你们百般骂，就是懒得来理你们。他也不是当真万事不理。日本侵略朝鲜，他立刻下令出兵援朝。他只是不堪再受那群大臣折磨。他本来还有另一条路，学秦始皇，坑杀一批天天在那玩昏君忠臣游戏的大臣，而后检阅军队，提拔合意的人，按自己的方式治国，但儒家教育把他杀人如麻的祖先的勇武全都洗去了。他只能窝囊地躺在宫里抽鸦片。

一次殿试中，他非常悲愤地出了这么个题目：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我们不知道当年的进士们怎么回答的，但肯定没一个有用的，不然万历也不用躲进深宫抽鸦片。我现在就为万历解答下。因为那套儒家文化制造出的都是畸形的人。他身为皇帝，却被周围的社会逼成了一个畸形的傀儡，活得毫无尊严，人人都试图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他。那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就更别提了。西方的知识分子的一生献给在各种精神领域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的生命为人类拓宽对世界的认识作出了贡献。他们使人类从短暂的生命向永恒的生命迈进。而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一生，围绕着科举、当官、买地、纳妾、传宗接代，而后逼自己的孩子再科举、当官、买地、纳妾、光宗耀祖……他们行为卑下，和市井之徒毫无区别，却口诵最夸张的仁义道德。耗几十年心力，谋个一官半职发财，被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纳妾叫做尽孝。繁文缛礼是他们最重视的，所谓的“礼”就是对各种等级秩序表示服从的仪式。这整个卑下、滑稽的世俗生活就是他们的全部。这样一群人组成的国家机器，怎么能指望它变好而不变糟呢？

海瑞却试图维护这样的腐朽文化，以为人人像他一样“刚正不阿”，明王朝就有救了。我们只好把万历的问题送给他和他的崇拜者们：“为什么我越想励精图治，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

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大臣是真信奉儒家鬼话的。从来都是“外儒内法”，也就是拿儒家学说愚弄百姓，按法家权术治国。万历不幸从小就受到最好的儒家教育，当真信了儒家，不懂得如何使用权术，结果完蛋了。如果他当真是传说中那种沉湎酒色的昏君，明王朝想必还能多延续些日子，因为他起码有勇气诛杀这些胡说八道、迂腐不堪的儒家害虫，贯彻自己的执政意志。

### 三

姚文元同志别的“文痞”罪状，我无法一一研读，因为他忍辱低头，才换得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他的政敌自然不会出他的文集。我在官媒上看到这篇罪状，觉得颇有代表性，摘抄如下：

陶铸从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出发，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本叫《思想·感情·文采》。两书出版后反映颇好。可是，在姚文元的笔下却被歪曲诬蔑而面目全非。不过，当姚文元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陶铸已经是阶下囚，只能听任姚棍子的任意敲打了。

姚文元是怎样对这位老革命家进行“大批判”的呢？只举几个例子：

陶铸说：“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这有什么错呢？革命导师不是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要用一切办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吗？党的八大决议不是明确规定“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指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吗？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说，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你没有讲“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没有讲“依靠突出政治”，“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这么蛮不讲理的胡批乱扯之后，陶铸的正确主张就变成了“反动透顶的‘机会主义’理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陶铸鼓励青年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认为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成名成家，就是歧视工农兵。他说：“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



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底层，永世不得翻身。”真是无理搅三分，充分反映了姚棍子的奇妙逻辑。

陶铸认为，“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方法论”，“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众所周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首先倡导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可是，姚棍子却歪批说：“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

就是这么一种打着“阶级分析”旗号的古怪不通的逻辑，今天看来只会引人发笑。不过也可以算做是“四人帮”一伙搞的所谓革命大批判的经典之作。

姚批陶铸的这些意思不都是我一直在说的吗？唯生产力论。功利主义的教育。荒谬的“实践检验真理”论。

如果“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那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难道是不让国家迅速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和它们的区别，在于国家权力到底掌握在谁手中，工业化带来的成果到底归谁。陶铸的反动思想，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歪曲成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要不择手段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遇到反抗就要用法西斯手段保障他们的民族复兴顺利进行。

【“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我不知道陶铸原文里都还做些什么。如果这很好，那么想着自己将来成为哈佛女孩、耶鲁男孩一定也很好，想着拿绿卡、嫁老外更好。陶铸要让学生们树立的“远大理想”，就是学好文化知识，加入到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中来，一起为他们的民族复兴出力，不要当个对国家没多大用处的工农废物，白白耽误自己的前程。

仿佛预先知道这群叛徒将来要制造出“实践检验真理”的理论，姚文元同志提前答复了他们：实际首先是阶级斗争的实际，要看你站在哪一边。如果不是这样，为何遍地的毒品、犯罪、卖淫、童工、黑煤窑、自杀、罢工、警察镇压抗议者、贫富悬殊、经济危机……他们看不见呢？为何这些实践就不能检验出他们的真理是假的呢？为何教科书上所有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一个不拉地全在中国出现了，他们却依然厚着脸皮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为何他们依然兴高采烈、雄心万丈地高唱民族复兴、中国梦呢？因为实践有两种，有资产阶级的实践也有无产阶级的实践，无产阶级的实践当然对检验资产阶级的真理无效了。

姚文元同志究竟“文痞”在哪里呢？就“文痞”在把这些民族主义者的反动思想全都挖了出来，对他们的未来早早做了预言。

## 棍子扯文革（十二）经济战线的斗争（二）

2015年11月15日 10:22 阅读 2534 [新浪博客](#)

前面说过，六六年底，工人进入造反舞台。之前说的工人造反派多为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合同工、临时工。俺们觉得，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允许合同工和临时工制度的存在，这是对专政的莫大侮辱！合同工、临时工们也觉着不能忍，于是纷纷起来造反，成立全红总，直抵总工会，把个没有卵用的全国总工会闹了个天翻地覆。文革派迅速站队，果断对全红总表达了全力的支持。周仲尼为首的走资集团自然不会坐等他们壮大，威胁到丫们的走资事业。于是资无双方就操蛋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搏杀。结果是在全红总激烈斗争下，总工会陷入瘫痪；而由于走资集团的奋力抵抗，合同工和临时工也没有获得单独组建造反组织的资格。

无先锋没有抓住机会，及时推进合同工、临时工等与正式工里的造反组织之间的大联合。这本是无迅速扩充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力量的一次良机，而且，此时的走资集团还未实现整合，正是迷糊之时，因此，无先锋应该坚持把合同工、临时工制度问题上上升到全局性政治问题的高度，整合工人组织，给走资集团以致命一击。此后，也一直没能实现工人组织之间的大联合，而多半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走资派则在六七年七二〇之后迅速开始整合，无的力量越发处于下风。

林妹妹挂逼后，各路走资纷纷浮出，走资集团开始着手整顿，其中一个大动作是重建工（会）青（团）妇（联）；阶级矛盾如此尖锐，工人、青年、妇女，早就分裂成对立的派别了；所谓工青妇，就是块掩盖阶级矛盾的裹脚布。工人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青年、妇女，也都分裂为对立的两个阶级。解决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斗争，就是通过斗争，一派战胜另一派。搞工青妇，就是恢复走资派的机构，因此，实际上就压制了造反派的斗争。如此一来，全红总的战斗成果几乎被损失殆尽，阶级力量的天平也明显地偏向了走资派。

“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是于1966年11月8日由部分合同工、临时工联合成立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跨省市的工人造反组织。“全红总”在北京成立，造反派头目是王振海等人。（《河蟹党屎》）

（1966年11月底—12月初，“全红总”近400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大礼堂，提出了他们的造反要求。12月4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合同工，临时工，在文革初期头一次以组织形式发声。本来就是要大联合，搞专政嘛，不搞成全国性的组织，难道还要零敲碎打、各自为战么？可惜这个规模没保住，被资集团搅了屎，否则无疑会成为最具战斗力的工人组织。）

江青1966年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河蟹党屎》）

（这次接见之后，“全红总”听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迅即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文革小组站队支持“全红总”。哈哈，周仲尼们对待知识分子、走资干部就是和风细雨，工资待遇一律照旧对待工人，那就是：砍砍砍，踢踢踢，打打打。合同工，随时解雇；临时工，不听滚蛋。这尼玛竟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无产阶级被专政么？）

1966年12月26日晚，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会见一开始，江青就阶级感情“充沛”地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立刻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则插话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显得更为马列主义化地说道：“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河蟹党屎》）

（文革派直至问题核心：这不是神马方法问题，这完全是路线问题，这是搞资本主义！把你个劳动部长下放，去当当合同工，体验体验生活。）

“全红总”的代表汇报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且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陈伯达立刻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照样工作！”江青更为激烈地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康生也紧跟着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河蟹党屎》）

（办公地点……所属单位……全国各地分团……劳动调配部门……最后是总工会。这一系列动作能完成，不正说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吗？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所在的城市发生混乱，你知道要联系哪拨人，占领什么地方，专政什么人吗？全红总，战斗值爆表！）

江青还以中央文革最实权人物的口气总结道：“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2**，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按《十六条》处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这时，江青对两个靠边站立的领导干部说道：“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河蟹党屎》）

（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什么时候，可以把你的老板，所在的市县领导人，也享受一下这种待遇？如此岂不是甚好？文革派号召：**1**。大家都来造反，要大联欢。**2**。饭饭照吃，革命照干。）

中央文革的讲话，“全红总”立刻以大字铅印传单发向全国。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1967年1月2日的《联合通告》。《通告》指出：“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河蟹党屎》）

（“‘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这就是力量。合法吗？无所谓，不愿意签，不签就走人，换个能签字的。

社会主义就得铁饭碗。不搞铁饭碗，随时被人捏着蛋蛋，那还算是国家的主人么？）

“全红总”的造反派开始揪斗领导干部，围攻领导机构，通告全国各分团展开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的造反活动。一时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刮起了被后来批判为“经济主义”的“歪风”。不仅属于《通告》内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要求兑现《通告》的规定，类似的“经济主义”要求超出这个规定扩张开来。很多地方将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有些地方将1961年—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河蟹党屎》）

（“有些地方将1961年—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60年到63年的工人数量，60年5044万峰值，降到了63年3293万最低。工业基建规模有那么大，不可能一天之内砍下去，也就是说将有大量的工人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存在。

“大跃进”表明周周仲尼的庸俗经济学路线已经不可能胜任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任，并走向反动。周周仲尼变本加厉，索性借机打压无产阶级。

尼玛对照苏联30年代的数据，周周仲尼的经济管理水平真是低下啊！周仲尼最为鲜活地给我们展示了，神马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周仲尼搅屎录（九）》已经论述过周仲尼在这个问题上的搅屎以及无先锋应对上的失误。

“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我们就是要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以前吞了我的，现在都得吐回来！）

政策调整后出台的一系列部署是性质明确的。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质上就是针对“全红总”这样的潮流在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同年1月20日，周周仲尼在接见安徽省造反派代表时，又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周周仲尼还说：“至今中央还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这里首当其冲指的是“全红总”。同年1月以及1968年的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河蟹党屎》）

（周周仲尼出来表态：“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英特那啥熊要到社会主义后期，条件成熟了再实现。我们看到，“国务院”自始至终是彻头彻尾的走资大本营。）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发出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又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但是，“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通告特别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河蟹党屎》）

（“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按照原来办法执行”。走资们眼里，工人嘛，干活可以，千万不能组织起来。

苏拉密眼里，这样雇佣农民工，又遣返农民工，就成了城市工人喝农民血的罪证！同时我们也看到，所谓“毛时代”之类的历史概念是多么不适合拿来当一句话的主语。毛时代，那也是阶级斗争的时代。从来没有神马“毛时代”如何如何。而只有“毛时代”走资们如何如何，走社们如何如何，造反派如何如何，保守派如何如何。左逼右逼们都是半吊子，说话从来没有主语，只有个大箩筐一样的“XX时代”。

此后也再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工人阶级专政，竟然连跨省的工人组织都没有，真是奇也怪哉。这么说也不对，后来周仲尼们搞整顿，就重建了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扒过，介个组织，俺们前面已经说了，丫不是工人阶级专政的一个环节，而是专政工人阶级的一个环节。此消彼长，一进一出，无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在这之后，无方真正的机会就只剩下了一次，那就是风庆轮事件。很可惜，这一把，又被玩砸了。从此，无彻底丧失机会。横亘在走资集团面前的最大障碍已经被清除，剩下的，只有华不老实这样的修正势力，已然不足道哉。关于风庆轮事件，博友们可参看本博所贴心左同志的《风庆轮事件》一文。这个事件，可视为资无双方在经济战线的最后一次全面交锋。）

我们说，阶级斗争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归根到底”很重要，不然就会把阶级力量对比的讨论庸俗化，抽象化。而且，阶级力量的对比也是处于变动中的。我们扯一千道一万，都得落实到力量增长上，但是得具体落实，否则就没啥意义。斗争，永远是具体的斗争。力量弱，就要想方设法去加强；而不是借口力量弱，就坐以待毙。任何时候，都要斗争。我们分析主客观情况，正确认识形势，是为了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寻找相应的斗争手段。不同的形势需要不同的斗争形式。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只有正确认识了世界，我们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但认识始终服务于改造。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也是总结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打击对手的力量。这就是用对历史的认识来服务于现实的改造和斗争。如果结论只是：无的力量比资的力量弱，所以无失败了。这个结论就没有神马意义。失败必然是因为力量弱，但运动是绝对的；力量会随着具体的斗争而发生变化；错误的认识、行动，就会削弱力量，错误越大削弱越严重，反之，就会增长力量。文革开始的时候，资也犯错误，搞内斗，这个时候力量就削弱；在斗争中丫们逐渐清醒，抱团作战，力量增长。我们指出前辈们斗争的失误，绝不是为了神马指责，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历史功绩摆在那里，谁也动不了；我们是为了吸取教训，在现实的斗争中少犯同样的错误，否则，我们的事业就要遭受不必要的挫折，甚至失败，我们说，这才是对革命前辈们最大的不敬。

## 棍子扯文革（十一）经济战线的斗争（一）



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经济！

神马叫经济就是政治呢？经济的核心是生产方式，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合体。生产关系意味着阶级关系，生产力意味着阶级力量。因此，经济，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没有神马单纯的发展经济，一切都围绕着阶级关系的变更、阶级力量的消长、阶级利益的损益。阶级关系的变更、阶级力量的消长、阶级利益的损益，直接决定着政治的性质。或者说，政治的内容，也无非是阶级利益的损益而已。

神马叫政治就是经济呢？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啥意思呢？所谓集中表现，就是敌对阶级分别组织起来，进行搏杀，而不再是零敲碎打。“集中”的关键，就在于组织性；而其表现，则是成熟的先锋队的出现。成熟的先锋队本身就是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拼杀出来的。因此，出现了成熟的先锋队，阶级斗争就从自发走向了自觉。列宁又说，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政治斗争的表现就是对于政权的争夺。一个政权的性质，决定于其为哪个阶级服务，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阶级社会，没有神马普遍利益，只有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落到根子上，就是生产关系；阶级力量，落到根子上，就是由阶级所掌握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组合，就是生产方式，这是经济的本质。因此我们说，政治就是经济。

政治斗争，就要解决政权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落实为生产力的革命性推进，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造，总之，是生产方式整体的革命性发展。当然，这是指革命阶级的政治斗争。如果是反动阶级的斗争，那就是阻碍生产方式整体的革命性发展，维持并巩固落后的生产方式。

如此一来，在经济战线的资无斗争，就应当成为文革阶级斗争的核心。资无双方都清楚：经济是命门。从前面《周仲尼搅屎录》已经看得很清楚，走资一直牢牢把握着经济战线斗争的主动权。所以到文革时期，无方其实处于很被动的地位。无先锋在经济战线投入的力量也无法和资力量相比拟。而且，我们将看到，在这个关键战线的斗争中，无先锋出现了不少失误。本文简单谈一谈 70 年到 72 年资无双方在经济战线斗争的得失。

70年2月下旬至4月中旬分别召开全军和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至71年，在基层组织恢复的基础上，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省级党的委员会。整党重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遏制制造反派势力，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作用（《河蟹党屎》）

（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说过了。资重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的过程，就是清洗造反派，释放各路资的过程。）

教育革命”在毛看来，首先“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于是，各类城镇学校普遍实行工(军)宣队、革命师生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以工(军)宣队负责人为核心建立各级党组织；农村中、小学则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组)。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河蟹党屎》）

（校长和教师从来就没有起过主导作用。意识形态，科教文卫，上层建筑，都由经济屁股决定。学校注定了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就是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工人阶级能否真正领导教育，还是取决于无是否掌握自己的工人群众，组织起自己的阶级力量。还有一点，前面也说了。不是要工人跑到学校去，而是要学生进到工厂来。学校就建在厂区嘛。学生也得亦学亦工，工人也得亦工亦学。教师也一样，亦师亦工。在共同生产中、在共同学习中、在共同斗争中打成一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8年12月，毛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难，青年失去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河蟹党屎》）

（上山下乡的得与失，前面的文里都已有所论，此不赘述。）

“五七”干校。干部下放首先是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革委会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的需要（《河蟹党屎》）

（削减 95% 的管理人员，地球没有不转。正是在共同下放到干校期间，走资们才猛然发现：虽然这些家伙出身反动，没落贵族，酸文假醋，可其实和自己是一伙的？！而高知们也猛然发现：虽然这些家伙出身丘八，趾高气昂，可同自己是一道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于是双方在文革中结成血海情谊，秣兵厉马，枕戈待旦，日思夜想，等待变天！陈小鲁出来代表河蟹先锋向高知分子们道歉，不正是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表现么？不正是对之前的误打误杀表示歉意么？双方现在不是如胶似漆么？你用枪杆子捍卫资的利益，我用笔杆子捍卫资的利益，合作愉快！）

除少数大、中城市将一些干部下放到工厂外，多数地区的多数干部被下放到农村。与此同时，大批高等学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被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70 年 12 月至次年 1 月，“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召开，认为“五七”干校对于促进机关革命化，加速“斗、批、改”有深远意义，必须长期办下去（《河蟹党屎》）

（高干高知下放劳动，可以算无方的小胜。不过，在周仲尼们的积极搅屎下，高干高知还是享受原先的待遇，工资保持不变。参加劳动，正是给高干高知们去了三高，让丫们得以在资复辟后尽享胜利果实。）

71 年 8 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毛的无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专了无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的”（《河蟹党屎》）

文革开始后，高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根据毛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70 年 6 月，党中央决定进行试点恢复招生，废除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河蟹党屎》）

（文革中无才夺回来教育领域的部分权力，学校开始培养无的接班人，为无服务。）

“四五纲要”总要求：“四五”期间要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河蟹党屎》）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带来资无关系的新问题。文革初期无先锋队是靠宣传文教打开缺口，中期在生产斗争中失去了根基。）

70年我国经济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原定该年度的主要指标（《河蟹党屎》）

（不是控诉文革天下大乱嘛！咋滴还超额完成计划呢？生产力指标，涨不涨工资，重轻农还是农轻重，这些经济斗争从建国后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重大的政治任务。经济，就是政治。）

根据“四五”计划,1970年计划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发展“五小”工业,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着手进行建立经济协作区的试点工作;搞好企业下放,争取在年内完成（《河蟹党屎》）

（“五小”工业指地县两级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和小水泥厂,在无主导的形势下,要往国营方向推进,算是无的后备力量。改开后成为乡镇企业,但很快就转变为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

69年8月,首钢向武汉重庆包头等钢铁公司发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各行各业纷纷响应.这被《人民日报》宣传为“大跃进的先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的信号”.此后,钢铁

会战,汽车会战和拖拉机会战在各省展开.到 70 年底,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均称已能“成批生产”汽车（《河蟹党屎》）

（革命竞赛，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资看来是缺乏计划,是混乱和损失。）

资认为:重工业生产增长过快,农、轻和非生产性建设积累过少;内地建设挤占大量资金,布局分散,管理混乱,挤占发达地区资源;片面强调“自成体系”的建设,阻碍了各地"相对优势";产品质量下降,造成浪费和损失;职工人数增长过快,出现工业、基建与农业争劳动力,给国家财政支出和市场供应增加了负担（《河蟹党屎》）

（相对优势，庸俗经济神教的药方。周从建国以来，就是“爬行哲学”的坚定代表。认为经济发展顺序应该是农轻重，中国农业有劳动力优势啊，应该出口换外汇啊！尼玛没有重工业，怎么农业现代化？没有机械取代人力，没有化肥育种，怎么高产稳产？

寄希望于国际市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只是纯经济路线吗？不是，是政治。以城市吃粮人口多为由，削减一半国企工人，就是为了削弱无的力量。培养小农经济，小生产来瓦解公社，就是壮大资的力量。城里的工人难道是白吃饭的吗？造的农业机械不是加快农业建设吗？

周打上半场，邓打下半场，都是资的带头人。）

71 年底,绝大部分经济指标都完成.同时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工资支出突破 300 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 800 亿斤,大大超出预定的计划.随之而来出现了货币发行量的突破.周指出:“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河蟹党屎》）

（工人阶级革命竞赛，热情高涨；力量迅速壮大。庸俗经济学拥趸周仲尼及时地伸出黑手，削足适履给经济大脚穿货币小鞋。问题恰恰是，周仲尼们只要把庸俗坚持下去就够了。工业体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工人阶级血汗堆出来的。工人阶级不仅要通过生产把工业

体系干出来，而且要通过斗争牢牢把生产力掌握在本阶级手里。如此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改造农村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形成良性循环。）

70年3月初《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截至9月底,工交部门直属的3082个企事业单位,已下放2237个,占总数73%,撤销的有104个（《河蟹党屎》）

（对照现在的央企,就知道当时资是多么不愿意下放,就明白横加指责的原因了。）

三线建设出现了65年以来的新高潮.69年3月,连接中南、西南的铁路干线--由湖北襄樊到重庆的襄渝铁路动工兴建.9月,二汽在湖北十堰市开工.11月,河南焦作至广西柳州的焦柳铁路动工.70年7月,纵贯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成昆铁路通车.72年4月,甘肃西北铝加工厂建成.11月,株洲至贵阳的湘黔铁路通车（《河蟹党屎》）

（这个靠小农小生产积累，没有重工业，猴年马月才能搞出来？）

三线建设的工人、干部、科技人员、解放军和民工排除万难,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在短期内初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三线建设,较大规模地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布局,改变了三线地区比较落后的面,为以后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河蟹党屎》）

（根据庸俗经济学的相对优势理论，那西部就应该穷，提供劳动力，东部就应该富，提供资本机器，这样就可以发挥“相对优势”喽！背后是劳动力商品的流动和市场的壮大，这就是资打的算盘，可惜在那十年，完全行不通，资能不捉急吗？三线建设是有利于无的一个正确决策。不过，资复辟之后，市场经济的逻辑横行无阻，“比较优势”终于见了天日，三线也就毫无悬念地逐渐没落了。）

67年至68年间,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工分挂帅”一些地区减少或取消了自留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大寨大队,被树立为“继续革命”的典型.阶级斗争扩大化、“穷过渡”及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经验成为全国农村的榜样（《河蟹党屎》）

（没有物质刺激？！那还咋先富带后富呀？

根据统计，全国 1/3 的公社发展迅猛，1/3 的公社发展缓慢，1/3 的公社发展落后，资的办法是想方设法扩大后 1/3 的比例，瓦解公有制基础，无也办法是依靠基层先锋队力量，带动前 2/3 的公社发展。

以改开第一村“小岗村”为例，小岗村大包干的第一年收获粮食 13.3 万斤相当于其以前 15 年的总和，俺们真的很惊诧和惊叹：15 年年均亩产才 17 斤？！——这简直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奇葩案例！然而资专政下，就可以把这样的落后典型捧为致富圭臬，发家典型！）

70年8-10月,国务院在大寨、北京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以“农业学大寨”为号召,但实际上却对大寨的做法限制和否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会议强调,关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社员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反对平均工分;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灵活种植（《河蟹党屎》）

（朋友们，请注意，是“国务院”！国务院是个啥子院，大伙很清楚了吧？嗯，再来说一下资的策略，丫不是傻傻地端上来一盆屎，而是你端上来一锅汤，丫就往汤里放几颗屎。嗯，俺们管这样的行为叫搅屎。那么，在老板专政下，就该我们搅屎了。我们要时刻找机会，没有机会创造机会，往老板们的汤里放屎。老板的汤是啥呢？利润，利润，利润。给老板生产利润制造麻烦，实现利润制造麻烦，扩大再生产制造麻烦，给老板的整个以利润为生的秩序制造麻烦，这就是我们的搅屎活动。）

三线建设,使地方建设获得较多的自主权.为支援地方“五小”工业,上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地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设备:70年,上海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为各地制造 100 多套小化肥厂的关键设备.各省、市工业部门,以及各工业部门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为地方工业生产了大量设备（《河蟹党屎》）



（生产资料，直接按计划划拨。嗯？竟然是划拨而不是买卖?!资表示理解的不能）

文革对城市经济影响较大,给社队企业的产品销售带来拾遗补缺的机遇.社队企业出现了又一次发展高潮。这在沿海一些地区尤其明显.70年全国社队工业产值为67.6亿元,是1965年29.3亿元的2.3倍.不少社队用办企业所得利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支持了农业的发展（《河蟹党屎》）

（利润竟然不归老板,而是投入到集体经济中?!生产力大幅提高后,势必产生小生产,小业主,小资意识就会抬头,就会寻找利益代言人。无的基层先锋队,需要保持清醒,坚决的与这种意识做斗争,才能够巩固公有制经济基础。不仅如此,还要及时地将一定规模的集体企业纳入国营体系当中。当然,前提还得是无自己牢牢掌控国营企业。）

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增收,培养了一批生产经营人才,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为80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一些地区的“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也存在着诸如消耗大、成本高、原料缺少来源、一些产品没有销路、新增职工过多等问题（《河蟹党屎》）

（哈哈,走资带着放大镜到处找问题!最让周仲尼耿耿于怀的是“新增职工过多”,在丫眼里,知识分子是需要促膝谈心照顾的,工人就是吃闲饭的。改造知识分子是需要和风细雨,下岗工人就雷厉风行。工人阶级不积极干,难道等着天上掉工业体系下来?不多快好省地搞出工业体系,怎么搞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化?不搞农业工业化,如何大力发展农业?不大力发展农业,如何支援工业建设?不支援工业建设,如何……周仲尼们牢牢掐着重工业这个咽喉,一有机会,就“下马项目”、“削减资金”、“少发货币”。要么直接卸掉你的胳膊,要么堵住你的水源。重工业被牢牢遏制,整个经济也就随之跛脚前行。基层的无先锋们,工人群众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革命热情。即便如此,伟大的工人阶级还是干出了一番事业。带着镣铐也得斗争!

但是,在所谓“职工过多”的问题上,无先锋又犯了一次之前犯过的错误。之前的错误,博友们参考《周仲尼搅屎录(九)》)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72年10月至11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这次会议还提出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河蟹党屎》）

（前面我们说，社会主义的计划方式是生产的革命竞赛。而走资派们的方式则是物质奖励。是啊，不搞物质奖励，咋提高劳动积极性呢？

会后，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全国计划。72年因为文革小组阻挠没通过的，73年得以通过，力量此消彼涨。所谓经济计划，实际是政治任务。经济和政治，本身就是一回事。）

《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河蟹党屎》）

（收权、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绑住手脚，工资总额，涨不涨，什么时候涨，要看什么时候对资路线有利。工人作为主人，竟然管不了给自己发多少工资？）

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河蟹党屎》）

（越多的工人参与管理，管理就越没有神秘感；越多的工人懂技术，技术员就没有神秘感；层级越森严，分工越明确，下层空间越狭窄，压迫越深重。）

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河蟹党屎》）

（工厂革委会被厂长负责制取代，无方力量被赶出管理机构。这本来是重大的反革命行径，但是文革派并没有及时组织反击。而企业党委成员，就是周恩来花一年时间，“大会小会逢会必讲，大报小报逢报必发”解放出来的干部，工厂的管理职位，则由下放回来的技术人员担任。力量此消彼长，往对无不利的方向行进。）

金融系统也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调整。1972年9月，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华国锋听取汇报时，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正确认识银行的职能作用，对银行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来的成就要给予充分的评价；要加强银行工作的独立性，全国信贷资金统一调拨，全国统一结算，金、银、外汇统一管理。他们强调：当前银行管理偏松，要加强分口管理，不能乱来，否则一定要多发票子。（《河蟹党屎》）

（社会主义国家，本无金融可言。所谓金融，不过是国家财政系统的一个部分而已。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支配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系统服务于国营的工商业系统。资本主义社会，金融是整个经济肌体的血液，掐住金融，肌体就得疲软，久了就要崩溃。社会主义社会，财政就是水源，没有财政的补充，企业就要失去活力。资控制了金融，便可以扶植资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工厂单位，打压无路线的阵地。

在恢复工作的资先锋队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面前，修正队员华国锋就和小学生一样无知。修正因为放下了阶级斗争，幻想什么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 和平竞争 和平过渡”代表资无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小生产社会主义，结果就是根基不稳，东倒西歪。）

1972年至1973年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还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的若干基本关系进行调整。针对“三个突破”，国务院要求：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总体控制（《河蟹党屎》）

（不知道工友看到“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总体控制”，能不能看出字字血、声声泪来？在周仲尼眼里，工人就是蝗虫，就是吃白饭的。）

为了解决粮食购销差额的问题，1972年商业部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确定采取如下措施：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超计划招工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歉；核减农村不合理的销量，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此外，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问题，共同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河蟹党屎》）

（周仲尼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和风细雨，“知识分子不喜欢开长会，要长期教育”。对工人就是雷厉风行！“压缩一切不合理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超计划招工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这一招在大跃进的时候丫就使过了。无先锋本该在那时就组织反击，却白白错失了良机。这一次，居然还是没有像样的反搅屎措施。同样的错误犯了两次！我们看到，周仲尼们死死掐住重工这个咽喉，然后又借口生产力跟不上，不能在农村快速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接着又借口农村生产力有限，不能供应城市人口足够的粮食，因此要削减职工人数，压缩工业规模；然后再借口工业生产力落后……如此恶性循环，工人不死也残。）

这些措施的实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精简职工方面，不但将1972年超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还动员了一部分1970年以来招收的临时工、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合国家规定进入城市的人口回乡务农。另外还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后，1973年全社会粮食收购968亿斤，粮食销售近956亿斤，做到了国内粮食收支平衡。（《河蟹党屎》）

（对待工人，一句话，“不合规定”，就“临时工、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合国家规定进入城市的人口回乡务农……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对待专家，九一三后，翻身的专家，干部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驱逐工人，引进工贼。镇压造反派，扶植保皇派。这一进一出，工人贵族，工头监管，技术白专，厂长就在工厂中占了绝对上风！72年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因为姚文元的阻挠没有下发，73年就阻挡不住了。）

纵观这一阶段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五七干校、三线建设，无取得小胜；上山下乡，无准备不足，因而弊多於利。集体企业遍地开花，在无主导的形势下，要往国营方向推进，属于无的后备力量，同时是资无双方的一个争夺点。无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及时反击走资围绕“三个突破”所进行的搅屎上。如此一来，对于无产阶级的打击是三重的。首先，削减工人人口，压缩工业规模，这就从绝对力量上削弱了工人阶级；其次，在保留的工厂中，回调工人贵族，实行工头监管，扶植技术白专，搞厂长负责制，这些保守力量就在工厂中占了上风，从而工人阶级的相对力量也被急剧削弱；最后，由于在工业领域斗争的失利，导致对于农村的生产关系改造、对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村集体企业的进一步改造等等都缺乏有力的支撑，从而反过来对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巨大阻碍。

改开以后，乡镇企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企业。 国营企业变成国资，也就是垄断资本。所谓垄断和自由竞争，不过是资本的一体两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只是资本的不同形式。好老板坏老板，都是一个藤上的瓜。哭爹喊娘的中小老板是大老板的外围。对于良心关注是左老板还是右老板，好老板还是坏老板，大老板还是小老板多分了肉，俺们不感兴趣，只是搬马扎围观。怎么夺回被占有的剩余价值，搞掉所有黄四郎，才是俺们关心的。

## 棍子扯文革（九） 撤退

从 67 年上海“一月夺权”到 68 年下半年，是“文革”发动以后党、国家和军队处于最混乱、最艰难状态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领导干部或被解除职务，或被下放管制，或被关进监狱（《河蟹党屎》）

（庆父不除，鲁难不已。挪开上百个省部级庆父，依然前仆后继说明啥？路线斗争并不偶然，存在广泛的经济基础。远的有支持 59 年打倒的彭德怀派，近的有支持刚靠边站的刘少奇派，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你是哪一派？

现在不是吗？工友里面有老黄牛派，有混日子派，有搅屎棍派，有逍遥派，有跪舔派……你又是哪一派？如果不知道先阶级，后左右，就会被人民，中国人，成功人士，慈善家，雷锋，红卫兵这些词所迷惑；如果不会带入自己到历史情景中站队，只是抱着票友和听书

的心态寻艳猎奇，就会弱智的认为历史中那些人是傻 其实傻的是他自己！你属于哪个利益团体，你是自发还是自觉为阶级利益服务？）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毛泽东传》）

（前面一路看下来，很清楚的是，资先锋领导自己的基础群众率先发动武斗，并对各项革命措施进行搅屎。而造反派多半只是防卫而已。资群众不停止武斗，造反派肿么可能放下武器？那不明摆着找死么？六八年下半年开始，毛逐步组织撤退。）

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毛泽东传》）

（有后台很正常，基础群众总要在各自的先锋队领导下才能进行有效战斗。无先锋队整体力量处于下风，资先锋处于上风。所以资要领导自己的基础群众率先发动武斗，并对各项革命措施进行搅屎。造反派多半只是防卫而已。盯紧屁股，盯紧阶级基础，就没啥想不通的了。）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传》）

（信号更加明确，为老龟命重上舞台埋下伏笔。）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毛泽东传》）

（稳，是稳谁呢？恢复秩序，是恢复怎样的秩序呢？）

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传》）

（老毛开了口子，周仲尼顺势扩大。嘿嘿，周仲尼总是对“极左”耿耿于怀，一有机会就批就压。诸位可以看看本博《周仲尼搅屎录》系列。“我们”就是中央，就是党嘛。“你们”这样搞，不听“我们”的话，那就是反党反中央。“你们”是小资狂热，是完全错误的。诸位，周仲尼这是神马？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恐吓么？周仲尼就像一只猎豹，时刻盯着对手，一旦对方出现疏忽，便立即出动。）



毛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毛泽东传》）

（不经历激烈的斗争，革新生产关系，又怎么可能壮大阶级力量呢？阶级力量不到，怎么可能整好党呢？阶级力量不到，无先锋怎么可能掌握大权呢？比如，由于受到广大老龟龟的抵制，湖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朱鸿霞，最终就没有能够进入党内。朱红霞如此，其他造反骨干更是如此。因此，所谓吐故纳新，说得再好听，也落不了地。左逼们不是说老毛一句顶一万句么？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阶级力量的支撑，所有指示都不过是空话罢了，老毛说的也一个样。）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毛泽东传》）

（革委会里，各占 1/3，而且老中青三结合。请问这是肿么设计出来滴？不是斗争出来的吗？民主柿油粉们，肯定说这不科学，应该一人一票选。那斗争的时候，你逍遥哪里去啦？斗完了你想摘果子？没门。不过话说回来，革委会依然是资占上风，整体上受资主导。这个也对应于阶级斗争中的整体力量对比，以及阶级斗争的战况。）

到 68 年 9 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 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成立，填补了国家和地方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毛泽东传》）

（革委会本身是斗争的产物。虽然在革委会里无依然处于下风，但好歹楔入了自己的力量。关键的问题是，建立革委会就完了么？宣告斗争结束？还是再接再厉，继续斗争呢？力量的变化永远是动态的，无不斗争，革委会就要完全沦为资的机构。无继续斗争，则有可能把革委会往有利于无的方向推进。）

国务院各部委精简后，保留人员最多的也只占原来人数的 40% 多一点，最少的则只有 7.8%；大多数省级革委会刚成立时，都只设政工、生产、办事和保卫四大组，全部工作人员只有 150 至 200 人，为原有人员的 1/20 或 1/30（《河蟹党屎》）

（可见所谓管理，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砍掉 99% 以上的经理老板和官员，不影响完成经济发展计划。老板之所以保留甚至鼓励发展很大一部分小业主，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断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援手，特别是在鼓吹“劳资合作”的现代骗局上。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拿破仑第三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件由工厂主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工人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工友不妨对照一下河蟹的三十多年历史，俺们几乎可以一字不差的照搬上文——“从河蟹资产阶级革命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土地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承包给农民，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 DXP 南巡后推动股市和发行企业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件由大地产商出面把城市住宅卖给自己的主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主人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毛泽东传》）

（中共中央又不是文革派的，拉人来给自己打打气都不行了？）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毛泽东传》）

（斗争的成果需要事后的程序进行追认，就叫做“合法化”。而不是先想着修改法律，争取什么鬼“罢工三权”力，再去抄家伙干。

所谓“法不责众”的意思是：法是对力量的追认。当人数变多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于是法依照新的力量对比，追认这种“众力”为“合法”）

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毛泽东传》）

（就像火山熔岩喷发冲出地面，冷凝后形成的岩浆岩一样，力量对比决定用什么样的政权政体来调和阶级矛盾。爱不爱国，不妨先问问，国是谁的。孔老二认为国是淫民的，可这个淫民又是一大筐菜：小业主，小老板，小资……

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揭过他们虚伪的面具了，清晰的帮他们总结了自己躲躲闪闪、缠杂不清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方面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旨在保证市场经济“最佳经济效益”的“铁的规律”，即依靠饥饿纪律保证资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基本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又安抚工人，等待着将由他们为其找出一些手段和办法（孔老二就说农民工要拥护政府相信 D，因为讨薪最后还要由政府出面搞垫！），诸如说服富人兴办慈善事业，大家努力把 G N P 的蛋糕做大点以产生“涓流滴下”的效应，以及由国家出面用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建立一套临时救济工人的社会保险制度（比如首富的比

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红十字会），等等，来把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福利“提高到有产者的水平”，“使一切雇佣工人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毛说：“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毛泽东传》）

（屁股不一样，手举再高也是白搭。这一点老毛心里清楚的很。）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毛泽东传》）

（老毛主动承担错误责任，明显是释放妥协信号。）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毛泽东传》）

（林与文革派继续保持进攻，毛老压制攻势。）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传》）

（虽然组织撤退，释放各种对走资派的利好消息，但依然要把文革的必要性肯定下来。这也为以后再发动进攻埋下伏笔。）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毛泽东传》）

刘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是“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而奔走呼号”；刘在对资工商业改造中“坚持放任资发展的反动政策”，“使资本家继续掌握企业的领导大权”；“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自由泛滥；刘“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复辟资”。（《审查报告》）

（恩格斯：“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

刘鼓吹“流通决定生产”，反对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社计划经济，是从流通领域破坏社建设；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搞资复辟的宣言书”等等。认定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审查报告》）

（恩格斯：“他们都力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因素‘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

17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学术“权威”相勾结，“篡夺了文化界的领导权”，“在文化领域中，向无实行反革命的资专政”，等等。（《审查报告》）

（斗争从来都是反复的。关峰，王力，戚本禹“被休假治疗”，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遭到清算——这是低谷；文革小组抓舆论批刘的反动路线是深入教育群众的妙招儿——这是高潮，然而文革小组放松了在省市县乡革委会里进一步建立基层先峰队组织，任由基层组织依然由资的代表盘踞，因而埋下了日后覆灭的隐患——这又是低谷。）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毛泽东传》）

林与文革派继续保持进攻，欲将剩勇追矮挫这个穷寇，周仲尼逼宫毛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是整党建党工作；二是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三是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

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是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谈得更多的问题，被他看作是召开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毛泽东传》）

（老毛在确认文革必要性的前提下，逐步组织撤退。）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一个月间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毛泽东传》）

（老毛这是要发扬一下举贤避亲？在我们看来，这个很扯淡。不积极争取也就算了，完全没必要刻意打压嘛。按正常的组织程序推选好了嘛。老毛首先看的竟然是他们的亲属身份，而不是无产阶级战士身份。我们说，江青也好，小毛也好，首先是无产阶级战士。至于和老毛神马关系，那是次要的。既然是无产阶级战士，那当然要进入权力机构，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老毛舍阶级大义于不顾，却考虑神马避亲属之嫌，差评。左逼们所谓的高风亮节，在我们看来一文不值；而在其有损于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实现时，则完全是有害而无利。）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毛泽东传》）

（有的说，取消中央文革，就等于宣告文革结束。但是，矛盾解决了么？既然矛盾依然在，斗争可能停止么？只是换一套方式继续斗争罢了。）

69年4月1日至24日，九大在北京举行。1512名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预备会期间，毛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河蟹党屎》）

（革委会不是由中央认定的正式机构？上级部门不是正式机构？再说，这些机构只是“决定”“指定”候选人而已。候选人当选，还是通过正常程序的嘛。造反骨干、工农积极分



子当选就不正常？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没有前期激烈的斗争，这些人根本连候选人资格都不会有，更别提成为代表了。即便如此，成为代表的无产队员依然是少数。大部分人，依然被“正常”的资组织拦在门外。）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当选为九大主席团主席，林当选为副主席，周为秘书长。（《河蟹党屎》）

（一般情况，五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次八大是 56 年开的，中间隔了 13 年，开了 12 次会议。九大召开，是对十年文革第一阶段的总结，对两年多来的斗争予以制度法规追认，赋予合法性。）

“无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革”的总的指导思想。它的核心在于认为在无夺取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林宣读政治报告（《河蟹党屎》）

（对比看一下辛亥革命前后，就知道为啥辛亥革命算不上革命；因为阶级关系毫无变化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照这个标准来判定文革的具体性质：它触动了根本的生产关系么？它推进各领域社会关系的革新了么？它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了么？它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联合了么？它不断地消灭着各领域的资本主义关系、小生产方式么？如果有，那是在多大程度上呢？我们一直强调，阶级斗争，不只是一个阶级的人和另一个阶级的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也是破除并消灭旧生产关系，催生并推进新生产关系的社会运动。一切社会关系的变更，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同样是如此。其过程，就是有血有肉的、你死我活的鲜活而残酷的阶级斗争。）

草案删去了八大党章的一些正确内容，把“无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现代化建设，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加上“林同志是毛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河蟹党屎》）

（哈哈，生产力，生产力。我们批唯生产力，实质是要批邓挫们的资立场。谁都知道要发展生产力，邓挫们却是要以此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我们，当然是要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现代化也是如此，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单纯提现代化，就是搅屎用的。）

讨论中充满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革”的高度颂扬。各组还结合文件内容，大搞“斗私批修”，对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批判和攻击，迫使他们作检讨。4月14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河蟹党屎》）

在4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选出委员170名，候补委员109名。在新当选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原八届委员和候补委员19%，仅为原八届委员会总人数的29%。在选举中，有的代表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河蟹党屎》）

（辛亥革命可以比吗？清朝大吏90%成了民国大员，是革命吗？还有搞笑的事，前面师爷不是嚷嚷着要搞正常程序么？肿么有的代表违反正常程序呢？肿么丫们违反正常程序就成了坚持原则了？）

九届一中全会，委员会主席毛，副主席林。政治局常委会5人毛、林，(姓氏笔画)陈、周、康。政治局委员21人:毛、林，(姓氏笔画)叶群、叶、刘伯承、江、朱、许世友、陈、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姚、康、黄、董必武、谢。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河蟹党屎》）

（九大委员会中的力量对比。一共25人，其中无6：毛，康（1975.12），江，张春桥、姚、谢富治（1972.3）资9：周，叶，朱，许世友，陈毅（1972.1），陈锡联，李先念，李雪峰、李德生。军6：林，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修正2：纪登奎，汪东兴。逍遥占位2：刘伯承，董必武。）

许世友，陈锡联，李雪峰、李德生，四个军区司令员，都在文革期间被周力挺，又分别成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负责各省制止武斗、维护工农业生产秩序。李先念在“文革”后期，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河蟹党屎》）

（周仲尼对资有重生再造的大德）

九大政治局通过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中央军委主席；林、刘伯承、陈、徐、聂、叶任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八人为成员。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

（《河蟹党屎》）

（九大 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掌控军队。文革派在军中依然没有多少力量。谢富治早早在 72 年去世，是无的一大损失。资方依然占据上风，从中央到地方，从革委会到军队，资利益代言人星罗棋布。）

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也停止活动。（《河蟹党屎》）

（文革小组被取消，那就换个形式再斗争嘛。）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毛泽东传》）

（有职无权。那么，接下来要怎么斗呢？）

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毛泽东传》）

（还是要紧密联系本阶级的群众组织，积攒力量。）

纵观这一阶段，老毛明显是在组织撤退。我们说，战略撤退只能服务于更好地组织进攻。选择撤退，无非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进行更好的斗争。如果撤完之后却没有接着再发动进攻，那就不叫撤退，而叫投降。而且，即使是撤退，也需要进攻作为火力掩护。不保持进攻，就不可能完成战略撤退，而只能成为大溃败。后面我们会看到，无方当然没有停止进攻。但是斗争偏离了主线，没有寻找战机，没有积极训练厂矿先锋队，准备再次权力争夺。我们一直强调，壮大自己的力量是首要的。

现在可以对九大为止的战斗做一个小结了：

在初期的混战中，资先锋队由于认识不清楚，误伤同盟——地富反坏右派、高知；当倒台的资先锋队队员与斗争初期被他们整倒的同盟关在同一个牛棚劳动时，才猛然发现：虽然这些家伙出身反动，没落贵族，酸文假醋，可其实和自己是一伙的！虽然这家伙出身丘八，趾高气昂，可同自己是一道的！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于是双方在文革中结成血海情谊，秣兵厉马，枕戈待旦，日思夜想，等待变天！

总有人拿“八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文革初期打倒的超过总数的一半”说事，意思是迫害、是残酷。不如调查一下，是不是几乎所有单位十年内的员工流失率都超过一半？！尼玛前者是迫害、是残酷，后者就是自由选择吗？！

工友就是战友，苦逼就是利益集团。苦逼做事，经常先想的是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有这样的想法，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利益集团成员；这一点上，苦逼要向老板学习：老板做事，从来都是先想有利没利。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于是苦逼在工厂里结成血海情谊，秣兵厉马，枕戈待旦，日夜谋划，改天换日！

无的先锋队没能深入革命原因 无力量的事实削弱。 资力量空前团结。如果说文革初期，资由于认识不清，误伤友军的话，九大已经给所有的资先锋队员敲响了警钟：不夺回权力，就会被无镇压。 中苏对抗的外部环境，国内的阶级斗争被压下。

## 棍子扯文革（八）学生娃退场

高校里的斗争持续到 68 年 7 月。7 月后老毛主张，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制止武斗。走资派趁机搅屎，往工宣队塞自己人，复制刘邓路线，把工宣队搞成第二波工作组。紧接着老毛发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学生娃退出造反舞台。

66 年 5 月文革开始后，校内开展大规模辩论和贴大字报运动。刘、邓决定派工作组进驻。6 月 8 日，新北京市委派出周赤萍到清华大学，宣布次日工作组将接管清华大学，校党委停止工作。13 日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在会上宣布，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工作组代行学校党委职权（《河蟹党屎》）

（北大清华这两所学校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在各种回忆录，忏悔录，牛棚杂忆里面提到。再对比看看公开刊行的河蟹党屎中是怎么写的。）

该工作组由刘亲自过问，其夫人王光美于6月21日以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名义加入该工作组并成为中坚力量。该工作组将从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到各班主任、政治辅导员、教师等103名清华干部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黑帮分子、黑帮爪牙，残酷批斗。（《河蟹党屎》）

（刘夫人王光美亲自指导清华工作组，这件事情具有代表性，代表了刘邓在全国各院校派出工作组的目的一一高干整高知。老革命干部出面，整理高校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

这种举动，说明资先锋队在文革开始时，对斗争的认识依然停留在57年反右的水平，认为影响自己执政的是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工作组同时对清华造反学生进行严厉的批判打击。工程化学系902班蒯大富等激进造反学生逐步开始激烈反抗。66年6月，蒯提出“炮轰工作组”、要求夺权，宣称工作组同党委一样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工作组滚出去”（《河蟹党屎》）

（高干一手打压高知，一手打压工农。这一招在57年反右刘已经用过了。刘教主不应该忘记：对圣斗士不能使用同样的招数）

工作组迅速对蒯大富进行批判，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将50多人打成“蒯氏人物”，打击近500人，发生数起自杀事件，两人死亡。7月，毛回京，斥责工作组做法，要求周亲自过问。21日，陈伯达派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宣布撤销。（《河蟹党屎》）

（资无的对立普遍存在，才有工作组对蒯大富的专政；在斗争的风头浪尖，老毛没有选择坐视不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亲自解放被资打压的无的先锋队员。）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清华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最初多由高干子女主导。8月9日，

贺鹏飞(贺龙子)、刘涛(刘少奇女)、刘菊芬(刘宁一女)成立串联会，批黑帮、不批工作组，即“八九”派，8月19日组成了“清华大学红卫兵”（《河蟹党屎》）

（高干工作组走了，高干子弟还在。子承父业，可算是家教做的好）

66年底，兵团在其《井冈山》报上发表清华学生刘涛(刘少奇女儿)的长篇检查，揭露刘、王镇压文革的内情。67年3月至9月，井冈山兵团组织或参加了4月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夺军权斗争)、7月下旬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7月29日对徐向前的抄家、8月1日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8月22日冲击英国代办处等运动（《河蟹党屎》）

（刘涛是刘少奇前妻生的女儿，王光美是继母。俺们不能就此认定是家庭不和导致母女反目。刘涛能够从师大女附中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说明家里对她的照顾和其他子女一样。

子女贴父母的大字报，长期以来作为文革扭曲人性的一项罪行被控诉。实际上，俺们抛开虚伪的人性，从阶级利益角度来看就会很清楚：父母在明知自保无望的情况下，留下子女作为接班人，以后仍然有翻身的机会。于是由子女出面写批判父母的材料，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

同样的方法，在《风声》里面两个被抓的地下党之间使用过，在《啊！海军！》空军大队长平田一郎把活的机会留过他的学员们时使用过，在刘整彭的时候彭的亲属使用过，在文革中刘自己家的子女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都从自发上升到了自觉，明白自己属于哪个阶级，并自觉为本阶级利益服务。

工友不妨问下自己：你属于哪个利益团体，你是自发还是自觉为本阶级利益服务？）

66年下半年到68年年中，在此期间，学校学生在各类文革活动挤占下几乎没有正常学习时间。兵团优先招收贫下中农子女，以推荐为主，不招收五类学生：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镇压者，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屡教不改者或有反动言行者，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河蟹党屎》）



（逍遥派、书呆子就是化学反应中的惰性元素，就是维稳的砂子，不参加反应。这样的人群也普遍存在，在中小城市，乡县里面占很大比例。）

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是指 68 年 4 月至 7 月，清华大学红卫兵两派间所发生的大武斗，是北京最为严重的武斗事件，动用各种土制武器装备，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等进行抢夺。共致 18 人死亡，1100 多人受伤，30 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余万元（《河蟹党屎》）

（斗殴三个月，每月死六个，这就最严重？群殴随机吧。拿所谓的耸人听闻的“百日大武斗”与河蟹时代司空见惯的富士康“十八连跳”事件对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俺们除了见到郭老板“除了道歉还是道歉”，工友的血作为改革的必要代价白流了，没见有啥改变！该上坟上坟（俺们管上工叫上坟），该死人死人！）

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毛泽东传》）

（老毛觉得学生仔们不可靠了，还是要依靠工人们。于是就弄个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职责是制止武斗。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龟命们趁机往工宣队里塞自己人，打着毛旗号镇压造反学生。）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毛泽东传》）

（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给老龟命们站台。）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毛泽东传》）

（脱离群众固然有造反学生们主观上不成熟，群众基础不够深厚的原因。但走资们在其中搅屎，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老毛觉得学生仔没有在斗争中成长为接班人，是前期所抱期望过高，落差太大，此时感觉失望。但为群众不打内战叫好，则纯属搅屎了。阶级斗争，不就是打内战么？利益一致的，在斗争中趋同，所谓殊途同归。利益对立的，在斗争中分裂，所谓敌我分明。至于破坏啥的，阶级斗争还不得摔坏些坛坛罐罐？不过，冲击军队，打解放军之类的，还真不是工农娃娃敢做的。据俺们所知，叶大帅的千金就带人冲过，地方小军头见了也只能把嘴闭上。俺们还知道，赵永夫事件总后台还是叶大帅。叶大帅为走资事业鞠躬尽瘁，立下汗马功劳，因此资复辟后叶家享受荣华富贵，那是理所应当，水到渠成之事。俺们总是在网上看到很多小资骂叶大帅是权贵。貌似叶家还是所谓十大家族之一。有一派小资左的革命纲领就是要打倒十大家族。小资恨的是权贵，是不劳而获，小资赞的是公平竞争，“勤劳”致富。小资痛恨权贵，是因为权贵们堵住了小资的上升渠道。小资们不妨先看看权贵们的历史吧，丫们哪个身上不是背了重重的血债？没有他们披荆斩棘，镇压一波又一波的造反工人，杀出一条资本主义血路，哪有小资们的春天？用小资们的话来说，这种仇恨，表明丫们没有一颗感恩之心。）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毛泽东传》）

（单靠学生肯定不行。学生不掌握生产不行，那就更要到工厂串联嘛，跟工人们打成一片嘛。把工人弄到学校，方向搞反了嘛。）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毛泽东传》）

（很多工人被托猪带着上街游行，据说这样能争取舆论同情，获得“市民”们支持，从而给老板和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满足工人的要求。我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很傻，“市民”们只会把工人游行当乐子看，“舆论”也只不过轻描淡写一番，大伙都来展示一下廉价的同情心。一旦工人行为损害到“市民”们的利益，比如堵路影响交通，就立马被路上开车的“市民”斥为暴民，骂成流氓。因此，所谓逍遥派，只是一时没有站队而已，和托猪们不同，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工人的战场首先就在工厂、在公司，在生产领域。我们作为工人，一面以“劳动能力”拿到工资，一面控制劳动成果的输出，进而，老板能够榨取多少剩余价值，这首先是“生产”问题。这是我们搅屎的理论基础。阶）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传》）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毛泽东传》）

（知青上山下乡，退出造反舞台。这一决策的失，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与农业工业化》一文中已有论述。这一决策的得，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知青下乡，部分成为赤脚医生，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地区的医疗发展，提升了农民的生命质量。基本的小疾小病得以有效解决。第二点，部分成为赤脚老师，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提升了农民的识字率。基本的小知小识得以有效推广。所谓赤脚，就是半农半医，或半农半师。赤脚医生看病领工资，此外还要参加劳动领工分。赤脚老师也一样，有课上课，课余也要参加劳动。维持赤脚医生和老师的费用很低，完全在农民们的承担范围之内。因此，这一阶段农村地区的医疗和教育的发展，很少依赖国家财政的支持。至于改开以后农村医疗和教育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就不多说了。话说回来，在输入工人先锋和机械力量的情况下也照样可以取得知青下乡带来的这些好处，而且只会更多更快。）

## 棍子扯文革（七）猪队友、投机客和逍遥派

这一篇来试着解剖三只麻雀：猪队友、投机客和逍遥派。这是在任何斗争中都不会少的三种人。

扯猪队友，是因为在关键时候，丫们危害很大。不是有句话，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么？当我们碰到神一样的对手，同时却有猪一样的队友时，岂不更可怕么？对于猪队友，那就只能用其所长，但不能置于关键位置，尤其不能参与到关键行动当中。否则，我们会死得很难看。本篇要扯的猪队友，就是文革派一员戚本禹他被周恩来坑的还最后疑惑王力关峰张江都提醒了，而且周制造红都女皇这种黄色谣言。这还是戚本禹自己的回忆录里透露的。我们摆这个例子，是为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由猪队友戚本禹的失误，又引发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是典型的投机客。我们认为，对于投机，警惕是必要的，恐惧就大可不必。有人投机，正表明了自身力量，投机也是增强力量嘛；因为，投机，那也是要为了胜利博上一把的嘛。投机的最大危害在于力量趋于衰弱之时，这个时候，就要无情地清理投机者；而且，投机者的面目通常只会在这个时候才充分暴露出来。力量增长之时拒绝投机者，是左倾冒险；力量衰落之时容忍投机者，是右倾投降。文革派处理杨成武果断及时，但对林妹妹集团就警惕不足。

还有所谓逍遥派。我们扯这个事，不是因为它有多重要，而是要表明，在阶级斗争当中，不存在神马逍遥派。阶级斗争是个大漩涡，对立双方都在漩涡里搏杀，都不允许有人站在漩涡外面旁观。看到旁观的，就拉下水，是敌是友，都得下水。是友，那就并肩作战，合力击敌；是敌，那就你死我活，各显神通。杨余傅，就是典型的逍遥派。不过，更准确地说，根本就没有逍遥派，而只有臆想逍遥派。也就是说，实际的社会运动中，根本就不会存在逍遥派，而只有意淫自己逍遥的派。当逍遥派遭受打击之后，如果就此挂逼，那就是炮灰的下场；如果还执迷不悟，那就还是炮灰的下场；如果挺过来，并且立即明白过来，所谓逍遥都是自己的幻想，那么，就会抛弃幻想，选择站队，投入斗争。因此，逍遥派，最多只是暂时的存在。阶级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阶级的成员，要么是这个阶级，那么是那个阶级。而阶级斗争是绝对的运动，因此，一个人，要么主动地投入战斗，要么被动地被卷入战斗，而不会逍遥于战斗之外。下面，来具体看看三只麻雀。

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文革派猪队友一犯错,张春桥劝都劝不住啊.还去找周仲尼,周仲尼估计乐开了花:哪来这么个二货?我们要从这个错误中学习神马教训呢?首先是舍卒保车.舍卒保车则车存,车存则卒存.舍车保卒则车亡,车亡则卒亡,不亡也散.张春桥已经说的很明显了,戚本禹真尼玛榆木脑袋.阶级斗争如此凶险,一切以阶级利益为准,神马自尊心,道德感,都是工具,凡阻碍阶级利益,妨碍阶级斗争的,统统都得抛到一边.苦逼本来就处于弱势,还成天背着这些坛坛罐罐,吸食这些精神鸦片,想不死都难.其次是重要行动只找自己的铁杆队友.尼玛周仲尼是神马人?即便不能明确是敌,至少不能断定是友吧?只要不能断定是铁杆队友,那就不能把重要行动交托出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人身上.第三,铁杆队友的话要多听,多琢磨.尼玛张春桥说这么直白,白痴都该懂了.一次不听伤感情,两次不听伤信任,三次不听你就要被当叛徒,至少是猪队友了.猪队友也好,叛徒也好,从客观上来说是一样的,那就是破坏本阶级利益,损害本阶级斗争。)

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

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回忆江青同志》)

(文革派猪队友再犯错,张春桥再教育.又去找周仲尼,周仲尼又乐开了花:哪来这么个四货?那么,从这次错误中我们要吸取神马教训呢?首先,信任,不只是嘴上说的,更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平日里,嘴上说如何如何信任,但关键时候从行动上表现出来的是不信任,那实际就是不信任,那就不会获得别人的信任.其次,队友之间要坦诚,有啥都摆到台面上,别藏着掖着;有情报,要及时共享。)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回忆江青同志》)



（文革派猪队友三犯错，江青失去了耐心。戚本禹到死也没明白其中利害，还纠结到底是确有群众江倩，还是敌人伪造；还纠结于神马真相。不管是误会，还是陷害，显然客观上已经陷江青于不利境地，给敌人提供了搅屎的机会。因此，这个时候应该掌握主动，迅速站队，展开反击。反击中犯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根本意识不到要反击，却纠结于神马真相不真相。敌人难道有空跟你来场辩论？这就是我们要从这个错误里学习的教训。同时，整个三次错误也告诉我们，心里怎么想的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在阶级搏杀中，不是损人就是损己，至于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根本不重要。无心之失多了，就成了猪队友。猪队友和叛徒一样有害，对待叛徒，无需犹豫，直接肉体消灭；对待猪队友，谈不上肉体消灭，但至少要将其从重要位置上挪开，否则，就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

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来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回忆江青同志》）

（戚本禹这样的猪队友，还是先请假休息一下为好。自己好好反省反省，有了长进，再出来战斗。要是没有长进，也不用再归队了，因为只有弊而没有利。）

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就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回忆江青同志》）

（碰上这样的猪队友，文革派别提有多郁闷。张春桥已经警告过多次，丫自己老不听，一直没啥长进。到这时，张姚还能出来喊话？丫们能蠢到再把自己栽进去？都这么傻，那还是趁早洗洗睡了吧。）



在贺龙问题上，杨成武表现积极。林妹妹牵制贺独眼，主要就是依靠杨老龟。叶群提级是杨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的，罗当时很尴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杨老龟独占倒了贺的功劳。以至于罗长腿连连说：“我考虑不周，我考虑不周”。倒贺自然是大有利于林妹妹的，对杨老龟也是好处多多。文革派也倒贺，所以杨老龟也顺势得到了文革派的垂青。在与罗瑞卿的斗争中，杨老龟和竹叶青出力最多。65年底的上海会议前，杨老龟是到了杭州参与向毛汇报的。此前，关于罗的问题，竹叶青和聂老五给不少自己的老部下打过招呼(是谁授意叶、聂的呢?) 在倒罗的问题上，肖华也立了功，但他与罗有私人恩怨。上海会议后，他们三人把罗的职务瓜分了，所以，他们受益也最大。

肖华在文革中倒台，原因种种，但主要的“倒爷”还是杨老龟。肖在西山调戏的女服务员，都是杨认认真真交代总参管理局政委严峻从女服务员手中拿到铁证的。严政委不愿意，杨大骂严。68年初，在京西宾馆，总参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杨老龟安排一干部大批肖华，大喊砸烂总政阎王店。大会还把肖华、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等“阎王”拉上台批斗，温玉成坐在主席台上督阵。杨的子女几乎全部到场，坐在会场左前方（现在有几个已是将军）。

杨老龟回到北京就调兵遣将，搭班子，搞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大力颂扬老毛。又在军博搞《红太阳》大型图片展览，老毛和江青都有单独大照片，周仲尼反而没有。杨余兴未尽，接着又搞《大树特树》……这是一脉相承的。后来，有一个杨因小失大的事（余立金的秘书单士丛(有老婆)与杨的女儿杨易谈恋爱的事，杨为了护犊子，把自己搞的团糟）。老毛发现，杨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客，小聪明有余而坚毅不足，难堪大用。对待投机客，有用就用，不能用了就踢。投机客本来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谁有用就吹捧跪舔，谁倒霉就踩上几脚。

前面博文讲到六七年八月份王关挨了老毛批评，后被投入秦城。后来猪队友戚本禹也于六八年一月份受挫。“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回忆江青同志》）文革派势力上升，就各种阿谀奉承。王关戚一朝入狱，丫就落井下石。

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职务，同时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原军委常委会及其所属机构停止工作，军委办事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黄永胜取代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河蟹党屎》）

斗争形势急剧变化时，临时设置的组的权力，大于受到冲击停止工作的常设机构。当时有很多逍遥派，文革没有触及到这部分人。被斗争推到风头浪尖的，能逍遥吗？于是周“推荐”杨负责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十个案件有一多半跟老军头有关，接了烫手山芋后杨左右为难，不久就因为“两面派”被搞倒

黄永胜接替杨担任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负责 10 案：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叶向真案，汪金祥案，解方案，贺龙案，四三案，无线电案，刘志坚案（《河蟹党屎》）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毛泽东传》）

（周仲尼老辣，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还为老毛说好话，给自己贴金；又时刻不忘把林拉出来鞭尸。）

最后，来扯一扯逍遥派。其实我们扯所谓逍遥派，恰恰为了表明没有神马逍遥派。所谓逍遥，只是逍遥者自己的臆想罢了。

这位逍遥者在文革的时候是某造纸厂劳资科的科长。这位科长属于老毛的忠实拥护者，和群众关系都不错。以前收芦苇造纸，湖区有血吸虫，一般干部都不下湖，他就经常亲自下湖收芦苇。结果就得了血吸虫病。按照规定，因公得病有补贴，这位科长脑子太死，说干

部工资已经够高，不用拿补贴，结果就被老婆骂鸟。（嗯，据此可以看出，家属是官逼贪腐的最大推动力。）

在文革中，这位科长既没参加造反派运动，也没有参与保皇派。但平日里他口头上是反对官逼们搞特权的，也反对保皇派搞武斗。大概他做干部工资比较高一点，没那么大动力去大搞批斗、争利益，但对工人工资不高也是同情的。由于他没有直接参与造反派，所以走资暂时没有动他。他口头上反对官逼们搞特权的，也反对保皇派搞武斗，造反派应该及时跟进，拉他入伙。像这样群众关系比较好的，更应该积极拉拢。俺们认为，没把这样的人拉拢过来，这是造反组织工作上的一个失误。造反派以为，不应该把他卷入到斗争中来，以免受到打击。事实上，阶级社会不会有无辜者，打击在资复辟后如期而至。

矮子上台后立即把厂长换成了矮子分子。这位科长还是在口头上反对矮子的一些做法（和文革时期一样没有搞大的批斗和大字报），于是就被提前安排退休，从主管采购和招工的超级肥缺的位置挪开。其他采购都赚得盆满钵满，就他啥也没有。晚年每个月一千多退休金，住养老院里。（因为儿子们都和孙子合住鸽子笼）后来又中了风，最终穷困潦倒而死。

这就表明，所谓逍遥派也是不能逍遥的。你不彻底站队，彻底将对手打倒，对方就要打倒你。逍遥，说到底，就是缺乏阶级觉悟。哪有神马逍遥派？激烈的阶级搏杀中，肿么可能有逍遥派呢？哪种人有资格当逍遥派呢？嗯，俺们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没有力量，因此无利无害的；一种是力量非凡，完全超出矛盾双方的。后一种人，显然不存在嘛。老毛这样的，也只能迅速站队。至于前一种人，倒是有，那就是死人。活人，就有力量。连老弱病残都还是有力量嘛，也要选择站队的嘛。至于那些号称的逍遥派，实际上只是暂时观望，或者一时不知利益所在，犯了迷糊而已。他们或者被动卷入斗争，稀里糊涂当了炮灰；或者及时醒悟，主动站队投入搏杀。因此，逍遥总是极为短暂的，站队搏杀才是绝对的运动形式。

那么，我们要如何对待逍遥派，确切地说，如何对待试图逍遥的人呢？基本的策略是一拉二打三裹挟。对于本阶级的逍遥派，也就是没有明确站队的，首先是拉。只有通过实际的斗争，他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阶级情和阶级仇，真切地体会到神马是阶级的利益，真切地领悟到单个工人就是个屁，真切地认识到个人利益只有和阶级利益相捆绑，通过集体的联合斗争才能得到实现。对于敌对阶级的逍遥派，也就是没有明确站队的，主要是裹挟。通过使其卷入斗争，从而产生和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我们裹挟敌对阶级的逍遥派，

主要是为了制造敌对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从而便于我方展开斗争，并且有利于扩展我方斗争的战果。

至此，本篇已简单分析了三种人物，当然，周仲尼这样的对手，当然更值得大加分析。关于周仲尼，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觉悟，增强自己的认识。再神一样的对手，也只是一个人，离了阶级力量的支撑，照样屁都不是。所以，最重要的，依然是阶级的力量

## 棍子扯文革（五）一月夺权与二月逆流

2015年10月30日 18:18 阅读 998 [新浪博客](#)

工总司被承认之后，就顺势展开了运动，对前期搞镇压的市委和上海各媒体机关展开反击。老龟命们见势不妙，纷纷罢工撂挑子。造反派也是不客气，张屠夫走了，我们自己剃猪毛便是。这就是所谓的一月夺权。军中走资一直脾气大，明里暗里各种搅屎。有一次听说老毛批中央文革，丫们以为反击的时候到了，于是在周仲尼主持的碰头会上对文革小组的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掀起二月逆流的高潮。老龟命陈毅和谭震林，成为资中猪队友；文革小组实施反击，林加入，攻击力增强，老毛施以援手，结果拿下几个军中老龟。

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毛泽东传》）

（上海革命基础还是要比其他省市好很多，一是产业工人多，阶级力量强；二是老柯一直坚持无的路线，因此留的底子要好一些。）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毛泽东传》）

（王洪文，时为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干部，他听托猪的合法建议了吗？各路合法托派，工运服务商们还在争这权那权，唯独不考虑壮大自己的力量，破坏生产，阻断流通。托猪们倒是和老板一样，认为这是流氓行径，哈哈。）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毛泽东传》）

（先把舆论工具拿到手里，为造反活动宣传造势。政府位置空了，当然得上。阶级斗争不夺权，那还斗个毛。张春桥们好样的。不过，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纵观整个文革，无只有在上海掌握了政权，其他各省市，始终都是资力量掌权，即便到了三结合革委会，依然是资力量占上风，死死压制无的力量。第二，即便是上海的所谓夺权，也不过是接管罢了。各路资比主动罢工不干，试图以此相要挟，无当然不吃这一套：你们不管，我们来管，有神马大不了的。其余各地的所谓夺权，也都是如此。党政资逼们见形势不好，都穿上军装躲到军队里寻求庇护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党政机关瘫痪，所谓的大混乱。资逼们觉得糟的很。我们觉得好得很。本来就是要夺的，丫们自个儿放了，我们当然要去接嘛。说是夺，那也无所谓嘛。反倒是对造反派革命精神的赞扬嘛。我们倒是乐意看到这样的现象。）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

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毛泽东传》）

（管理工作很神秘？官僚都是神秘物种？丫们平日躲在各种高楼大厦、机关大院里，搞得神秘秘，深不可测；说话假模假式、故作高深，还真能唬住些个平头百姓。造反派们接手一干，发现不过如此嘛。老毛表示确实如此。资逼们以为撂了挑子，造反派们就得束手无措，闹笑话了。结果事与愿违，死了张屠夫，咱还是不吃混毛猪。一开始不懂，那也没什么嘛，谁还不是从不懂到懂。就是要在管理中学习管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论抗日也好，反蒋也好，要是抱着非老兵不上战场、非老将不能取胜的执念的话，那土共还是趁早洗洗睡了吧。）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毛泽东传》）

（既然掌握了舆论工具，那就开足马力搞宣传。物质批判要搞，舆论攻势也要造。）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毛泽东传》）



（力量到了，追认的合法就来了。半年前还是临时性质的文革小组，现在已经齐名于传统常设最高权力机构，并且成了能动性最高的机构，引领斗争方向的机构！投机进入的其他势力代表，都要重新站队了。墙头草是挨操的。“先进经验”当然要及时推广嘛。）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毛泽东传》）

（我们认为，河蟹师爷的分析有道理，很中肯。）

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毛泽东传》）

（工人就是要在管理中学习管理，在革命中训练干部。）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



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样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回忆江青同志》）

（这个时候就可以判别各种立场了：周仲尼明显走资，春桥、江青同志立场坚定，老毛支援给力。）

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带动下，山西省，青岛市，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先后在半月内建立革委会，接管原先的省委和人民委员会，党、政、财、文等一切领导权悉归该委员会“接管”。逐步觉悟的群众，纷纷离开造反队伍，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反过来以种种形式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河蟹党屎》）

（从这里俺们看到的是逍遥派的屁股，绝不是无这一方。所谓不觉悟的群众，从来就不存在。群众依他们的经济屁股和社会关系，决定在文革中的站队。这些群众很觉悟，国家免费大串连，到哪里都是主席的客人吃喝免费，为啥不串呢？可以批斗骑在头上的领导，厂长，为啥不批呢？）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传》）

（从来就不是个别人物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问题。各自有各自的先锋队在国内代理。怎么斗？那不是拍脑子就能想出来的。总是底下群众动起来了，先锋队

及时站队，及时跟进，不断总结经验。一路下来，也是矛盾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群众才普遍地动起来。在运动中，出现各种斗争形式，先锋队就是要在无的立场上加以选择推广。）

周不能否定夺权，但竭力把它的含义解释为夺取“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权，而非全部党、政、财、文大权，一些党政机关业务部门的权力仍应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河蟹党屎》）

（周的立场始终与文革小组对立，代表资路线利益团体极进曲解之能事，你见过不要党政财文权的革命领导权吗？空中楼阁？）

“一月夺权”后，张春桥在上海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对所有的权都要夺”，即所谓“全面夺权”。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在随后的尖锐冲突中不断表现出来。（《河蟹党屎》）

（搅屎与反搅屎——你不说那四个权，我还不知道要全面夺权。）

打倒陶铸，显示了文革小组陈、康、江等人在政治上握有超乎寻常的特殊权力。继陶铸之后，刘志坚，萧华等，也先后被林、江、陈等人打倒（《河蟹党屎》）

（并非陈康江三人有什么特殊“权力”，而是康生经验足，深得群殴的要领：集团对抗，要逮住对方一个人，往死里打！最好是最霸道嚣张挑头的，像陶铸这样的硬骨头，打倒一个起到震慑作用！示范作用极佳！这种方法，同样适合少对多和多对多的群殴。）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毛泽东传》）

（哈哈，被走资篡了权的“社会秩序”，走资的各级组织，走资的群众基础。资分子觉得糟的很，俺们觉得好的很。）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毛泽东传》）

（老龟命被捅到 自然很不理解；这下又被动了奶酪，那就强烈不满鸟。）

1月19、20日，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军队开展“四大”。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保家卫国。

（弱小的无面对强大的资，是和平竞赛，还是主动进攻？道理同群殴）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毛泽东传》）

（毛这时的批评显然是个忠告：你们不要冲的太靠前，还得多和我商量着来。老龟命们看到漏洞，立即像苍蝇见了屎一样兴奋不已。丫们以为发动反击的时候到了。）

在2月16日的碰头会上，叶斥责康、陈和张：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叶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河蟹党屎》）

（想干什么？明摆着就是要捅你们菊花嘛。）

“聂也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河蟹党屎》）

（聂帅锅，你介是此地无银，不打自招嘛！你咋不说说北京八一中学（荣臻学校）里面的红二代资崽子们，在去年夏秋，干了啥黄四郎冒充张麻子的事情？师大附中的同伙都干了啥事？清华附中的？东纠，西纠，海纠，联动……资团队从中央到地方的接班人们都干了啥？周仲尼为啥特地安排贴身秘书指导你们崽子的活动？说说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不是时髦反思嘛，忏悔嘛，道歉嘛！“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神马？”）

“会上，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作了措词尖锐的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抨击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这便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河蟹党屎》）

（当措词尖锐的时候，往往是处于下风的时候；当能用力量解决对方时，是不需要废话的）

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毛泽东传》）

陈老龟老婆和仲尼后来 73 年阴谋骗毛让邓复出

2 月 16 日晚，陈毅还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长篇讲话，猛烈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卑劣行径（《河蟹党屎》）

（尼玛周派工作组收拾聂元梓，是因为北大学生在校内搞大字报不避着留学生（留学生可以不走三角地嘛），陈立马就对留学生发表长篇训话。介充分说明文革的必要，为啥“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毛泽东传》）

（陈老龟 害了大家，成为一枚猪队友。）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 年 2 月 17 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毛泽东传》）

（谭老龟也是糊涂蛋，反革命 送到自己敌人手里，又是猪队友一枚。林 加入斗争，形势发生逆转，资军头遭到压制。）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 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 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 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回忆江青同志》）

（谭震林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应该是属于被裹挟。毛江对谭还是手下留情了。）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陈缺乏信心畏缩，当年延安整风就是老康主抓，得罪的人多了去了。康陈一比，高下立见。）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

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毛泽东传》）

（周仲尼继续搅屎。 文革是路线斗争，双方都是利益集团代言人，玩制衡，和稀泥，难道大家就停火啦？）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毛泽东传》）

（事实证明，和稀泥没有用，改善处境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立场。不过停止政治局活动，由中央文革碰头会代替，也算无的一个斗争成果。）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无方还是采取主动进攻。先是工总司对前期搞镇压的上海市委和各媒体机关展开反击。老龟命们见势不妙，纷纷罢工撂挑子。造反派接管部分工作。这便是所谓的一月夺权。军中走资一直脾气大，明里暗里各种搅屎。有一次听说老毛批中央文革，丫们以为反击的时候到了，于是在周仲尼主持的碰头会上对文革小组的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掀起二月逆流的高潮。老龟命陈毅和谭震林菊花四放，成为资中猪队友；文革小组实施反击，林加入，攻击力增强，老毛施以援手，结果拿下几个军中老龟。老毛心慈，还是不断改善老军头们的处境，但是丫们并未因此改变立场。可见光靠仁慈是木有用滴。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

## 棍子扯文革（三）批资反路线

2015年10月28日 08:26 阅读 533 [新浪博客](#)



前文说到，撤销工作组之后，老毛认为需要对文革如何进行做一个更具体的指导性纲领。于是老毛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最终通过十六条，确立基本方针、斗争方式、斗争对象等，形成比较完整的纲领。决议遭到众走资干部的抵抗，冲出校园，起来造党政干部反的红卫兵们受到走资干部的压制。老毛表示不满，合作伙伴林陈积极表现，共同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进运动发展。刘邓靠边站，周仲尼搅屎忙。走资先锋还在走，老毛坚持搞政工。苦口婆心没效果，只得再加攻击力。

八月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当时宣布会议时间为五天。（《毛泽东传》）

（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来是要巩固前期战果，二是提出后续战斗方针。）

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他又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指责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毛泽东传》）

（唇枪对舌剑，针尖对麦芒。修养以组织瘫痪为理由，老毛直接否定。）

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毛泽东传》）

（所谓正式决定，首先是斗争的成果，其次要由斗争来维护。指望发个文件，定个宪法就万事大吉了，那是纯粹的幻想。文件也好，宪法也罢，既是斗争的结果，也是斗争的工具，没有以自身力量为基础的斗争活动，这些玩意儿就是一纸空文。）

同一天，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毛泽东传》）

（老毛只是鼓励、助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现实矛盾，老毛喊破天也不会有神马普遍的红卫兵组织。当然，我们一点都不否认老毛的重大作用。他作为无先锋的代表，处在那样一个重要位置上，其一言一行当然都牵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整个阶级本身的组织和斗争。）

八月四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毛泽东传》）

（哈哈，那些走资党干不恰恰是随时随地以党的化身自居的么？无产群众反对他们，那就是反对党；由他们来领导，那才叫党的领导。再问一次：中央，是谁们的中央？嘿嘿，河蟹党现在不是搬出来个禁止妄议中央的党纪么？资专政这么些年了，此时搬这么个条例出来，是指望整肃党纪，焕发第二春么？）

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传》）

（老毛直指修养要害：你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实施专政。）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传》）

（竹叶青胸有成竹的其实是：我们有几百万军队，还怕那些造反派翻了天不成！老毛直言军中就有牛鬼蛇神。竹叶青就是个大鬼嘛。老毛尸骨未寒，丫就密谋把他的亲密战友江青同志给投到牢里去了。）

随后，毛泽东给这篇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八月七日印发中央全会。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立刻改变了原有的议题和日程。这段文字中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这主要是指刘少奇。它最后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还有他在八月八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可以看出，毛泽东写出这篇文字，并不只是从“五十多天里”的“工作组”问题上引起来，而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中央领导层中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的结果。（《毛泽东传》）

（河蟹师爷分析有理：老毛的大字报是长期存在的分歧的结果。不过，河蟹师爷说的又不对：不是神马意见分歧，而是立场上的根本对立。）

这张“大字报”一写，并且印发中央全会，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选是林彪。他作这样的选择，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全会的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候补委员三人，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被列为第二名，而刘少奇却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组织。 此时林和陈伯达是无的合作伙伴。此次结果，资无力量七比四，资依然占上风。而且资依然牢牢掌控经济部门和组织部门。）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称为“十六条”）。《決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斗争对象：走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決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方针：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

《決定》还肯定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方式：用文斗，不用文斗。）

强调当前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毛泽东传》）

（确立基本范围。）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它所作出的决定，使中共中央从法定程序上确认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政策界限和组织措施。有如箭在弦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内乱的发生已经不可逆转了！（《毛泽东传》）

（纲领制定完毕，那就开干吧。）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毛泽东传》）

（矛盾就在那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毛积极助推，鼓励群众起来造反。学生朝气蓬勃，富有造反精神。学生也不单纯是学生嘛，他们或者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或者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不出来运动，不通过运动来锻炼成长，那是成为不了合格的接班人滴。失败了也没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再来就是。）

8月18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革”的集会上，毛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和各地普遍建立。（《河蟹党屎》）

（此时的北京有些像二月革命之后的彼得格勒，形式急剧变化，各方势力抱着各种目的纷纷涌入，都不明白怎么回事。随着斗争形势渐趋明朗，矛头直指资路线，各方势力才排队开干！）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毛泽东传》）

（学生也不能老在学校里造反，既然是接班人，那就要冲出校园，到社会上动一动嘛。）

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毛泽东传》）

一些红卫兵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河蟹党屎》）

（把人搞成“黑五类”而殴打致死，这种事只有高干崽子干得出来。丫们在校园里就已经干过了，工作组也没少干这样的事。河蟹党史也是遮遮掩掩，就是不说那些鼓吹血统论的是谁。高干崽子早早继承老爹们的阶级立场，耳濡目染老爹们的斗争意识。再加上老爹们的幕后指挥，丫们当然不放过任何一个搅屎机会。在土共党内，看不上神马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的干部多的是：我们出生入死，丫们寸功未有，凭什么活得这么潇洒，还一天到晚唧唧歪歪，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因此在之前的党外反右运动中，这些干部就出过大力了。对于这种资内部的斗争，我们当然乐得旁观。但我们从来不指望丫们的内斗会对我们造成实质性的利好。俺们永远只能靠自己，只能抓住一切机会壮大自己的力量。资社会老板们也内斗，甲老板灭了乙老板，丙老板吞了丁老板，这样的事时刻都在发生。难道我们能指望老板的内斗削弱资产阶级的专政力量？恰恰相反，竞争胜出者将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成为更可怕的敌人。工屁只能争分夺秒地拉帮结伙，在斗争中壮大自己。）

“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毛泽东传》）

（在资看来秩序大乱令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无先锋队看来，斗争才刚刚开始。需要担心斗争被利用被投机吗？根本不需要！被投机说明你有力量嘛。没力量，谁投机你？又有左逼说，大家都说马列毛的语言，都分不清到底谁是真的，谁是装的了。我们觉得这个担心也很可笑，大家都说，首先表明无产力量的壮大，不然谁会用你的语言啊？其次，你看一个人的立场，不仅要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嘛。左逼总是把别人都看得跟自己一样傻，哈哈。走资们觉得学生上街啦，大串联啦，学不上啦，不得了啦，糟的很呐。老毛很淡定：好的很，接着搞。）

最使周恩来感到焦虑不安的，是“破四旧”中发生的对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的侮辱、打骂、抄家等行为。对党内的同志，周恩来多以“一定要经受住考验”这样的话来鼓励他们，要他们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严于律己，多作检讨。而对于受到冲击的党外人士，就不能那样来要求了。他想方设法来劝阻和约束青少年们种种无知的、粗暴的言行。（《周周仲尼传》）

（还是周仲尼最有大局观：红二崽子们啊，你们不要瞎搞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人，是咱们的力量啊；苦逼崽子们斗，因为民主人士、高知分子就是他们的敌人，你们可不能敌我不分，搞错斗争方向。）



八月底九月初，周恩来亲自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包括十条内容。《意见》强调：“目前最急迫的任务是组织起来，学习和掌握政策”，“不能各自为我，违反纪律”。针对已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大串连，周恩来写道：“我们提醒你们，实行革命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机密不致外泄，档案不致遗失，财产不受损失。要保证国家的专政工具正常行使职能。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我们还要提醒你们，同厂矿、科研机关和服务性行业实行革命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意见》还就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等作出一些具体规定。

九月三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讨论《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会上，陶铸、陈毅、王任重等明确表示赞同。康生却表示反对，说：“十个问题，需不需要讲？我看有代替的危险。”姚文元也话中有话地提出：“应该用阶级分析讲政策。”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反对，这个《意见》稿最终还是夭折了。（《周周仲尼传》）

（周周仲尼搅屎，无先锋果断反击，阻止周仲尼往学生运动头上套条条框框，束缚手脚。但是，周仲尼的文件虽然没有通过，搅屎活动依然进行。）

“就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对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常常估计不足，对于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的来到，精神准备不够，总是要想办法，把它分步骤，或者分期分批加以约束、限制。”（《周周仲尼传》）

（约束、限制，这就是周仲尼搅的屎）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机关，而工厂、农村、服务性的行业应由那里的干部群众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去进行必要的革命串连，但不能像在学校里一样，冲进去，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的秩序，建设的秩序。”（《周周仲尼传》）

（既然是无专政，那就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嘛，工人学生大串联就没什么不可的。既然是无专政，那各行各业就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嘛，革命的秩序就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秩序，建设的秩序，就应该是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建设的秩序嘛。既然工人阶级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自己的专政受到了破坏，那理所当然要起来反抗，这才是专政者应有的态度嘛。一切秩序都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准嘛，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秩序，拿秩序为幌子来搅无专政的局，就应该受到工人的反击嘛。）

“总之，你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爱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他人士，甚至剥削阶级分子本身。”（《周周仲尼传》）

（本来斗争的主要对象就不应该是那些“死老虎”，而是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新产生的剥削者，是现实地处于剥削地位并坚持维护剥削关系的阶级，是要通过斗争这些力量来消灭一切剥削关系，消灭滋生新的剥削阶级的土壤。至于斗死老虎，本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斗死老虎的，当然既有高干子弟组成的黑卫兵，也有工人子弟组成的红卫兵。高干子弟斗，那是属于内部斗争。工人子弟斗，那是属于算旧账新仇。包括破坏文物之类的，两拨人都干过。有些左逼站出来洗地，把斗死老虎、破坏文物、迫害知识分子之类的“脏水”一股脑儿泼在高干红卫兵头上，替工人红卫兵洗地，纯属滑稽之举。这些举动，既没必要否认，也没必要反对。斗就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工人造反派一起来，斗争目标就锁定在直接压迫他们的那些人头上，这些人可不是什么旧剥削者，而是新产生的剥削者，他们才是走资派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根基。）

由于周恩来的地位、声望，尤其是他入情入理、循循善诱、平等待人的讲话风格和广博的知识、宽阔的胸怀，使许多青少年深受教育。以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后来同东城区、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组成“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学生组织，就是在这种影响和事实的教训下，开始怀疑或抵制一些无政府主义言行，逐渐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不满。（《周仲尼传》）

（西纠、联动是些什么货色，稍微了解一些文革史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河蟹师爷都明示他们是受了周仲尼的影响而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不满，并且师爷言语中流露出对他们的赞赏。这是在夸周仲尼工作做得好，培养了西纠、联动这样的反中央文革的急先锋。周仲尼

劝导高干子弟们不要把矛头对准死老虎了，他们已经不是什么敌人了，连内部矛盾都算不上了。周仲尼让高干子弟们看清楚，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中央文革这帮人，以及这帮人的支持者。周仲尼强调，认清敌人，这是反革命工作的首要问题。）

对于各地频繁发生的各种涉及政策法律的事情&周恩来也常要亲自处理'九月十九日，他对中央给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被批判、斗争对象工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稿作了修改，并将报告中“凡属定性的暂时只发给其本人及需要由他供养的家属生活费”一句，改作：“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将报告中“凡未定性的，工资可暂发给”一句，改为：“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周仲尼传》）

（这就是所谓的迫害！被定性的还有工资可领，本人及家属生活无忧。但周仲尼就是把这当成迫害：不行，工资也不能强行减少！人家愿意少领那是人家觉悟高，你们克扣削减就是居心叵测，就是迫害。未定性的工资绝对不能变，依然好吃好喝待着。这就是所谓的迫害！老龟命们还得感谢迫害者，感谢他们帮老龟命们去了三高，得以在复辟后再过几十年好日子。这可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反观丫们对造反派的迫害镇压，那只能说无所不用其极，不斩草除根不罢休。去他妈的怨前毖后，治病救人！屁股决定脑袋，丫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丫们不可能悔改，给丫们一万年他们也不会和无产阶级尿到一个壶里。一切不从根本的阶级地位，不从生产关系着眼的反修防修都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

他反对造反派在工作组及其他问题上对领导干部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以至采取群众“罢官”的做法。九月初，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议《关于党政军高级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草案）》的文件稿，设法对中央和地方的大批领导干部进行保护。这以后，他始终坚持各级领导干部不能由群众组织来定性、“罢官”。（《周仲尼传》）

（周仲尼一声怒吼：什么群众，分明是暴民！暴民还想翻天，大胆！我们连经济待遇都不让，更何况关键岗位！坚决维护领导干部，坚决打击造反暴行！）

周恩来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岗位，完成好生产任务，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河蟹党屎》）

（只要经济基础不乱，想唱红歌就唱吧！想骂娘就骂吧！物质力量只有靠物质力量才能消灭，周仲尼很清楚斗争的关键所在，造反群众当然也知道要害在哪里。）

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

（群众运动更加深入，走资干部反抗加剧。）

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毛泽东传》）

（走资干部反抗加剧，表明丫们立场坚定，力量强大。刘邓已不在，反对力量还那么大，只能表明一件事：朝里还有人，党内还有派，党外还有群。因此，有必要再加大进攻力度。）

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毛泽东传》）

（代表两个阶级，自然是两条路线。压制造反群众，镇压无产革命，那只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各领域、各地方、各单位，都普遍存在着阶级矛盾，那当然要把斗争往更深更广处推进。）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传》）

（文革小组火眼金睛，立即认出周仲尼这个大搅屎。刘邓已走，周仲尼还在。刘邓不算啥，周仲尼一顶俩。周仲尼自建国以来就一路搅社会主义的屎，对无的政策阳奉阴违，而且显然不只是文革小组对周仲尼不满，之前的造反学生就有不少反对周仲尼的搅屎姿态了。后面我们会看到，在造反群众中，一直有一股反周仲尼的力量，贯穿文革始终，但始终没有对周仲尼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传》）

（林积极表现，明确站队。若不如此，丫啥时才能跳出刘邓周叶党委、工作组的五指山呢？必须向老毛靠拢，才能搬动这座大山。）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毛泽东传》）

（林的师爷也积极表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毛泽东传》）

（林陈推造反运动之波、助造反运动之澜 还是无的伙伴，老毛也表示欣慰。）

工作会议之后，林、陈的讲话被大量印发，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造反派，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河蟹党屎》）

（这不是很正常吗？骑墙派，没有牢固基础，在斗争中必然快速分化。有经济基础的投机者，会被自己阵营推向风头浪尖，等到弄清楚文革原来就是要操自己时，就该分道扬镳了）

造反的群众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提出各自的要求（《河蟹党屎》）

（群众傻吗？不傻！知道运动会过去，机会来了，能搭顺风车就搭，能提要求提。现代人不要认为，那时人傻，是被误导利用。自称傻的人，往往不傻；认为别人傻的人，是在给自己的无知找借口）

10月18日，清华大学校内和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11月中旬，聂元梓率人前往上海“点火”，动乱进一步升级，市长曹荻秋等领导人受到批斗。正在住院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受到冲击（《河蟹党屎》）

（上海作为争夺的主战场并不偶然。资不强大的地方，无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斗争往往开始的晚。但基础好，后续的斗争往往更能持久。纵观整个文革，只有上海是无的力量压倒资，并建立了无自己的政权的城市。）

在冲击各级领导干部的过程中，各地还出现了“抓叛徒”活动。在北京发生了揪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事件。这是康生为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诬陷刘少奇而捏造的一桩冤案（《河蟹党屎》）

（路线斗争是本质，至于以什么形式达到，抓叛徒可不可以，贪污腐败可不可以，老婆崽子买法国别墅可不可以？这批文革期间第一批倒下的资代表，改开后全部起复委用。这帮

人中诞生了诸多清醒的 DXP 分子。从这个角度讲，文革无发动的第一拨“斩首行动”，可谓定位精准！再说，文革时候整所谓黑材料，并不是表明某某以前如何，而是为了表明某某一贯如此，死不悔改。看过《周仲尼搅屎录》系列的朋友，难道不是很容易就能判断拨清波的资立场么？老康精确打击，快而准。）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毛泽东传》）

（老毛还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方针。）

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毛泽东传》）

（老毛苦口婆心做政工，各级干部不领情，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走资路线。老毛失去耐心，那是迟早的事了。）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毛泽东传》）

（还是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样，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斗争。工农业不是没有矛盾，相反，矛盾太多了。周仲尼们一路搅屎过来，走资基础雄厚，怎么会没有压迫，没有矛盾呢？更为激烈，更为广泛的斗争即将来临。）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无方保持主动进攻，先是老毛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最终通过十六条，确立基本方针、斗争方式、斗争对象等，形成比较完整的纲领。准备开干。但决议遭到众走资干部的抵抗，冲出校园、起来造党政干部反的红卫兵们受到走资干部的压制。对此，老毛表示不满，而合作伙伴林陈则主动靠拢，积极表现，共同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进运动发展。此后刘邓靠边站，周仲尼依然搅屎忙。走资先锋还在走，老



毛坚持搞政工。但是苦口婆心没效果，那么只得再加攻击力。老毛还是太仁慈了，哪怕对待资路线的带头人，仍然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留有让对方回头的余地。可是想想，成为亿万富翁的老板，他们是在多少苦逼的白骨上面剥削的财富？成为老板代言人的官员，他们又递交了多少笔投名状？倒戈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决裂，意味着背叛原先所有的社会关系阵前倒戈，谈何容易？仁慈，在阶级斗争中，就是愚蠢！

## 棍子扯文革（二）对战工作组

前文谈到姚小文员的火苗点起了文革的大火。火势从文化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阎王殿被掀倒，大铁桶被踢翻。不过，代替一座阎王殿是阎王殿一座，代替一个铁桶的是铁桶一个。可喜之处在于中央文革改组，无力量占据主导，因此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斗争先是围绕对北京市委的政治批判继续展开。但学校革命师生出来造反，群众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老毛为代表的无先锋抓准时机，迅速站队，大力支持并鼓励师生的造反运动。但走资派立即反击，并掌握了斗争主动权，先是幕后指挥高干崽子们在学校里搅屎，斗学生，斗老师，也斗自个儿阶级的知识分子们。造反师生出来反抗，贴大字报。走资派反应迅速，派出工作组，名为维稳，实为镇压。老毛见状不妙，立即展开反击。造反群众也是奋力抗争。两相合击，取得战果，工作组被撤销。老毛对此进行反思，认为派工作组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河蟹党屎》）

（五一六通知发布，资无大战正式开启。）

这个通知事前经过毛泽东七次修改，一些重要的段落均由他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五一六通知”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为“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河蟹党屎》）

（老毛深思熟虑，制定斗争纲领，亲笔加写的段落反映了老毛对当时阶级矛盾、党内走资、政治形势等的清醒认识。说“盗窃中央的名义”说明老毛还没有把矛头指向修养周仲尼们。其实明眼人都知道，相对修养周仲尼们来说，彭真也只是个小将。当时“中央”可是对二月提纲加以了肯定的，由此才能发到全党。）

“五一六通知”还批判“二月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河蟹党屎》）

（目标很明确：清洗各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各领域的领导权。所谓清洗，一是降职，二是免职，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夺回被其所窃取的领导权。因此，清洗并不包括剥夺政治生命，更不包括剥夺自然生命。老毛还是想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套路。）

这个通知还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河蟹党屎》）

（被识破的有彭大刀、彭罗陆杨等，没有被识破的呢？比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虽然这次会议由刘修养主持，但这个赫鲁晓夫显然就是指他。据戚本禹的说法，刘少奇把朱德给说成了赫鲁晓夫：“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回忆江青同志》）不过朱德也确实如他所说一直在长征时候就和周勾结。话说回来，在俺们看来，刘修养不可怕，因为他斗争技巧比较差劲，容易识破，容易剿灭。可怕的是周仲尼这样的人，资产阶级立场坚定不移，斗争技巧炉火纯青，政治工作行云流水，保资护修手段高明。还有邓

矮子这样的，处低谷而不气馁，有机会就搅屎，能屈又能伸，能上又能下。我们号召无产阶级们向周仲尼和矮子这样的资产阶级敌人学习。学习他们坚定的阶级立场，学习他们坚韧的斗争意志，学习他们坚决的斗争手段，学习他们耐心的政治工作，学习他们审慎的斗争态度，学习他们高明的阳奉阴违。）

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因受到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阻挠而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河蟹党屎》）

（这些判断，无疑是有着广泛的现实情况做基础的。从建国以来资无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个时候，老毛已经把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层。最大的走资力量就在中央，那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的领导层出走资，那肯定看过《周仲尼搅屎录》系列的读者很容易看出这个司令部都有哪些人，老大又是谁，最危险的司令是谁。修养跳得比较高，搅屎活动搞得太明目张胆，所以早早被老毛盯上，时机一到，就被干掉。周仲尼们则是阳奉阴违，明推暗阻，各种搅屎都有很好的借口。我们在资社会下搅屎，也得向周仲尼们学习，用阳谋，那就得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学会打着蓝旗反蓝旗，用老板的手堵老板的嘴；耍阴谋，那就得拉帮结伙暗地里搞破坏，砸钉子挖墙角，保密工作要做好。那些脸上刻着革命二字的，分分钟就会被专政。这样的人，只会成为无产阶级们的猪队友。我们得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些话造成一种极度紧张的气氛，对会议和会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河蟹党屎》）

（林不失时机地站出来表态。我们认为，这个“非常恶劣的影响”很好。林用老毛来打鬼，老毛也可以用林来除魔嘛，有合作的基础，那就合作一把。）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名称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其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先后两个小组，名称虽然相同，但其性质和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全国的舆论工具。（《河蟹党屎》）

（林及陈伯达和无保持着合作关系的 现在成为无的工具！ 无也就是在舆论宣传领域算是占了上风。）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江青、康生等人已将会议的某些内容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凶猛。对吴晗的批判，进一步牵连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接着，又牵连到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文化界普遍感到惶惑不安。（《河蟹党屎》）

（既然掌握了自己的理论宣传工具，那就开足火力，进行战斗。看看邓拓和廖沫沙们的玩意儿吧，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垃圾文艺。各种明讥暗讽，攻击社会主义建设；各种插科打诨，宣传小资意识形态；各种附庸风雅，鼓吹封建官僚的所谓艺术旨趣。一个书记处书记，一个统战部部长，岂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党的领导干部带头攻击社会主义，宣传小资思想，难道不该批判？不该拿下？至于文化界，俺们就呵呵了。在周仲尼们的细心关照下，文化界可是一直滋润得很呢。端工农的碗，吃工农的饭，砸工农的锅，说的就是这帮子人。）

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实际的想法。毛泽东因此担心政治批判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以解决他深深忧虑的中国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寻找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突破口，以形成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社会压力。（《河蟹党屎》）

（哈哈，高级干部！问题首先不就是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么？丫们表示很难接受，不正是处于丫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么？老毛感受到了来自丫们的强大阻力，因此认识到简单的搞搞批判是远远不够的了。那么，接下来，必须广泛发动群众，以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恰在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违反周恩来关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的指示，于5月25日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河蟹党屎》）

（阶级矛盾无处不在，群众基础早已就绪，资无斗争普遍存在，上到庙堂深处，下到课堂厂房，干柴遍地，星火燎原。周仲尼又一次拿面子来搅屎。有留学生的地方就不能搞阶级斗争？还记得周仲尼在成都的那次表现么？那时，周仲尼因为有外宾在场，就没有对某社亩产十万斤的标语提出批评。外宾、留学生，在周仲尼眼里，全是神马民族面子，完全没有一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嘛。造反群众可不吃这一套，拿民族面子来压我们？想得美。对无产战士来说，永远是阶级利益第一。留学生支持造反学生，我们照样欢迎得很。留学生来贴党阀学阀的大字报，我们支持的很。还记得我们在《前言》里提的那几个“设想”么？现在就是了。设想你是个普通教师，如果你和大叫兽大文人一起执教。他们收入高出你一大截，成天吃香喝辣，又一副高高在上的鸟样，搞得地球离了他们就要停转，世界离了他们就要崩塌似的；丫们时不时给你穿小鞋，还成天发表些个烂俗的言论。这是不是压迫？如有机会，你要不要反抗？你要怎么反抗？如果有大官说对他们表示支持，又有人对他们表示斥责，你会选择支持谁？周仲尼们说他们批不得，你怎么看？你对周仲尼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6月1日晚，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聂等人这张后来被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一天，已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鼓动群众起来，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河蟹党屎》）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孔老二现在又借尸还魂了。当代衍圣公，吃喝抗日，旅游锄奸，网站致富，筹款敛财，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封建社会穿越到了现代化帝国，堂而皇之成为老板全面麻痹苦逼的工具。）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河蟹党屎》）

（联想起5月15日首都工作组保卫安全，和文革小组换血，毛在控制全局的情况下，没有搞阴谋袭击，定点清除掉，而是公开社论大鸣大放。对比一下10年后资路线的秘密反扑，秘密审判，不换思想就换人。他们为什么心虚？因为他们和所有的老板都一样有着共同的噩梦：一旦无再觉醒，就不会只是文革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传》）

（哈哈，学生起来了，学校党组织受不鸟了，不干了。）

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传》）

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代行党委职权”，对“文革进行领导”。（《河蟹党屎》）

（此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老龟命李雪峰，第二书记是老龟命吴德。北京市委反应很快，学生一起来，丫们就要派工作组进去打压。当然，丫们的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维稳。哈哈，换了老龟命，继续走资路。走资大军真的是人才济济，永续不绝啊。）

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毛泽东传》）

（刘邓表示还不够，要向各地大中学派工作组。有“中央”打包票，还有神马好怕的，放开手干吧。）

对各大中学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有所思》的七律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泽东传》）

（学生们起来造反，老毛表示很好：战斗吧，小将们！“神都”就是北京，“南国踏芳枝”指毛去武汉南巡。“青松”指无，“败叶”指资。“满街红绿走旌旗”指红卫兵们在北京城大街小巷贴的大字报，“潇潇雨”指运动来了的混乱情景，“故国人民”指全国各阶级的都在思考这次运动中如何站位。）

六月十日，他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毛泽东传》）

（老毛一开始就对派工作组的做法表示怀疑。发言就是喊话：群众很活跃，右派在顽抗，大家赶紧选队。）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传》）



（在运动中建立左派领导核心，这是整个文革成败的关键所在。这段话表明，老毛对于要害问题的认识极为清晰。以后的斗争，各地都冒出积极分子，但并没有及时建立领导核心，更没有在各造反组织之间形成有力的联系，中央文革和各造反组织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这样在整体组织上就很松散。因此，表面看上去似乎造反的人不少，但各地各自为战，甚至同一个城市的造反组织之间都没有完成整合，形成统一的组织，因此从整体力量上来说是很不足的。）

同一天，他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毛泽东传》）

（老当益壮，无产战士就是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后，宣布停止原校领导的职权，由工作组代行领导。组织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斗争，主持对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批  
（《河蟹党屎》）

（哈哈，“钦定”的革命，“批准”的革命，“合法”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你相信吗？工作组的目的昭然若揭——稳腩！同样也是全国铺开，党羽遍地。资工作组在运动初期，双方各打四十大板的方法，俺们只能认为是资对这次运动性质认识模糊的表现。资采取了上次 57 年反右时候的做法，红色政权后代对沽名钓誉的“独立”知识分子实施专政，清洗本阶级队伍。）

6 月 18 日，北大的一些学生避开工作组，将 40 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发生了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等行为。工作组发现后迅速予以制止

（资路线骨干。啥？证据？人民日报社论发了可以公开搞批斗，为啥这一小撮要私下搞？“一些学生”是谁们呢？难道不是高干子弟？难道不是陈小鲁们？丫们难道不是和工作组一个鼻孔出气？丫们斗所谓知识分子，高级教授和普通教师一起斗，再往工农子弟身上踩几脚，这就是所谓的“混乱”。受打压的造反师生们出来抗争，贴大字报。然后工作组进驻，尿盆子扣到造反的学生和普通教师头上，加以镇压。然后在河蟹党屎的叙述里就成了：造反学生制造混乱，工作组出力维持秩序。）

根据刘的意见，党中央于6月20日批转了北大工作组的简报。刘在为批转简报所加的按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照办。”（《河蟹党屎》）

（哈哈，中央是谁们的中央难道不是一清二楚了么？中央动作够快！资路线崽子们在当权派庇护下称王称霸，516通知发布之后无路线力量壮大，保皇派成过街老鼠，黄四郎的徒子孙们不能继续明目张胆的称王称霸，接下来会甘心交权吗？他们又会从黄四郎身上学啥招数呢？）

各地工作组在贯彻党中央上述精神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河蟹党屎》）

（哈哈，资无当然都是得到多数群众支持滴！阶级社会，先阶级再左右，群众这个菜筐里面可是啥菜都有。如果造反派是少数，为啥人民日报发文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资崽子唱的这出戏，就是黄四郎打手摸黑冒充张麻子手下，四处奸淫掳掠，转移矛盾，瞒天过海的俗套招数嘛！）

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刘、邓等领导人同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陈江康等的挑动和支持下，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到6月中下旬达到高潮（《河蟹党屎》）

（不是说工作组得到多数群众支持嘛，肿么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赶跑啦？工作组替谁撑腰不是昭然若揭吗？靠跪舔围观，转发关注，可以撵走工作组吗？力量，还是力量！）

7月19日、22日，刘两次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革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等多数同志的反对。由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立即撤出工作组，陈等的意见被否决（《河蟹党屎》）

（只想着合法跪舔的托派先生们看看，从来都是先有斗争，后有法律追认。托猪喜欢举李立三、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人罢工成功的例子来证明上街有用。俺想，当时一定是资本家良心发现，血液里道德成分噌噌上涨，才同意的工人涨薪等要求。）

对这件事，周恩来提出：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决定工作组撤与否的问题。（《周周仲尼传》）

（还是周仲尼成熟老练。不过这也可以说是分工。刘邓直接出击，周仲尼居中调节。这样，周仲尼就处在可左可右，可上可下，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矮子表示大哥如泰山，大哥不倒，我们就有保障。事实证明，走资兄弟们的配合相当给力。“报中央”，肯定是落在刘邓们手里，因此事实上还是走资要的结果。但周仲尼说报中央，就在程序上把自己撇干净了。）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毛对运动的进展表示很不满，认为北京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7月25日，毛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在京的各大区第一书记时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他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河蟹党屎》）

（老毛敲打工作组，是给刘邓改错的机会。对待刘邓这样的坚定走资分子，这无疑是太过仁慈了。）

毛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毛泽东传》）

（哪一派拥护工作组，哪一派反对工作组呢？谁在封杀群众对工作组的意见呢？看看当下，谁在堵截上访群众呢？工作组的这个做法，是不是跟信访办很像呢？）

毛认为规定“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7月28日，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也适用于中等学校”（《河蟹党屎》）

（这不准，那不行，总之得乖乖念口号，奉旨搞革命。造反群众奋起力争，老毛从上施加压力，如此才取得这些成果，打破了走资分子设下的条条框框。群众们不自己起来斗，老毛发再多指示，能有何用呢？）

撤出工作组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削弱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河蟹党屎》）

（彭真在位的时候，北京是一个铁桶；彭被撵走李龟命继任，北京是铁桶一个。文革前，资崽子和学校当权派穿一条裤子；捅翻了当权派来了工作组，资崽子再和工作组一个鼻孔出气。不斗行吗？）

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毛泽东传》）

（老毛认识清晰，及时总结，把准问题所在：派工作组，不是神马方式方法问题，而就是走资立场的体现，是妥妥的屁股问题。基调既定，那么，对如何进行文革作出进一步的更为具体的规定，就成为迫在眉睫之事了。可见，老毛一开始也没有神马非常具体的计划，而只有些大的原则性的想法。本来也是，只有左逼才一天到晚去搞神马制度设计；在设计出来个完美的制度，在设计出来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之前，左逼们是不会行动的。老毛清楚的很，神马制度，神马计划，都得根据具体的斗争形势来定。神马创新，神马方式，都鲜活地表现在群众运动当中。明智的人紧跟斗争形势，深入运动当中，细心观察，认真总结，及时提炼，如此才能得到切实的想法。再把这些想法加以扩散，化入群众运动之中，指导群众进行斗争，推进革命形势。这就是老毛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闭门造车，只能造出空中楼阁。）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战场是学校。各地造反师生早对学校走资领导诸多不满，于是纷纷起来反抗，贴大字报。高干崽子们则及时进行搅屎，一手斗同阶级的知识分子，一手压造反师生。如此搞出一片混乱的状态。走资干部迅速作出反应，派出工作组，掌握运动领导权。刘邓们认为这是“先进经验”，值得推广，于是“中央”开会，作出决议，全国各地都往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造反师生被压制，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老毛十分不满，发动反击，结合群众的抗争，打破走资派们设下的条条框框，撤掉了工作组。老毛进一步认识到，派工作组，不是神马方式方法问题，而就是走资立场的体现，是妥妥的屁股问题。因此，对如何进行文革作出进一步的更为具体的规定，就成为迫在眉睫之事了。

赏

## 棍子扯文革（一）揭发彭罗陆杨

前面一篇博文简述了一下文革的线索，本文将对资无双方在姚小文员发表批判文章到彭罗陆杨事件期间展开的斗争做一番描述。

从 1962 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 1964 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

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用江青的话讲，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河蟹党屎》）

（看过前面周搅屎系列博文的博友恐怕都知道中宣部和文化部是些神马部门，是神马人在管事。六二年的时候江青就敏锐地发现了《海瑞罢官》的屎，而她要求停演此剧的建议愣是被中宣部、文化部的党阀学阀们给顶了回去。六四年康生同志接着进攻，直指吴晗菊花：为大刀辩护，搅庐山的屎。大刀的主张是神马，庐山会议是肿么一回事，请参看本博《周仲尼搅屎录（八）》。江青很清楚，帝都是党阀学阀的大粪池，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帝都肯定搞不成批评文章的写作。还是上海革命基础好，于是明智地跑到上海拉人干事。多亏了老柯主政上海的时候工作做的好，为无留下这个宝贵的革命基地。）

姚文元这篇批判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猛烈攻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河蟹党屎》）

（哈哈，海瑞不就是为小地主喊话的么？神马退田，不就是小地主要田么？那么，在人民公社运动里，谁嚷嚷要田呢？主要的不是原先的富农们么？不就是丫们搞单干最积极么？海瑞要田地骂皇帝被罢了官，大刀反公社骂中央也被罢了官，吴晗出来为海瑞喊冤，不就是为大刀喊冤么？实质不还是为单干辩护么？不还是给公社运动泼污水么？在无专政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毒草，难道叔还能忍么？）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文汇报》收到表示不同意见的来信来稿达数千件。许多著名学者斥责姚文“陷人于罪”，表示“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

（《河蟹党屎》）

（看姚文，绝对是一篇证据充足、论理充分、立场坚定的学术文章，倒是吴晗不学无术，搞得全是垃圾玩意。这样的批判竟然就成了“陷人于罪”！“进步知识分子”们完全可以把观点摆出来，把文章发出来，大家切磋切磋嘛。咋屁都不放一个，就寒心了呢？）

在姚文发表的十多天内，除华东地区几家报纸予以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报刊未作转载。为此，毛泽东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订购数很少。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河蟹党屎》）

（这么明晃晃的封杀，白痴都能看出来是咋回事了。知识分子们是肿么了，这么害怕“异己之见”？你们这么流弊，学术功底这么强悍，完全可以写文来批嘛。中宣部、文化部都为你们站台，你们还跟个娘们似的躲到后面放冷箭，咱都替你们害臊呢。老毛看不下去了，直接点了北京市委的名，爆了彭真。）

根据周恩来和彭真的意见，《人民日报》在 1965 年 11 月 30 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上加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仍然是主张把讨论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河蟹党屎》）

（老毛发火了，不好硬顶，还是要敷衍一下。封杀不行，那就掺沙子。不能只转发不评论，要加按语。加按语就是消毒：仅限学术讨论啊，莫谈国事啊。）

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到：《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谈话传开以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调门进一步升高，批判范围迅速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河蟹党屎》）



（老毛表示知识分子们太矫情，跟这帮不学无术的人讨论学术很蛋疼。还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好了。吴晗妥妥的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神马学术观点问题。吴晗剧中表现的阶级立场非常明确，后续对姚文元的封杀和污蔑更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恶劣行为。）

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印发了包括上述文章摘要在内的七个材料，反映的都是学术批判引起紧张形势和有关方面提出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制定出若干指导方针，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河蟹党屎》）

（此时的文革小组就是彭真的天下，弄到文革小组讨论，不就是让彭真的人来讨论么？当事人规避原则去哪了？公平公正还有保障么？所谓至于“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不就是以权压人么？前面不还说学术讨论么？肿么还要置于党中央领导下？谁的党中央？）

“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

“二月提纲”还指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河蟹党屎》）

（哈哈，大党阀大学阀也撒起娇来，说姚小文员是学阀，以势压人，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么？再说，左派学术工作者肿么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专家呢？）

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认可。（《河蟹党屎》）

（嘿嘿，这就是彭真说的党中央：刘修养、周周仲尼、陈老龟、邓矮子、陶铸……哈哈，常委老毛正好不在北京。）

此后不久，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教部门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就更加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河蟹党屎》）

（彭真们既然用各级党政机关来搅屎，那无的斗争对象当然也不能仅限于学阀，而要扩大到这些党阀上来。）

纪要提出：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还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基本否定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3 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在纪要中加写道：“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河蟹党屎》）

（江青一针见血，老毛明确站队。）

江青的座谈会纪要于 4 月 10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河蟹党屎》）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传》）

（不到 2 个月时间，中央先后发了两个文件，二月提纲对部队文艺工作会谈座谈会纪要，针尖对麦芒。阶级斗争都是阳谋，你发提纲，我发纪要，都是中央开会通过的正式文件。意见分歧公开，那就是让全党都知道，然后开始站队，进行斗争嘛。身处中层基层的党员

干部们该肿么办？如果我是文豪，大师，专家，我一定支持刘；如果我是受他们压制的普通文员职员，我举双手欢迎毛！)

3月17日至20日，毛在杭州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河蟹党屎》）

（广泛，意味着双方都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双方都代表各自的“群众”，你站哪一头呢？）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传》）

（哈哈，中宣部是“阎王殿”，说的不就是被资产阶级党阀学阀掌了权，死死压着无权无势却要革命的“小鬼”们么？）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传》）

（这个“地方”，也得看是哪一级的“地方”。如果是省地一级，那老毛还是洗洗睡吧。丫们基本都是牛魔王，几乎就没有孙悟空嘛。）

4月9日至12日，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传达了毛3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毛泽东传》）

（斗争一个小回合结束，无方小胜。但还需要继续推进。）

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河蟹党屎》）

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毛泽东传》）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毛泽东传》）

（既然阶级矛盾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那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局限在神马文化领域。文革可不是神马文艺革命，而是贯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阶级斗争。把文革简单理解成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这纯属知识分子的狭隘想象。吴晗明显“朝里有人”，那就是各路常委撑腰嘛。所以斗争不可能局限于吴晗。彭真跳得最高，那就先拿彭真下手。不过，我们可别忘了周仲尼先生哦。走资的带头大哥，此时还如黑幕一样挂在斗争舞台的后方。）

1965年11月10日，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销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等。这些都是对杨尚昆在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诬陷。（《河蟹党屎》）

（当然啦，站在河蟹党立场，杨是好兄弟，好哥们儿，马前卒，顶缸的！毛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杨都随时关注，转发，私信给资路线代理人周刘邓。哈哈，原来这就是杨尚昆的“正常工作”。也是，丫们既然要搅无的屎，那么不让无正常工作，就是丫们的正常工作。）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康一民是周仲尼的机要秘书,介个,俺们不禁浮想联翩。后面我们会看到,凡是当着或当过周仲尼秘书,尤其是秘书头子的人,无一不是坚定的走资分子。河蟹不是出了党纪,说秘书犯事,主子要担责任么?肿么那时候的党纪还不如河蟹呢?丫们买窃听器这回事,连公安部长谢富治都不知道,哈哈,行动够隐秘啊。对杨尚昆的处分又为毛拖了好久呢?谁在保护他?杨尚昆这种级别的,谁有能力保护呢?政治局分明不把老毛放在眼里嘛。到最后,对杨尚昆的处分也不过就是降个职而已嘛,还是不妨碍老杨吃香喝辣,有机会还是要东山再起,重入中南海的嘛。)

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回忆江青同志》)

(哈哈,堂堂一把手被搞得心神不宁,有家不能回。左逼们不是吹嘘老毛是万能大神么?)

不久,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河蟹党屎》)

（有一种弱爆了的小资想法，认为军队应该国家化，才能代表民意。瞧瞧你们的先锋队，资路线代表人物刘邓们掌控了党和政府的同时，没有忽视对军队的控制。倒了彭海瑞，就再扶植一个罗海瑞嘛！

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河蟹党屎》）

周仲尼们也是可以天天嘴里万岁，暗地使劲放箭的嘛。反正，谁都不是傻子。）

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河蟹党屎》）

（老毛一直念叨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嘛。被斗一斗，日后翻盘了那都是资历、是战功。那么，说了半天，罗海瑞怎么就是军中的资呢？俺们不搞诛心之论，还是得按他实实在在的行为表现来判断。这不仅是俺们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是对待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物的态度。我们只能根据言行去判断立场嘛。之所以说罗海瑞是资，因为丫在军中推行的政策方针是资的。无产阶级立场要求军队不仅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还要以社会主义的原则来进行组织，对军队推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这就是老毛所说的政治挂帅。那么，罗海瑞是怎么做的呢？丫一天到晚搞神马军事大比武，无限拔高将领的地位，无限推崇武器的作用，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嗤之以鼻，把士兵当成单纯的战争工具。神马单纯军事主义、神马唯武器论、神马士兵工具论，丫简直是集反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之大成。这些早在红军时期就被批烂批臭的玩意儿，被罗海瑞一个不落地捡了回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推行无产阶级原则，不推进社会主义原则，就是走资！在罗海瑞这样的原则下治出来的军队，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么？无产阶级的军队，一定是有着社会主义觉悟的军队，其组织方式，内部关系，也一定是遵照社会主义原则的。没有神马单纯的军事组织，任何军事组织，都承载着这种或那种社会关系，体现着这种或那种阶级利益。因此，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军队。无产阶级专政，却允许一个资产阶级的军队存在，这不是荒天下之大谬么？尼玛军中尽是走资派，无专政还搞个毛！张春桥同志后来上到总政主任的位置，算是为无占到一个军中的位置，但军委大多数还是资，所以发挥的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不过，聊胜于无嘛。俺们就是要锱铢必较。坑就在那里，你不占，敌人就会去占。）

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可以看出，干掉一批走资分子后，顶上来的还是走资分子：走资分子陶铸顶了走资分子陆定一，走资分子叶剑英顶了走资分子罗和杨，走资分子李雪峰顶了走资分子彭真。无先锋们的斗争，还是任重而道远咧。）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无方主攻，拿下彭陆，林助力，干掉罗杨。不过，就屎料来看，虽然提及上下都展开激烈的斗争，但并没有具体指出来有哪些群众性的运动。因此我们看到的还是先锋队之间的斗争。其次，彭罗陆杨虽然下台了，但替而代之以的依然是走资分子，所以无先锋们还需要继续斗争。从无方这一阶段的进攻来看，老毛的斗志还是相当坚定，整体的斗争也是驾轻就熟。老毛总结当时的力量对比：丫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在军队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发动群众，对他们展开斗争，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不过，老毛还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只是对丫们降职处理，而不是开除党籍，终结政治生命，更没有终结丫们的自然生命。

## 棍子扯文革（前言）

前面几篇博文已经对建国后到文革前这段时间的资无斗争做了简要叙述。从新税制事件开始资无首次正面交锋，经党内外反右、对战大跃进，再到三无计划、四清运动，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也越来越激烈。而从这历次战役来看，资方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无方则人缺将寡。虽然如此，或者说，恰恰因此，无先锋要奋力战斗，发出声音，召唤同类，壮大自己的队伍。经此数役，无方虽败多胜少，但遇有机会，还是进行了反击。形势发展到文革前夕，资无已成水火，一场席卷全国的广泛斗争是在所难免了。对此，资无双方都清楚的很。干柴已经遍地，一场大火所需要的就不过是一颗火苗而已。

这颗火苗，是由姚文元同志点的。火苗的名称叫《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及性质，可以看本博所贴《姚文元究竟“文痞”在哪里》一文。就是这样一篇学术文章，遭到了彭真为代表的党阀和吴晗为代表的学阀的一致封杀。并且，恰恰是这伙人首先把姚文元这个小职员说成是学阀。在我们看来，



姚职员的一篇文章是否有政治立场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他确实刺中了走资官学们的菊花。

于是双方围绕封杀与反封杀展开了斗争。六四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首，其余为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四资一无，整出了个二月提纲来搅屎，政治局常委周仲尼、修养、矮子出来为提网站台，立场分明。江青则联合张春桥扔出一份纪要予以反击，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文化领域，一直贯穿着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线，因此要对之加以斗争。老毛之前就已站队，为姚职员撑腰，此时更明确指出要打击走资黑线。接着迅速解散旧文革小组，建立新文革小组（此时组长为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发布五一六通知，成为文革指导性文件，文革正式拉开序幕。

随后，北大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央广播放，王（力）关（锋）曹（轶欧）加评论转发，各校学生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高干子弟抢先出击，斗黑五类，搞血统论，整工农崽。同时，刘邓派出工作组，配合高干子弟，抢夺运动领导权，镇压造反学生。毛不满，回京后加以反击，贴出炮打大字报，开会发布十六条。撤出工作组，削弱刘修养。林妹妹（未暴露）积极介入。文革第一小段结束。

撤出工作组后，学生造反派得到解放，马上展开广泛的反资运动。八月份开始，红卫兵运动便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工作组虽然撤离，高干子弟依然不忘搅屎，走资先锋们幕后指挥，挑动丫们斗工农崽子，镇压造反派；斗死老虎，斗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看到，所谓红卫兵也是分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造反派和黑卫兵。官修党屎只提红卫兵，却不分资无，其居心当然一清二楚。

运动当然不会局限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十一月初，王洪文筹建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遭到老龟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镇压。王带领工人搭火车赴京请愿，经安亭遭铁路局逼停。王带人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要求承认工总司合法性。周仲尼召集资常委，决议否认工总司。张春桥赴上海处理，一屁股坐到工总司一边，承认其合法性。工业系统走资横行，工人早已心存不满，工人运动由此顺势展开。周仲尼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一如既往地展开了搅屎。于是我们便看到，上层中央是资无激烈斗争（林妹妹还未暴露，此时算无一方），地方上同样如此，走资大员领着保守派工人组织斗造反派，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周仲尼们为走资大员站台，江张姚力挺造反派组织。

十二月，运动扩展到农村。各级走资还是那套搅屎手法：一手利用领导身份，两面三刀，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手用生产压革命。

六七年一月，上海市委“罢工”，王洪文领造反派接手。这便是所谓一月风暴、一月夺权。各地都出现走资老龟“罢工”情况。对此，竹叶青等一干走资军头极为痛恨，开会指责江张等人，搅起二月逆流。林在军队发起反资斗争。周仲尼们出手相救，保下一众老龟，暂避锋芒。七二〇事件，422事变都是周仲尼逼毛。叶剑英让赵永夫假借林的名义咋咋造反派。联动叶周抄家也不告诉中央文革小组。

六八年毛出手“维稳”，搞所谓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委会。军头和干部多走资，因此进入革委会的造反骨干并无实权，也就顶个委员的名号点缀一下。各级权力依然掌握在资逼手里。七月底老毛觉得红卫兵表现不行，扛不起担子，于是把所谓五大领袖找去批了一通。紧接着就搞起了工宣队，往各高校派驻，造反学生歇菜，被赶去上山下乡。江张们也受到老毛的斥责，无方进攻顿时弱了下来，党政军各路资逼缓过气来。接下来直到六九年四月的九大，老毛奉行所谓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方针。

林被仲尼成功挂掉，周仲尼们窃喜。竹叶青们再无军中对手，力量的天平迅速倒向丫们一方。各路军头纷纷复出，矮子也是重见天日。七三年十大，走资重掌大权。丫们立刻展开进攻，狂掀批所谓极左的黑风。江张们也展开反击，指出周仲尼是投降主义，爬行主义，是走资路线头子。这几顶帽子当然一个都没扣错，尤其是最后一顶，非周仲尼莫属。但老毛没有再进攻，而是选择了撤退，批评江张。这被左逼们解读为对江张的保护。我们只能说，这个保护措施是被迫无奈 九一三之后，老毛战斗力直线下滑

江张们明显地感受到了力量对比的失衡，因此更迫切地需要选择进攻，而不是龟缩等死。因此，我们说，江张们是充满斗志的无产阶级战士。七四年展开批林批孔，江张们矛头直指周仲尼。周仲尼们“不卑不亢”，老毛继续撤退，严厉批评江青。此后江张们便独立展开了对周仲尼们的斗争。老毛多方掣肘，拒绝江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主要领导人，矮子算计到第一副总理位上。矮子更是在七五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随之四届全国人大上，资势力完胜，矮子开始接手周仲尼工作。江张展开反击，发起批判经验主义的攻势，接着把矛头指向周仲尼一伙。老毛则继续被多方掣肘，没帮上忙 由此，矮子更是风顺水地展开了全面整顿。所谓全面整顿，就是全面解放还在靠边站的资逼，全面为曾经靠边站的资逼翻案平反，全面镇压还在反抗的造反派，全面严惩已经关押的造反派。换个说法，就是全面建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全面壮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灭无产阶级文化艺术。

四人清楚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军队一直被各路资军头把持，林挂逼之后，军中再无力量来威胁周仲尼们。如此一来，四人更需要掌握武装。军队被竹叶青们把持，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只能在民兵上想办法，这就是搞所谓的第二武装。毛被掣肘责令解散造反派组织的民兵指挥部，

此后毛远新同志担任起老毛的联络员，积极传递矮子们的搅屎记录。这为极度衰弱的无先锋队注入了一丝活力，同时也唤起了老毛的斗志。矮子们死不悔改，日益猖狂，老毛于是决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江青奋力主攻，群众也是积极响应。资逼们也动员起自己的“群众”进行搅屎，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后来的四五事件。四五中，周仲尼被抬到了至尊的地位，老毛则受到攻击。老毛受到攻击，这在群众运动的标语中是未曾有过的。说这事没有矮子们的掺和，恐怕连鬼都不信。江张小毛也是准确地将此类比为匈牙利事件，老毛在无先锋“驱使”之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撤销了矮子的一切职务。但还是留了个尾巴：保留党籍。不久，老毛见了马克思。

七六年十月，华不老实联合竹叶青发动政变，四人被捕，标志文革结束。当然，镇压造反派，清理三种人的“扫尾”活动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政变的成功，意味着复辟的开始。而三种人被清，劳动力重新商品化，打破铁饭碗，自由流动，则意味着资关系全面而彻底的复辟。

扯了这么大半天，到底神马是走资呢？走资有啥表现呢？走资的群众基础又在哪呢？从前面《周仲尼搅屎录》系列一路看下来的博友应该能立即指出至少两点：一是以农业为幌子，压制重工业发展，并且在工业生产中维持资产阶级法权；二是在农业领域，鼓励小生产，维持农村的旧生产关系，阻碍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造。那么，在教育系统，学术领域呢？那就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行动上压制无产阶级的代表。文化艺术领域，也是如此。

## 周仲尼搅屎录（十一）三五与四清

2015年10月17日 16:36 阅读 1239 [新浪博客](#)

搅完大跃进的屎之后，周仲尼们马不停蹄，又搅起了三五计划和四清运动的屎。老毛明确提出三五以基础工业为根本，并促使农业和国防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战略布

局。但周仲尼则继续阳奉阴违，把执行的重心放在农业上。不仅如此，在农业的发展上，周仲尼们一如既往地鼓励小生产，以小生产来从内外部瓦解集体农业，阻碍集体农业巩固壮大，并进一步向全民农业推进。四清运动，作为一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说是文革的序曲。正是修养们在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的表演，让老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前老毛就不止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矛盾是阶级矛盾，资本主义有复辟的危险，但始终没有以主动号召先锋队投入并组织广泛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在四清运动中，老毛明确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派。阶级斗争一直在进行着，老毛只是选择了站队，提炼出斗争的基本方向、斗争对象等，并积极参与到对走资派的斗争当中。周仲尼用两手来搅四清的屎，一手是拿生产压阶级斗争，一手是用捞干部维护资力量。这两手，在文革中用得更加娴熟，更加气派。

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在会前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老毛对经济布局、比例的看法明显要高远得多。基础工业是根本，农业和国防的发展水平最终取决于基础工业的发展水平。周仲尼一贯的顺序是农轻重，但却“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二者全然不同嘛，咋就能“十分赞成”呢？）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讲到这些问题。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备战。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

（拨清波可真能搅屎。老毛明明说的是优先发展基础工业，这是大本。到了资的嘴里，就变成加强农业生产是第一，只是在加强农业的同时，也就是说，农业得到优先保障的前提下，顺便搞搞工业。这把屎搅得未免太粗糙了。）

在紧张部署三线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国家着手进行工业改革。

这项工作实际上从一九六三年夏天就开始了。当时，周恩来强调：“我们要搞一套制度出来”，“人治不行的，第一还是法治”。这年八月，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邓小平主持下，成立了由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等参加的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发现十几年来因循沿袭的工业管理体制存在不少弊端，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成为这次工业改革的重要内容。

（哈哈，要法治，不要人治。要抽象的法律法规，不要具体的阶级专政。要搞一套制度出来，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鸟。话说回来，照搬苏联的工业管理体制无疑是问题多多，确实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进。关键是要往哪个方向改，是往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还是往相反的方向。显然，老毛为代表的无先锋是主张前者的，至于周仲尼主张哪个方向，我们来看他具体主张如何。）

九月，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起草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其中提出通过试办“托拉斯”来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听取工业工作汇报时，充分肯定了这个意见。“托拉斯”最初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很高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它是产品相同的企业或生产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的联合经营的公司，是一种大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是否能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还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和在实践中探索的过程。周恩来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一直很重视这个新生事物。他历来主张：首先要集中力量搞必要的和最需要的，什么都搞、分散力量是不行的。后来，他又对一位外宾谈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想法，认为可以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的某些组织形式来办社会主义的企业，完全按照经济方法来管理，不要靠行政命令。

（哈哈，资产阶级师爷孙冶方日后可是大力阐发了这个“完全按照经济方法来管理”是咋回事。很不幸，在文革期间孙师爷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很幸运，改开后孙师爷又被戴上了经济学家的冠冕。以孙师爷为名的经济学奖也成为河蟹国内经济学的头号大奖。集中力量搞，谁都不反对嘛，苏联也是集中力量搞的嘛。倒是周仲尼们集中力量直管的企业一直是少慢差费的路子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当然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走群众路线，搞民主集中嘛。群众路线是民主，各级计划是集中，二者要统一嘛，没有前者，就是空计划瞎指挥，没有后者，就是无政府乱自治。走资分子一嗅到垄断的威严，就兴奋不已，真可谓臭味相投。周仲尼和铁托，一个在这极，一个在那极，貌似对立，从根本来说就是一体两面，全是反社会主义，哈哈。关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的问题，还需单独写文来谈，这个问题也是被左逼右逼们搅得一塌糊涂，成了大粪坑。）

他说：“用政府名义管理工厂，不利于经营管理。行政命令太多，层次太多，一个中央部门和一个省的部门直接管到企业，单位太多，中间层次太多。我们有大小工业企业十万多个，这种管理方法不容易。相反，把它分散像南斯拉夫那样的自治，分散主义就会大大发展。即使不采取南斯拉夫那样在外汇和市场上自由的资本主义方法，也危险，不利于计划经济。凡是分散主义都不利于计划经济。怎么办呢？我们想采取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但是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公司，按行业自上而下领导。这样完全按照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核算，改善方法，不要行政命令。

（无产阶级专政，自然是要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管理工厂。既然如此，不用政府名义管，用神马管呢？问题显然不在于以神马名义管，而是实际上以社会主义的原则管，还是以资本主义的原则管。以神马原则管，难道不正是屁股决定的么？更往前一步，不是由不同屁股的人之间激烈的斗争所决定的么？可见，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又如何可以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公司呢？周仲尼这是要走一个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么？列宁论垄断资本主义的时候留下个大坑，傻逼希法亭把这坑挖的更大，斯大林也掉进坑里没爬出来。周仲尼们更是拍脑袋就干。）

为了促进试办托拉斯的进程，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周恩来两次主持会议，讨论国家经委党组起草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在六月二十九日会上，周恩来强调：“要把托拉斯的发展前途写明。成立托拉斯以后，随着托拉斯的职能的扩大，部的机构就要缩小，行政部门只留少数人就够了。将来有些专业部如石油部，现有三至四个大基地，可改变为大企业，这样，石油部本身就可以变成总托拉斯。”他还指出：托拉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来办，按照经济规律要求来管理。公司的企业职能逐步扩大，行政的职能要缩小，行政的职能转化为经济的职能。将来地方上同托拉斯的关系也要由行政关系为主转化为经济关系为主。

（啥叫行政关系，啥又叫经济关系呢？）

“组织托拉斯就是要解决行政管理和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对目前的一些官僚主义的办法来个革命，吸取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长处。当然，不是追求利润的办法，而是用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办法，来发展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

（原来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周仲尼也没说搞托拉斯肿么就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嘛。）

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案）》提出，在一九六四年内先试办十二个托拉斯，其中全国性的九个，地区性的三个。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份文件，指出这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要求中央主管部门和各级党委要充分重视这件事情，集中力量首先把这一批试办的托拉斯搞好。在以后一年多的实践中，这项重大改革遇到不少问题，也积累了许多经验。

（哈哈，周仲尼们搞半天制度设计，就搞出个“托拉斯”来，真可谓满眼尽是屎啊。嗯，确实是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可谓是邓挫改革的先声。）

可惜的是，这个探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中断。薄一波评论道：“当年中央决定试办托拉斯，期望以此为契机，逐步改变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是有远见卓识之举。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为这一改革付出了很大努力。‘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它，使经济又回到老路上去，实在是一大憾事。”

（哈哈，文革真是罪大恶极，让河蟹晚生了十年。要受这十年的苦难才横空出世，老龟命表示痛心疾首啊。好在邓挫门们篡权成功，继承周仲尼的大志，完成了周仲尼没有完成的事业。）

毛泽东对计划工作一直不满意，要求改变计划方法。在一九六四年九十月间召开过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等成立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



委”。“小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哈哈，老毛对周仲尼们的计划工作一直不满意啊。为神马不满意呢？）

九月二日，国家计委拟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提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提纲强调在“三五”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否则就会犯方针性错误。提纲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意见，把“三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总投资额定为八百五十亿元。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将这个提纲提交会议讨论，得到通过。周恩来评价说：“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落实一些，更实际一些。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他还提出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

（周仲尼搅得好屎。先是压缩总投资。然后偷偷地在评价中改变计划内容的顺序。把农业提上来排在第一位，而把基础工业放到最后。国防倒是放在了第二。老毛此时也把外部矛盾当主要矛盾，把国防摆在第一位，这是个错误判断，而且极容易被搅屎。抗美援朝的胜利基本保证了中国不可能受到直接的战争打击，外部矛盾更不可能成为主要矛盾。更何况，紧接着中国就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更不可能遭到直接的战争威胁。只要是阶级社会，那么，任何时候，国内的阶级矛盾都是最主要的矛盾。即便是以前搞抗日桶蘸，那也只是表面上搞，暗地里还不照样相互厮杀？这一点在《扯扯西安事变的淡》里指出过。阶级利益的截然对立，决定了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的真正的桶蘸。真心搞桶蘸，必然会对本阶级阶级利益造成损害。老毛把国防提到第一位，实际上给周仲尼们一个搅屎的机会，借机把基础工业压在了后面。而无论如何，基础工业都应该是排在首位的。正如之前已经说过的，基础工业是根本。即便是发生战争，基础工业也能迅速转为军用。而在平时，基础工业也是国防的前提。更何况，基础工业放在首位，也并不就停止国防的建设。而恰恰是为了更好

地建设国防嘛。不过，不论怎么说，老毛也不会认为应该把基础工业放到后面，而把农业提到首位。这分明是周仲尼的路子。)

不久，由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没有形成正式的“三五”计划。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根据这时确定的基本方针去做的。

(周仲尼还是偷偷往计划里塞了好多屎，之后几年就是按这个计划走的。文革对此形成了冲击，但也没有完全改变。)

周恩来走到哪里，谈起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总是把农业摆在最前面。有些干部在讨论他的讲话时提出，国防和农业哪一个放在第一位？有的干部还问：是否应该修改“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把以国防建设为中心改为“大力发展农业，突出国防”？周恩来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

(哈哈，时刻不忘宣传农业第一。资的“有些干部”想把三五指导方针直接改为农业第一，顺带搞搞国防。还是周仲尼聪明，明面上已经过了的，就不要去动了，宣传执行的时候按着资的方针做就是了。周仲尼很明白，指导方针啥的，木有阶级力量的推动来保证，就是个空话嘛。)

怎样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说：“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小型为主，大型为辅；集体为主，全民为辅；自办为主，中央帮助；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他强调：“要抓紧、抓快、抓狠，要全民办农业。县、公社都要抓农业，每一个季节都不能耽搁。”

(周仲尼指示，要全民办农业，但少办全民农业，这屎搅的；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嘛；明显是迫切需要工业化支撑全民农业，把集体农民转为农业工人，并且解放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嘛。周仲尼一方面要全民办农业，一方面又不要办全民农业，这要是小农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万古长青的节奏啊。封建社会差不多就是全民办农业哦，至少

是绝大多数人办农业嘛。而且封建社会也不办全民农业，也是办的小农小生产嘛。周仲尼这是要重走封建路么？还好地主已被剿灭。不然咖啡帝封建资本主义的帽子还真适合给周仲尼戴嘞。）

周恩来还提出在农村中“非搞副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养猪多的，除了出口、外调，还要自己销一些”。

（嗯，多搞小生产，多种经营，活跃农村市场哦。）

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为了今后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一定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首先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依然坚持农轻重的资路线。周仲尼对老毛的“十分赞成”看来十分都是假的嘛。）

中共中央在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正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运动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他引用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会议形成一个“十七条”的文件（后来补充修改为“二十三条”，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下发），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不久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依据。会上有人提出，可以在必要时抽出一部分生产时间，甚至于停工一个时期集中搞运动。周恩来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有些关键性的东西不好停的，就还要有一部分人生产，炉子一下冷却了，就不行了，各种生产里都有这个问题。”

（拿生产搅屎。有两个问题周仲尼清楚得很：1.斗争无处不在，生产领域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领域；2.生产时间工人分处各地，难以串联，不利于组织，容易被控制，被各个击破。把工人的活动限制在各自的生产过程，使走资派最容易进行分化瓦解，打击迫害有造反精神的工人。当然，觉悟工人依然会以各种方式反抗。但无先锋队若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对走资派给以有力的打击，则基层工人造反的条件会大大恶化。这位提出在必要时间抽出一部分生产时间集中搞运动的，无疑是无的先锋。周仲尼针锋相对，坚决反对。是啊，看到这么犀利的敌人，不犀利地反击，肿么好意思呢？我们将会看到，拿生产来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屎，将贯穿周仲尼此后的全部日子，直至挂逼。老毛则一阵见血指出，社教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既然是一场群众运动，那么走资派当然也会发动丫们的群众，如此，运动必然就成为对立阶级在各自先锋队领导下的激烈斗争。文革只是把这个斗争公开化，从而以更广泛而激烈的方式展开。）

在“四清”运动中，农村许多社队对干部开展了过火的斗争。被誉为农业战线一面红旗的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受到冲击。他就站出来保护陈永贵。

（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是如何在四清运动中搅屎，从思想上行动上把社教性质的四清运动变成打击基层干部的“群众运动”。修养理解的依靠群众，就是依靠他领头的中央到县级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队。修养理解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是集中工作队上万号人到一个县去歼灭基层干部。修养理解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作队四清和基层四不清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离群众运动自然是十万八千里了，至于离社会主义运动，那就更远了。前面一路看下来，我们清楚地知道周仲尼和修养是一路的。但是从搅屎技巧上来说，修养和周仲尼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修养跳出来整下面的干部，纯属得罪人，搅自己的基础。又跳得那么高，谁都知道摆明了是跟老毛对着干。周仲尼就隐蔽很多，比如拿生产说事，这就能把水搅浑，实际上以资压无。再比如，暗中掺沙子。被修养挤掉的人，也都给捞回来。当然，这个被周仲尼捞回来的陈永贵是个另类，是个顽固不化的文革派。这也是周仲尼少有一笔亏本买卖。相较而言，扶植吴桂贤就划算多了。至于文革期间保护打捞老干部，那就更不必说了，功劳大大滴。）

那时，农村的“四清”运动正以很大的声势在发展，各地负责人都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这个运动。针对这种状况，周恩来强调不要光搞“四清”而误了生产。他说，阶级调查搞上十天半月就行了。他批评一个负责干部蹲在一个地方搞阶级调查，半年没有搞完，结果把别的工作都耽误了。

（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本身就是搅屎。阶级斗争贯穿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生产活动离不开生产关系，总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生产关系也不是静止的，而总是随着阶级斗争而变化，总是或朝这个方向，或朝那个方向变化。一种生产关系确立后，也总是要由阶级斗争来加以维护。抓革命和促生产本就是一回事，革命在生产领域的首要体现就是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发展，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方向上促进。经济主义简单地把促生产理解为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只是产量的提高。由此就把抓革命，促生产歪曲为政治运动服务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因而就把效率或产量的提高定为首要目的。这难道不就是邓挫“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声么？周邓一家亲，决非虚言。且不论这种认识没有理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认识只是泛泛地提效率，而不提为了哪个阶级的问题。虽然不提，但实际上在资生产关系下，效率的提高只能意味着壮大资的力量，损害无的力量。这才是经济主义的要害！）

纵观这一阶段的斗争。三五计划，老毛主动出击，划定指导方针：基础工业为本，国防和农业跟进。周仲尼在宣传和执行中搅屎，缩减投资总额，并改为农业第一；农业政策上压集体，抑全民，鼓励小生产，宣传农市场。四清运动，老毛依然主动出击，划定运动性质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拎出主要矛盾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指出斗争对象为党内走资派。周仲尼还是在宣传和执行中搅屎，一手拿生产压阶级斗争，一手用捞干部维护资力量。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走资势力的日益猖獗，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是不可避免。激烈的矛盾只能用激烈的斗争来解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后那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历时十年，当然，它就是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周仲尼们，当然会接着战斗。先锋怎可旁观呢？

#### 赏

三五计划优先军工农业是有粮食减产中苏决裂背景的。实际上由于增加了三线和军工，农业在其中并不占大头，所以周才会处处刻意提醒。周和毛的主要矛盾在经济成分而非结构，周是一旦遇到困难就想保守用“经济规律”也就是市场经济来自行解决，搞混合所有制。毛则不能容忍。

## 周仲尼搅屎录（六）党内反右

2015年10月13日 08:59 阅读 540 [新浪博客](#)

前文提到，五七年初老毛想整一整党内保守的风气，但被党外右派的疯狂进攻给打断了，转而把精力放到对这帮家伙身上。在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之后，老毛回过头来准备整党内右风。这就是河蟹所谓的反右扩大化。其实所谓扩大化的反右才是老毛真正关心的重点所在。紧接着反右，就迎来了大跃进。大跃进，本来就是老毛的一个战略性提法，意思无非是说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所谓大跃进，是个总体性的说法。之前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比较快的推进，让老毛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但是五五年开始老毛明显地感觉到有一股阻力在阻挡着这个进程。因此老毛为代表的无先锋与这股阻力进行了两番较量，当然，根本上由于资无力量的差距，无没有取得成功，只得妥协退守。到五七年年中，开展的对党外右派的反击取得了成功，其中无的力量开始上升，这让老毛感到是时候对党内的右派发动攻击了。从九月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正式发动进攻，经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连续提升进攻强度，最后以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收官，正式确立战果。经此一役，无力量开始上升，老柯进入政治局。还未暴露的林妹妹趁机上位，成为常委。但是核心决策层依然资占上风，重要的执行部门依然被资全面掌控。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

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着重考虑到建设方面的问题，观点也更加明确起来。当时，两个新的情况对毛泽东的思考也产生影响：一个是，整风运动开始后，个别人利用党内关于“反冒进”的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等。这使毛泽东更加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因此，当反右运动高潮过去后，他回过头来准备解决党内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场争论。用他后来的话说是：“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另一个原因是，这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接着又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这使毛泽东十分兴奋。

（促进右派进攻的不只是反冒进，还有周仲尼出色的桶蘸工作的作用。至于作者说“个别人”，那就有点太低估右派的势力了。至于赫秃子的话，老毛也是听其所需。这个时候，这位苏修头子的思路早就不是神马国际共运了，而是一和三少，土豆牛肉的共产主义了。老毛高兴，无非是觉得建设可以快速推进，毛子能快，中国为啥不能再快一点呢？）

“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



（朽木的这段回忆指出了老毛所认为的大跃进的性质：群众性的生产运动。也就是说，老毛觉得有必要，而且有能力把全国劳动人民调动起来，参加生产，从而更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看到苏修都这么有劲头，再回想土共的蔫儿样，老毛表示很不爽。）

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主要代表人的周恩来，自然地成为毛泽东批评的主要对象。在这以前，周恩来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

（哈哈，河蟹师爷明白指出，周仲尼就是反冒进的主要代表人物，因此成为老毛批评的主要对象。而且斗争经验丰富、阶级意识敏锐的周仲尼自己早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国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

（哈哈，周仲尼也承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很高，要求增加生产。那么，是谁在不断给这些积极的劳动人民泼冷水呢？）

“一九五七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的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



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

（承认放慢的速度，但并不承认冒退。）

周恩来后来回想起这次讲话时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

（哈哈，读者朋友从讲话中读出了“抛弃反冒进”的意思么？）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在抓工资改革问题，由他向全会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他说：“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

（哈哈，对工农就是“合理的低工资制”，多低呢？只够吃饭，还只是尽量哦。这就是对工农生活的照顾。哎，请问，高知们过着咋样的生活呢？周仲尼表示，高知们要涨工资，提待遇，不然过得不好，没有积极性，要危机中国的进步。但是工农们只要有口饭吃就好啦。）

他还谈到，我国人口的增长应同生产发展相适应，指出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以及公费医疗严重浪费和低房租的不合理性，提倡用互助互济的办法解决职工生活中的某些困难问题。

（谁在严重浪费公费医疗呢？工人么？可能么？为什么不明说出来呢？低房租不合理，房租交给谁呢？房东要嗨皮了。财政收入又要增加了。经济又添动力啦。哎？谁要交房租呢？一面说低工资合理，一面说低房租不合理，周仲尼屁股到底坐在哪边呢？周仲尼又提

倡职工们要互助互济来解决生活困难，言下之意，工人们不要浪费公共医疗资源啦，房子也住差一点的就好，因为差的房子房租低嘛。）

然而，这些并不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

（老毛表示有更重要的事。）

十月九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发言。他以尖锐的语言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至于好省就附带扫掉了。”

（读者朋友还记得是哪位同志删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吧？嗯，老毛也是心知肚明，矛头直指这位同志。）

他批评一九五六年扫掉的另外两个东西，一个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没有点名地对“反冒进”问题提出批评。毛泽东为什么讲这番话，他究竟在批评谁，他的针对性其实是很清楚的，但当时与会的大多数大都不清楚，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会上没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多少意见。

（师爷这是在装傻呢？能参与这种级别的会议的人，哪个不是摸爬滚打多年，经验老到的？怎么可能不知道针对谁？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因为意识到了，所以没说什么话嘛。大伙准备静观其变，看老毛接着出啥招。）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从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的事实中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经过这几轮斗争，尤其是反右，老毛已经意识到主要矛盾不是神马淫民内部矛盾，而就是资无之间的阶级矛盾，就是走资与走社的根本路线之争。师爷也指出来，反右斗争是一个转折点。）

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一旦在这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便会越走越远，导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师爷敏锐地意识到方向的转变，没错，对主要矛盾判断的转变，就意味着斗争方式的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呼之欲出。这对走资们来说，确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师爷的坦诚点赞。同时这也表明，文革的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深深地埋下，开始茁壮上升了。神马脑袋一热就搞起了文革，神马为了留下一个美好世界就妥协，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要么资专政无，要么无专政资，根本木有神马中华，神马淫民，神马共和国，左逼叨叨的这些东西只存在于丫们的幻想当中。）

三中全会结束后，国务院及其各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进行体制改革、机构精简和工作改进，形成干部下放的高潮。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国务院成立了以安子文为首的安排下放人员十人小组。

（合着中央大员们原先都在北京窝着呢？还得老毛在上面压一下，大爷们才往下面跑一跑。哈哈，安子文为首。安子文是谁的人呢？大伙自个猜。）

十二月八日他离开北京，到华东地区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

（哈哈，拨清波还好意思回忆，就是丫们在北京搞得死气沉沉，老毛都闷坏了。还是到华东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带一点回京。）

十六日和十七日，他在杭州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有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渭清、叶飞、江华参加的会议，讨论浙江省委向省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无方干将柯庆施同志浮出水面。可惜老柯同志正值壮年，就一命呜呼了。有说是被独眼龙们搞死的。不管咋样，还是无方力量的一大损失。）

除前次会议参加的人员外，这次会议又增加了胡乔木、陈丕显、林铁、石西民、张春桥等。

（张春桥同志也浮出水面。春桥同志由老柯一路带着，上海的底子搞得相当好。以后我们会看到，这是文革中唯一一个无碾压资的城市。不过，此时二者都还没进入核心决策层。）

在杭州召开的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

（矛头直指头子周仲尼，顺便也把干将拨清波一通骂。憋了太久的气，出了再说。那会儿子资力量明显占上风，老毛被丫们强迫签字，成了个摆设，哈哈。一句连半句都顶不了。）

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哎？为神马老毛对着周仲尼说啥子“个人崇拜”“崇拜偶像”咧？合着那会就有人批“个人崇拜”了？谁在批呢？于是偶像就成了罪魁？这个套路有点熟悉哦。尼玛群众觉得

好，当然要崇拜嘛。你们只管你们自己的群众，把无的群众晾一边，倒怪我老毛咯？我可不管啥偶像不偶像的，无产阶级欢迎，对无产阶级有利，就行了。）

但是，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

（只是出了出气，问题没有说清，更没有神马实质结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会议在南宁如期召开。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

（加强斗争力度，提升批判调子，指出“反冒进”不是神马业务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资反冒进反掉了无的纲领，当然不是神马业务问题了。）

“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看看，还是周仲尼明辨是非，顾全大局啊。老毛就是心胸狭窄，怎么能说灰心丧志呢？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还是同志嘛。老毛啊老毛，看来还得回一下共产党员修养的炉啊。）

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老毛没分清因果嘛。是谁们使党外的右派嚣张跋扈，以致错判了形势？只剩了五十米不过是说辞罢了，既然已经指出是阶级矛盾为主了，那便要去寻找走资的阶级基础，以及走资的先锋力量嘛。难道前几年一边倒的斗争形势不是资产阶级力量占上风的表现么？如此明显的悬殊岂是党外右派的进攻所能比的？）

在十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杭州会议上老柯浮出水面，而在此时南宁会议上可说是脱颖而出。老毛直接拿老柯来批“总理”。是啊，一个市委书记，大大地压了大总理一头。大概老柯也是属于周仲尼说的那不代表群众要求的少数“积极分子”吧。所以周仲尼自然是写不出来老柯的文章了。老毛借机抛出反“反冒进”的主张，也是给老柯表态，为无站队。）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

（哈哈，被戳到痛处，难受肯定是的。至于坐卧不安，那就是夸大其词了，周仲尼们都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理素质杠杠的，又岂会因为这点批评就坐卧不安呢？顾明又把周仲尼们卖了：每天晚上都要聚到一起，私下串联。不过，当然不是神马商议怎么检讨，“等等”所省略的才是重要内容。也就是说，丫们是在商讨怎么应付，以及，怎么反击。）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

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是啊，回想五六年六月份，周仲尼修养老毛的旗子，干的尽是反无的勾当。老毛明显意识到走资们是要把他当傀儡。是嘛，拨清波这样的都敢强迫他签字，可见丫后台之强，可见走资派势力之庞大。）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

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商讨的对策内容之一，是周仲尼出来认错。老大就是老大，有担当，有气量，粉丝不多才奇怪了。不过，周仲尼还是认为，大伙主观想法还是好的，是好心办了坏事，因此只是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神马路线问题。）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不过，同南宁会议时相比，会议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因为，一些搞经济的同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毛泽东认为：“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商讨的对策主要内容，就是表演“犯难”，就是要摆出罢工的姿态。表面上是退，实际上是攻，这是在逼老毛就范。老毛环顾四周，发现几乎全是周仲尼们的人，“此外没有人”。这清楚地表明资的力量还是占了上风嘛。老毛的主动进攻打开了缺口，但无的力量补充不上，这是个大问题。人事大权仍掌握在资的手中，要是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无先锋恐怕很难上位。到了文革的时候老龟命们又使罢工这一招，这时候无先锋们可就不客气了：还他妈来这招，你们不干，正好，我们来干。哈哈，老龟命们以罢工相威胁，无先锋顺势接了手，这便是河蟹党屎说的造反派夺权。于是有左逼出来洗地，说不是造反派要夺



权，是老龟命自己不干了，造反派木有夺权的意思。这地洗的，一听就蛋疼。夺就夺吧，丫们篡了无的权，本来就是要夺回来的嘛。无产不掌权，还搞个毛线的专政啊。)

关于“反冒进”的性质，毛泽东在十八日的会上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总路线，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

(缓和攻势，打一下圆场：总的路线是对的，个别看法不一致。)

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们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不郑重地考虑毛泽东不久后所说：“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

(哈哈，周仲尼们就是顾全大局，就老毛固执己见。难道党不是事实上已经分裂了么？各自的屁股都稳稳坐在各自对立的阶级上，还能不分裂？貌合神离罢了。)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

成都会议是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三月九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的十八天会议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他也谈到，在建设速度上要留有余地，“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但是，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继续进攻，巩固战果。把反冒进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把冒进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啥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嘛。啥是非马克思主义？就是非无产阶级嘛。非无产阶级就是反无产阶级嘛，就是反社会主义嘛。泼冷水的事不能干，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损。下面不要搞浮夸，不要搞虚报，上面自己心里有数，内部讲清楚就好了嘛。关键还是要促进。）

关于“反冒进”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哈哈，原来周仲尼们就是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进行各种“周密的计算”，怪不得老毛要把他们“下放”到地方去搞调查呢。不过，周仲尼说没听取多方面意见，那是不对滴。明明是有不少人要求增加生产的嘛。只是周仲尼们给泼了冷水而已。周仲尼们也并非没有接触群众。只是周仲尼不认为“积极分子”算群众，不认为他们的要求代表了群众的要求。不过，说只看见死的物，而看不见生气勃勃的人，倒确实如此。把死的物说成实，而把活的人说成虚，真是高明的唯物辩证法咧。顺便一提，“少慢差费”乃是地方“积极分子”对中央直管的大型项目建设的批评。这说明周仲尼还是接触到群众，接触到群众意见了的嘛。周仲尼是每事皆问自己人，大略小节必躬亲。恋权不撒手，只为资掌舵。）

尽管毛泽东感到会上“思想谈得较少，似是缺点”，但是“这次会议解决了大批问题，比南宁进一步”。他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周恩来的检讨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哈哈，老毛可真是锱铢必较，不依不饶，周仲尼们都这么检讨了，“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嗯，河蟹师爷认为，老毛这个家伙真无情。本来也是，老毛心理装的是路线问题，阶级斗争的事，到成都会议还得出只是方法问题，当然不满意，还要往前推进。）

成都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马上开始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做准备。毛泽东离开成都，经重庆，下三峡，到武昌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传达成都会议精神，统一思想。

（继续巩固战果，准备用权威会议加以确认。）

五月五日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幕，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正式会议确立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这也是对斗争结果的追认。由修养来作这个报告，哈哈。）

报告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强调“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从五月八日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天的大会发言，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

（积极分子开始冒头，保守分子带上伪装，中间分子被裹挟，随流而动。）

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做了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

（继续主动承担责任。）

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经过斗争，无先锋老柯进入核心决策层。林妹妹此时还没暴露，占据了更核心的位置。）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

（最重要的执行机构，全部由资把持，搅无的屎简直轻而易举。无力量对比资依然有着明显的差距。）

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造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的状况。党的干部中又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经过斗争，定下调子，争论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更激烈的搅屎和反搅屎了。）

纵观这一战，无占据主动，在自身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取得阶段性胜利。最后所谓“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当然只能表明此时无的力量有所增强。老毛的意见获得通过，也只能说是无力量加强，并主动参与斗争而得到的结果。至于神马“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神马“集体领导受到损害”之类的，那就是无稽之谈了。有话说嘛，有话不说，这可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做法哦。不过，话说回来，核心决策层资依然占据压倒性优势。至于最重要的执行部门，那更是依然由资全面掌控。所以仅仅定个调是远远不够的，调只是指明斗争的方向，积聚力量去斗争才是关键。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 1967 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评：这段话表明了谁才是李老板真正的敌人：左派。大伙可千万别把现在的左逼和那会儿的左派搞混了。那可是 1967 年，香港的工人和大陆的造反派一样，充满了革命性和战斗性，大有干翻英殖民代理人，横扫一切大小老板之势。一时间资心惶惶，民心思变。可恶的左派给李老板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就是为毛李老板痛恨动乱。但是这一次，李老板没有选择逃跑，李老板对大英帝国有信心，对港府有信心。造反派们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表示了对香港工人兄弟的声援。当然，后来大陆的造反派被无情打击，香港的工人运动也遭到英帝港府的残酷镇压。不得不说，这里边周搅屎们居功至伟。周搅屎们不但阻止大陆造反派“破坏”中英关系，而且阻止在港党员采取“极端”行为。另一边则对大英帝国和颜悦色，暗送秋波。（本文的主角是李老板，关于周搅屎在这方面的功绩，俺们会单写一文）李老板真是好眼光，当年选择逃跑，那是对常凯申木信心，果然，常凯申被赶到了小岛上；如今选择坚守，那是对英帝国有信心，果然，工人们被压在了大山下。还好还好，谢天谢地。要是左派掌了权，那李老板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反面典型。李老板就是有觉悟，李老板清楚地认识到，那会儿无产阶级造反成功，李老板可再也不会像新中国刚建国时那样还能吃息分红，而铁定要直接被专政了。到那时，李老板不自个儿了断，就会被苦逼们活埋。李老板可就不是出现在福布斯富豪榜上，而是出现在反革命黑名

单上了。

！

##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

2015年8月29日 10:59 阅读 151 [新浪博客](#)

红卒按：姚文元同志的名字总是同“文痞”、“四人帮打人的棍子”、“文字狱”联系在一起。一个人若只听那些宣传，必然得出这种印象：姚文元擅写迎合政治风向的大批判文章，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罗织罪名，靠着这一手吓得全国人民说话写字都胆战心惊。有些人觉得这糟的很，我们却觉得这好的很。敌人之所以加给我们各种指责、辱骂，甚至污蔑，是因为我们戳到了敌人的痛处，这正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豪的敌方。因此，我们将姚文元同志视为我们的先驱，我们选择以更坚定的立场来继承姚文元同志的革命事业。我们深知，所谓辱骂、污蔑，乃至肉体攻击，只会加深我们的仇恨，加强我们的斗志，加快我们的反击。下文是姚文元同志“迫害”走资干将陶铸的“罪证”，特此刊出，并加按语，与博友共赏。

### 评陶铸的两本书

姚文元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那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sup>①</sup>。“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sup>②</sup>，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sup>③</sup>。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付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按：不讲阶级专政，只讲服务社会的小资左派的祖师）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sup>④</sup>；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sup>⑤</sup>。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

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sup>⑥</sup>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按：拥护“五星红旗政治格局”即人民民主专政时期人民范畴的小资左派的祖师）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sup>⑦</sup>。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sup>⑧</sup>。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

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sup>⑨</sup>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sup>⑩</sup>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sup>⑪⑪</sup>。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sup>⑫⑫</sup>（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按：天天向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辩白，把社会主义描绘成祥和安宁的牧歌田园的小资左的祖师。）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①③。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 红旗》报道：请看苏修的新玩意

2015年6月12日 17:51 阅读 77 [新浪博客](#)

红卒按：最近高考代考行业被曝光，似乎大大地搅动了大小公知良心、各路苦逼屁民的神经。其实本无足怪，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有利可图，就能成就一个行业。公知良心们的眼界，也就到公平竞争为止了，苦逼屁民也跟着嚷嚷，为这不公平大为懊恼。教育制度本就是为阶级统治所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自然要资产阶级的苗子，自然要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所以，教育制度越是公平，就越能稳定资产阶级的统治，越能为统治阶级增添活力。这本是统治阶级所要求的。至于不公平，那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衍生现象。因此如果停留在对这种不公平的指责和抨击，而不进一步指出其资本主义的制度根源，那终究不过是帮忙改善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罢了。我们所要的，不只是竞争的公平，也不只是教育制度的改造，而且是教育内容的改造，教育者的改造，教育的服务对象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下文是75年《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讽刺苏修的，可对比现状，是否有如当今的时报？当然，如今不是修的时代，而就是资的时代。而且下面这些现象，也是由来已久，非今日才有的。

请看苏修的新玩意

《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

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注：似乎还没有各级党校，看来预言不能百分之百准确)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

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红卒按：对话源于乙发的一段视频，里面说邓挫说过这辈子最亲的人是周仲尼；于是双方对周仲尼进行了揭批。一切无不是决定于阶级屁股。周仲尼的资出身，洋经历，并没有被



革命洪流冲洗掉，反而在斗争中越发坚定；打鬼子斗地主不手软，压制革命同样不会手软，就是对洋人、对知识分子礼让三分，乃至奴颜婢膝，这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立场。我们看周仲尼，也还是看他的各种行为的阶级性，看他是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反对哪个阶级的利益。史书总说周仲尼对维护文革稳定居功至伟，这话倒也不错。实际上只有一股力量对另一股力量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时候，才有所谓的稳定；稳定要么是东风压倒西风，要么是西风压倒东风。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恰恰是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既然周仲尼极力维稳，那么只能是壮大资的力量，削弱无的力量，这样让资的力量对无的力量获得压倒性优势，西风压倒东风，于是就稳定了。

甲：周是走资头号带头大哥

乙：这家伙害死林彪和所有老师包括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邓下放江西受他照顾住 2 层洋楼，配车~~最后复出颠覆中国。

乙：周拼了老命把邓整到国务院总理的位子上，邓是当年刘少奇反革命路线的最忠实执行者，历次反革命极左破坏的中坚，周竟然做这种事-----太令人发指了~~

甲：岂止是邓，所有被无搞下去的资干部，都受到了周的照顾，并且被捞回来了；周还善于卡位，安插钉子；不得不说周周仲尼搅得一手好屎；组织工作，特务工作，那都是炉火纯青。

乙：所以说，不怕良相.不怕奸相,就怕奸相装良相~~

乙：十里长街送总理和 45 天安门事件真是一出好戏-----反制四人杰的苦肉计。

甲：文革第一大冤案不是整资派的，而是整的造反派，那就是著名的 516 反革命集团案，反的就是周周仲尼。其实整个文革当中都有相当多有觉悟的造反派怀疑周仲尼，直接贴大字报小字报指出周仲尼是右派。

乙：细看历史，你可以说周是个无原则的老好人，没事最好，有事检讨，永远的不倒翁，出了事有别人顶罪，他像是个闲人，但是他绝非无能之辈，而是军校出身，早年留日，后留德法，特工之王，深不可测，谁看清他都会倒吸凉气，至少他是个权谋家和机会主义者，永远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他是国共合作的缝衣针，

甲：那可一点都不老实；搅屎天下第一；当年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周周仲尼要求给人赔礼道歉；风庆轮事件，还是周周仲尼带头搅屎

乙：可是除了四人帮，谁都说他好，领他情，他好会演~~

甲：他是走资干部大恩人，走资干部又掌了权，好话自然都由干部们说啦；老毛三七开，周仲尼是完人。

乙：周仲尼是孔子，批孔是批他？当年四人杰是真想批他，可是他太会收买人心

甲：不只是收买人心的问题，组织大权牢牢在手；林彪被搞掉之后，就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和他相抗衡了

乙：他炸了林飞机？

甲：这个应该不至于，只要飞机一起飞，林彪就已经完蛋了；如果说周在这事儿上耍了什么计的话，应该也是“帮助”林成功上机，排除中间所可能碰到的障碍

乙：飞机尾翼中途爆炸，迫降失败。我看过详细资料，照片显示炸孔外翻----记的克什米尔号吗？

甲：反正林这个事获利最大的是周仲尼帮，因此有作案动机；对林的监视最终由周负责，所以现实条件也完全具备。

乙：周一死，邓就下台，然后华国锋上，主席就是不给四人杰机会是闹哪样？

甲：事实证明，华老实一点也不老实，不过政斗水平着实烂，邓挫们都是几起几落，大风大雨过来的，斗华老实易如反掌，不过这都属于他们内部斗争；不给四人机会，可能本意是要华老实来居中缓冲，不让四人直接和邓挫们厮杀。不过阶级力量已经完全逆转，选谁接班大局都不会有变化。

## 怎样读史之邓左王

2015年5月23日 09:10 阅读 75 [新浪博客](#)

红卒注：左王这只老龟于今年毙命，各路左逼如丧考妣。乌有左逼更是把各种赞辞都加在了左王头上，怒赞左王敢与邓挫叫板的战斗精神，痛斥邓挫对左王的各种排挤压迫和迫害，力主左王是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高层为数不多的走社派。诸如此类荒谬至极的赞誉，让人听了感觉好笑。不过左逼向来如此，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左王左王，左逼之王。左王仙逝，左逼哭丧。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下面看看我们的同志是如何看待左王的一生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能给以左王如下评价：左王的一生，是可笑的一生，龌龊的一生，混蛋的一生，徒耗粮食的一生，寄生虫的一生。

前言

“左王”这绰号是香港媒体给邓力群起的，小 20 年历史了。邓力群曾经是大人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 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之，在 80 年代，胡 XX 和赵 XX 是邓挫的右臂，而邓力群和陈云就是邓挫的左膀。

很好奇，当某些左派公知们把一个码字儿的老作家供奉到神台上后，这个圈子就搅起来了，唾沫横飞，吵的是这老头儿到底是好人还是坏蛋。更好奇，某些左派公知们居然否认“三中全会派”的存在。

大伙为一个死去作家骂的热火朝天，三中全会派的大腕们却一个个瞒天过海，一个个又安安稳稳的当上了“龟命”的祖师爷，前辈，先驱，硕果仅存的种子。。。。。。他们正襟危坐在讲台上，讲的不是穷比如何闹翻身，而是呼吁穷比跟着他们“斗走资派”，看到穷比面有不屑，马上搬出老毛来。

对，“老龟命”们，人家老毛当然斗过“走资派”，可当时 Y 不是反对来着么。得，“老龟命”们簇拥邓挫胜利大反攻，不斗了。如今，Y 却让俺们斗尼玛的“走资派”，这难道不是在侮辱我们智商么？

爷！俺们喊你一声爷成不？现在是资本主义哦！尼玛你把老板们当做一个“派”，你指的是麦当劳的苹果派么？如果资产阶级只是一个“派”，只是“假共产党”，那 Y 连条小毛毛虫都算不上。

“老龟命”们回忆录也有共同之处。他们为了唆使徒子徒孙们渗透进当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一个个装出一幅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的样子称颂起“文革”来，同时，他们继续破口大骂“四人帮”，意思是，要不是“四人帮”瞎搞，把“老龟命”整倒了，“文革”就胜利了。

这种逻辑就等同于，他们认为，只要不下台，不滚蛋，那“文革”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可问题在于，“老龟命”不下台，那还叫“文革”么？

文革初期，“老龟命”还真的没下台，在短短半年内，他们上演了一出出给文革泼屎泼尿的好戏。因此，他们到了行将就木之际，为了投机，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过去，夹起“三中全会”的大尾巴，露出支持文革的笑容----他们要的只是自己没垮台前的“文革”！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穷比们的智商，他们要装也装不像。因为尾巴太大了，藏不住！

社会主义，人们要文革，他们不干。

到了资本主义，我们每天都在进行残酷的劳资斗争，他们倒呼吁起“文革”来了。一个个起劲的把文革吹捧成天堂一般的“革命”。

是啊，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搞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多么如意的算盘啊，多么惬意的“革命”，甚至可以作为“文化产业”来干。只要赚钱之余，呷口咖啡，大骂一下“世风日下”，大骂一下“道德沦丧”，就可以成为“革命者”了。

这些，就是“老龟命”们力图栽种到无产者队伍中的邪种。苏神教怂恿穷比帮工头讨薪，而不是弄死“进步产业资本家”；同理，“老龟命”们在怂恿穷比们跟他们斗“走资派”，而不是打垮整个资产阶级专政（一旦我们提出这个口号，他们就万分紧张，说我们是美帝派来的，说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

我们会上当么？去年，有人让我加入到“批判”某位老作家的战场中，我拒绝了。原因很简单，这到底算是啥事儿呢？捡芝麻丢西瓜！老大在哪儿呢？邓挫的左膀是谁呢？为啥要放过他们呢？

从那时开始，我就对邓力群，陈云二位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价值岂是巍巍能比的？陈云早就挂了，而左王先生今年高寿九十好几，不趁着他活着批他，那将来只能“欺负死人”了。

有朋友说，人家好歹 90 多了，你骂人家，也得折阳寿。我觉得，人家董存瑞拿着炸药包就上，而我无非骂个老不死的，折点阳寿不算啥。

我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尽管“左王”先生为自己的“龟命”经历感到自豪，但实际上却只是可笑的一生，齷齪的一生，混蛋的一生，徒耗粮食的一生，寄生虫的一生！

本文依据的是“左王”撰写的自传《十二个春秋》以及《邓力群文集》。本文属于读书笔记，不以年代为序，看到哪儿就笑到哪儿，让大伙一块看看“左王”笑传。

—

先来聊聊两位网友的评论。

一位叫“新浪网友”，他老人家被踩了大尾巴，拍案而起，骂一条就被系统吃一条，越吃他就越来劲，于是一口气发了 5 条，幸好都被我收工回家及时捞回来了。我们把无意义的谩骂都忽略掉，就剩下一个很有意思的亮点：“借用所谓批形式“左王”或臭名昭著什么全会派而实质疯狂攻击魏马李”。

他觉得我们骂“左王”是为了攻击魏马李。可实际却是，这类人在拿着几个小龟来掩护大龟。当我们要绕开小龟的纠缠，他们就恐慌了。就好像 2B 神，当他发现我们挣脱他给我们设

定的所谓“市场”小圈圈，而展开全面竞争，他就慌了，他就完全忘了自己标榜的自由竞争了。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凭什么要依着你的指挥棒起舞呢？你们有足够的能耐抛出无数只小龟命，但绝不可能挡住我们捉大乌龟熬汤喝。我也可以正告这类人，以后这种事儿还会越来越多，你们就继续躲在小乌龟壳里吧。

还有一位叫【天门】，这位是老实人，他给我们提出了长篇的忠告，大意按“门纲类科属种”，左王据说好歹和我们是近亲，“泛左翼”据说是我们远亲，所以大伙要“团结”。可惜这位老实人的评论被河蟹了，没捞回来。

我们不想为难老实人，只想告诉他：打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其实一直都是“社会主义”占了上风----因为形形色色的势力都在鼓吹“公平和正义”，社会主义不但有上百种之多，而且从来都是社会的主流。因此，你给我们谈什么左翼，泛左翼，真的毫无意义。在这里面，只有一种社会主义让敌人闻风丧胆，因为它公开申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公开申明无产阶级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公开申明与传统所有制决裂，我们只会团结在这种社会主义的大旗下，而其余的物种，是你死我活的，无法调和的。本文就要让更多的穷比明白，像左王这类人，是我们不折不扣的敌人。他们曾经打垮了我们一次，他们还想再次打垮我们，这是痴心妄想。

下面“左王笑传”正式开幕！

1986年9月18日，这是“左王”难以忘怀的日子。不是因为九一八，而是他跟老大聊天。我们把这称为“聊天”估计让“左王”很不爽，因为他老人家认为在那天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他觉得自己跟老大“斗”了一阵。

“左王”对那天自己的勇敢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一直记着这次谈话。。。。。。一直没找着这个记录稿。。。。。。把这个记录稿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

“将来如果能有时机，把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那可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案。”（按：正式记录在老大手上，左王手头这份是自个回忆的）

“这次我和DXP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乖乖，真是扣人心弦！我们一道看看左王跟老大都聊了啥。

**DXP：**新的稿子（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左王：看了三遍。

DXP：还有什么意见？

左王：还有四条意见。

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从《新民主主义论》直接蹦到 12 大，三中全会派最大的特征就是“穿越”，左王不经意就供认，12 大跟“新民主主义”是一条道的）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左王承认，“尖锐”的斗争是为了避免误解）。

DXP：（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在道德一节提到“共产主义”，这文件出得妙，妙妙妙！）

左王：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左王表示淡定，左王觉得衡量是不是共产党人，要看有木有“理想”，有木有“道德”。我得跟左王说，历朝历代，缺吃缺喝，也绝少不了“理想”和“道德”，这两玩意保证敞开供应，应有尽有！）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左王想着，最好整个社会的“道德”都是“共产主义”），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DXP：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老大开始烦了）

（按：高潮来的如此快，开门就见山。我得插入总结一段。

看过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应该有印象：导演跟阿星说，你可以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阿星问：我都有什么台词？导演脸一沉，翻了翻剧本，说，你有三句台词，第一句是“啊”，第二句是“哦？”，第三句是“还是走吧”。

左王先生和老大的“尖锐”对话，就是从探讨台词开始了。

老大：你，看过剧本没有？

左王：我很认真的看完了。

老大：觉得满意不？

左王：就是。。。就是（不安的搓着小手）觉得我的戏份有点少。

老大：哦？何以见得？

左王：你看，上一出戏我的台词是“共产主义”，戏份挺重的。这次，怎么就没我台词了？

老大：怎么可能？我记得有的。（拿过剧本，翻了半天）

老大：你看，我说有你的台词嘛----“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

左王：戏份也太少了吧。

老大：（不耐烦的挥挥手）有一个地方讲就行啦，你还有别的台词的嘛，比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左王：可我还是觉得不如“共产主义”这句来的有力，更能体现我的形象。台词一改，跟以往几出就不同了，剧本改动太大了，恐怕会伤了影迷的心

老大：我干你 Y。啥时候轮到你挑肥拣瘦。）

左王：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否认三中全会派的傻逼看好了，左王自己承认：近几年（1978~1986）我们党的方针是正确的，他还打算增加多点台词给自个儿吹嘘一下呢）

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道德，又是道德！左王想着“共产主义”也就只能玩玩“道德”了。对！每个老板都希望工人们都具有高尚道德----无私奉献，以厂为家，热爱劳动等等。“把共产主义变成爱的呓语”，老马两百年前就爆过“左王”了）

第四条意见，……（嗡嗡嗡，嗡嗡嗡，老大不耐烦了，打断了左王“爱的呓语”）

DXP：文件第 11 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哪个傻逼编剧改了老子的剧本，说！你给老子说！）

左王：乔木同志提的。（不用上老虎凳，左王就招了，乔木是傻逼编剧）

DXP：我圈掉了。

左王：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从 1978 到 1986 年，人民公社整个垮掉了，计划经济也瓦解为双轨制，所谓“不正之风”，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正常之风”刮遍神州大地，而左王先生和另一个傻逼编剧，却认为“资本主义复辟”只是“可能”。

但老大却认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老大认为，这是“必然性”，而不是“可能性”，这已经是现实，而不是“可能”。尼玛连这都看不懂，智商也忒低了。老子搞的就是资本主义，老子搞的就是市场经济，今天没搞成熟，将来也得搞成熟。而这，老大之所以为老大，左王之所以只能当个幕僚，就昭然若揭了。

这里，必须要提醒某些同志，不要再拿“修正主义”来概括 1978~1989 那段历史，也不要再用“修正主义”来评价邓挫。中国从 1978 年之后，就在有目的有步骤的实施资本主义，这个全球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一直都在主导着复辟的进程，不这样，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国资了。以后各位还会看到，这期间，左王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他是主犯而不是从犯，是穷凶极恶的叛徒内奸工贼，这个称号无愧于左王当过刘少奇的秘书。）

**DXP：**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左王：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左王明确表示，他要的是“维持政策的稳定---简称“维稳”！而左王的工作目标，他自己也供认：避免“引起人家的怀疑”。各位想想，人在什么时候才去操心“引起人家的怀疑”呢？老大和左王这两段对话，表面看上去“针锋相对”---这也是左王力图营造的假象，是他投机倒把的资本。可实际上他们聊了啥？

老大说：你这么瞎搞，会让人怀疑 XXXX 变了（生怕引起别人怀疑）

左王说：我这么做，正是为了不让人怀疑（还是生怕引起别人怀疑）

于是，二位爷聊的原来都是在“生怕引起别人怀疑”，他们到底在干吗呢？）

**DXP：**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老大发飙，Y 不要随便改我剧本）

左王：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左王说，冤枉啊，我干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剧本的连续性，过去我们干的都可以成功避免“引起别人怀疑”，“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

**DXP**：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左王：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 1981 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为啥不能公开报道？还是生怕引起别人怀疑）

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工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在某些傻逼眼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左王先生，希望能对“雇工问题”搞“周密系统”的调查。他不是要进行阶级动员，而是要“看看雇工有没有剥削”!!! 我用了 3 个叹号，因为到这里，我希望能找条老狗去爆他菊花。左王先生装傻充愣，提了 3 个课题：

1. 雇工有没有剥削。
2. 什么情况不叫剥削。
3. 什么情况又叫剥削。

老龟命在穷比面前装傻，是对我们的极大侮辱。他连我们的老板的万分之一的“真诚”都不如！能提出“雇工有没有剥削”这种问题的人，还敢厚着脸皮给我们充当教师爷，省省吧，Y 多活一秒钟都是浪费粮食。）

（这段谈话下面还涉及到别的，我就暂时不表了，单表最后左王的总结发言）

对 **DXP**，我做到了三点

协助 **DXP** 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也是近年来我反复思索的问题。仔细推敲和审视我的所作所为，我是问心无愧的（左王为河蟹稳定禅精竭虑，确实问心无愧）。我做到了以下三点：

第一，我确实是钦佩他，他有很大的长处（三中全会派表达了对老大的崇敬之情，没有老大，他们还在牛棚蹲着）；

第二，协助他工作，我确实是积极的（三中全会派从不否认自己工作积极，只有傻逼才说他们跟什么邓修斗争）；

第三，在困难或顺利时协助他起草文件、讲话，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是的，采纳不采纳都不计较，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如何“避免引起他人怀疑”，都是一条道的，无分彼此，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恩怨情仇皆为台词）

## 二

1988年，左王很失落。因为他在1987年的十三大中央委员会上落选。左王没想为改革大业鞍前马后竟暗淡收场。当然，跟以前蹲牛棚不一样，这次当寓公的日子闲云野鹤，让我这穷比万分羡慕。

左王曾是工贼刘的秘书，他始终惦记着前主子。11月，工贼刘纪念馆落成，他参加落成仪式。正好遇到了另外一位同样失意的哥们，在1986年下台的胡先生。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左王介绍的很简短，但很有价值。我单独提取出来，想让各位看看邓挫的左膀右臂们是如何发生了角色错位，更想让各位看看，神马左派，右派，左左右右，右右左左，都是多么的扯淡。他们之间没有根本厉害关系，甚至还自觉的取长补短，相互融会贯通。

我就约他，提出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他表示欢迎（还挺羞涩的，心里小鹿乱撞）。

见面后，我没有想到他也不介意以前的摩擦。鲁迅说过：“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个人的恩怨，在当时的情形下，的确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的情意。我们在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胡谈了一些意见。

（“度尽劫波兄弟在”----兄弟！“不介意以前的摩擦”----狗咬狗只是摩擦！原来他们毫不介意！原来他们有着情谊！这就是三中全会派的情谊！在共同反对文革结下的兄弟情谊！在大家心目中，胡先生貌似不属于三中全会派，因为他的娃胡德平到处吹嘘他爹始终如一的走在改开的最前列，始终如一的引领改开的风气之先。但在这里，左王先生替他洗清了屁股，左王承认，胡先生就是他的兄弟！MyBrother！D.Shopping is ourfather！邓挫是他们的教父！）

开始时，胡XX就对我说：老邓啊，现在流传四句话，你听说了没有？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现在流行和传播的很宽啊！

他接着说：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

（左派的剧本中，胡先生是一个性格急躁脑子缺根弦的政客。右派的剧本中，胡先生是一个率真充满正义和爱的可人儿。其实，哪个剧本都说同一件事儿：此人没脑子。可单从这句话看出，这位政客在下台后倒是领悟了不少。

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难道河蟹里面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方向”么？当代“左派”旗手们有个很搞笑的逻辑：据说国资代表社会化大生产，也就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然后，国资不断壮大，最后，正如某位先生所言，“只需要来一次革命”，无产阶级就“接管了国资”，于是，一个“动荡最少”，“破坏最少”，“代价最少”的“方案”就被“设计”出来了。

他们还理直气壮，说列宁同志就是这么说的。可导师说的只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在物质上”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同时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正如当代中国河蟹，一面公知们嚷嚷着“给予民资平等地位”（据说还有什么歧视），一面心里却明白缺了国资还真玩不转。公知们内心的焦虑狂躁正是社会深层矛盾的体现----全体资本家不搂在一块（社会化）会被弄死，但搂在一块又觉得吃亏，觉得谁谁占了谁谁的便宜。

因此，列宁同志只是从诸多现象中提炼规律，但左派旗手们却加入了“添加剂”：“国资”凭借“社会化”就成了穷比们的慰藉。这等于认为，老蒋的武器越先进，将来我们收编他们获益就越大，于是老蒋“强国强军”反倒成了工农大众的依靠！！而炸了老蒋的碉堡，坦克，军舰却成了罪过！！尼玛这是在恶搞中国革命史么？

坚持专政没对象？在 80 年代，邓挫利用私人资本作为改开的先锋，却并不急于谋求获得“国资”---戏演早了就得穿帮。他深信只要持续搞下去（坚持改革开放），整个社会都会卷进资本的漩涡中。因为当时的穷比们早就放弃了搏击的工具，那么被资本吞噬只是迟早的。到那时候，“国营”变“国资”才水到渠成。

既然“资本”在培育之中，穷比们尚在惬意的戏水，那么阶级对立就不可能壁垒分明的展开，于是专政的对象就含糊起来。

到底要镇压谁呢？这是一个问题。谁是河蟹的敌人？谁是河蟹的朋友？犹未可知！知道了也不可说。

有人要动瓜子商贩年广久（就是说有人打算专政小老板），邓挫说，暂时不动，多看几年。后来有人要动作家刘宾雁（就是说有人打算专政自由派），胡先生也说，要“宽容宽厚”。

都不能动，刀要砍谁？老大心里很明白，有些人，今天在江湖，明日进庙堂，一刀砍下去，伤了明日栋梁的心肝，明日自己就得被赶出庙堂；而有些人，今天在庙堂，明日进江湖，一刀砍下去，伤了今日粉丝的心肝，今日就得被赶出庙堂。

总之，只有和谐才能成就河蟹。专政？让“自由”先飞一会吧。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政通人和”的 80 年代，一个让孔庆东这样的左派学者感到舒心的 80 年代，一个据说是夹在“多数人专政少数人”和“少数人专政多数人”之间的“互不专政”的美好时代，一个貌似从左摆到右的钟摆到最低点的高速疯狂无序的自由时代。

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阶级的力量到哪里，党的力量就到哪里。80 年代的河蟹，不再是修正主义，因为它们已经在“中国特色”上达成共识。河蟹在邓挫的领导下，已经比挣扎中的苏东同行先清醒过来：再在马列毛主义中纠缠只能是精神分裂----马列毛主义的严密逻辑不断嘲笑着修正主义者们的道貌岸然，迫使他们必须谋求裸奔。在这点上，中国河蟹走在苏东同行前列，他们的所有“创新”都有了新的平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需再“修正”什么。

但即便理论上的枷锁已被打破，可是阶级基础并不牢固，河蟹缺少广泛的基层小资群众，缺少作为中坚力量的大资本家，最重要的是缺少自己成为资本家（既然你要仁义，又怎么指望马仔们帮你仁义呢？所以马仔们“下海”不绝），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深化改革”中不断产生。而在当时，这一切仍处于混沌中----河蟹的未来究竟变成什么？河蟹的未来朋友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既然河蟹的阶级队形尚未齐整，这就是河蟹最为虚弱的时期。“党的力量”和“专政”本就一回事。“自我”的边界在动荡，“对立”面也就随之波动，于是“专政”就不可能锋利起来，“力量”也就无从谈起。

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三中全会派们认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对滴。他们觉得这玩意是老毛和四人帮的杰作。那么，既然要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马列主义当然就“抽象”了----任何社会学说，一旦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统统变成了“抽象”。好比任何自然学科，一旦放弃了“时间”和“运动”，就成为了神学。

“以阶级斗争为纲”，本来就不是马列毛的发明。谁不绷紧阶级斗争的弦谁就是傻逼。而马列毛只不过是公开，系统的总结出规律，正如牛顿不是发明了力学，而是系统总结了力学规律，从而人类可以有意识的利用规律。

因此，实际上，是三中全会派在玩“抽象”，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打算作为一个阶级社会的公民而存在，他们声称自己推倒了一尊神，却都在意淫自己成为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阶级社会所有的理性人都在有意无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谁也逃不掉。谁要放弃，谁就没有力量。偏偏又是胡先生这类三中派们意识到“党没有力量”，“专政没有对象”，他们看到了后果，却又避而不谈原因，沦为笑柄。

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特意和我讲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要借这些流传的话来讽刺赵XX。现在想来，恐怕他有两层意思：一是对赵XX，你不是讲我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你当了总书记后，在坚持这些原则上，好像也没什么好的成绩（左王认为，胡先生在跟赵先生比谁更烂）；也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你们都批评我不讲“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我就借用民间的舆论来证明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左王觉得这很容易）。

这样一番话，可能表明了胡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态，起码是还没想通、没解决。（这么讲，左王已经想通了？已经解决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当政时，就和《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这已不是一个问题了；统一思想不是统一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而是要统一在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

一直到现在，“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陪衬和口头禅，究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什么意思，胡、赵不清楚，我看许多人也不清楚（这么讲，左王很清楚了？傻逼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傻逼。相比之下，胡先生对这点比左王领悟更深，起码他初步意识到，在老毛时代，党内真懂马列的人很少，而在邓挫时代，党内傻逼却很多，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在胡的谈话中，表现出他对赵先生的那套做法不满意，例如他说：改造政治思想工作，怎么改啊？他说他对胡启立讲了，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改造我们的学习》，现在叫改造政治思想工作，不妥当、不慎重，他不赞成。还有，他说他不赞成赵先生搞的党委书记兼副厂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做法，对企业党委的领导属地化等办法他也不同意。胡还表示了对股份制不赞成，他说搞了股份制以后，就要搞股票交易所，一搞股票交易所，股票就分不清楚是哪个人、哪个企业的股票了。

（这段价值在于，这不是左右派大腕们编的针锋相对的“剧本”。在《笑传1》中，左王觉得“雇工是否存在剥削”是个有待研究的课题，如果把这算做“右”的话，那么以上那段话，无疑让胡先生成为了光荣的“左派”。

右派公知们都在颂扬胡先生的仁爱，可这段话却煽了右派公知们一耳光，包括胡先生的儿子。胡先生分明是个“左派”嘛。我们看到，短短一段话，胡先生操心了3个问题。

1. 不赞同赵先生淡化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老实讲，当今企业，没有哪位老板会放弃“政治思想工作”。以前组织员工旅游，叫“福利”，现在改叫“团队建设经费”。可见，胡先生引领的才是左派的风气之先，他是9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的先驱，这伙人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成就了一方事业，博得老板们的青睐。可见当代各位老板，包括HR，统统是左派，他们每天都在加强“企业政治思想工作”。



2. 不赞同企业“属地化”。这得介绍一下时代背景了：河蟹十三大决定：“现在由上级行政部门党组织垂直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当时吹嘘，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又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必须而又有效的途径。。。。。

可以说，“属地化”是鼓励资本“自由化”的举措。从那以后，小煤窑小矿山就遍地开花，计划经济更趋瓦解，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变卖国营企业，都是“属地化”的功劳。那么对这种伟大举措，当代不少富人都得感激一辈子。有人好奇中国富豪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难道都跟瓜子商贩年广久那样一袋一袋赚回来的么？那太累了，人活着最悲惨的事儿就是，钱有了，人没了。因此，“属地化”真是一股暖流，一阵春风。

可对此，胡先生却毅然站到了“左派”的一边，他反对这种自由化，但既然如此，他就没法兑现“政企分开”的承诺！于是，他只能陷于可笑的混沌之中。

其实，从来就没有“政企分开”，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更加不可能有。谁要真相信“政企分开”，谁就是傻逼，这就等于相信“权力和资本分离”，相信“权力和生产资料分开”，相信“民主和专政分开”。

邓挫言必称“政企分开”，而胡先生也鼓吹“政企分开”，但境界却有天壤之别。政企分开在邓挫眼中，永远只是一个工具。而在胡先生眼中，却成了终极事业。为此，这位爷寄予太多的幻想，一个目标成了毕生梦想，那就不免小心翼翼，投鼠忌器，生怕出了什么歪招破坏了自己的蓝图。

实际上，“属地化”和“垂直化”压根就不是根本对立的问题，只不过是利润分成的调整而已。为彻底瓦解计划经济，“属地化”立了汗马功劳，可分了以后还得合，那就得有后招，当代的“大国资”又开始了“垂直化”的进程。事实上，资本垄断必然带来“垂直化”，全球大企业的各级领导既不是“民选”出来的，也不是“招募”出来的，而是自上而下长期考察出来的。

于是我们的胡先生再次引领了左派风气之先，他操心的身后 20 年“国进民退”的大事，是当代左派旗手的先驱，伟大啊。

3. 不赞同股份制。相信富豪们会震精了：原以为胡先生是咱家的人，胡德平就是这么说的嘛，《炎黄春秋》也这么说的嘛，国内外右派公知们都这么说的嘛，反左斗士胡先生，居然会反对“股份制”！乖乖，这不要俺们老命么？

胡先生对股份制的理解是没错的：一搞交易所，就分不清谁的股票了。但胡先生的股份制的价值判断却很可笑。想起一对孪生的同学，我曾问，我咋分辨你们呢？他们笑了笑，自己知道谁是谁即可，为啥非得让你分清呢？这可以回答胡先生的疑惑。

资本社会化，为啥要让穷比们分清老板甲乙丙呢？有意义么？



胡先生不是左派剧本中的奸臣，相反他是忠臣！他下台后还替河蟹操心，股份制后河蟹老大咋分清诸多股东呢？但相比之下，邓挫就豁达的多，他指出，股市有问题，关了即可，关也可快关，也可慢关。。。。。。

邓挫此话只是调侃。他清楚，股市一旦开了就没有任何理由关闭。河蟹有必要挨个认识小老板么？难道跟小老板们挨个握手有必要么？有了股市，资产阶级更加鲜明的以“阶级”的身份来统治社会。既然股市可以让诸多老板融为一体，那同样可以把河蟹自身也融为一体。还分什么彼此呢？

而对我们这些穷比来说，只要稍微有点觉悟，都能明白一个常识：咱们的老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老板和老板之间错综复杂，或者说，我们压根就没必要分清这个资本或者那个资本。重庆市长黄奇帆说的好：还分什么国资民资么？资本只有大小之分。这就是 DXP 分子的觉悟。只有苏神教，张天师，网易诸多右派公知们才在为什么国资民资洋资而相互撕咬。

胡先生一直都在替河蟹操心，他跟左王一样，都是河蟹的忠臣。首先，他操心“企业思想工作”，他的未竟事业正由千千万万的 HR 继往开来；然后他操心“属地化”原则是否会瓦解河蟹，但当代国资委的“大国资”实践足以让他含笑九泉；最后他操心交易所是否让河蟹丧失对资产阶级阵营的监控，对此，证监会，银监会，各地城投集团都给胡先生交出漂亮答卷。

胡还说，他与其他人不好多接触，只有胡启立、田纪云还到他那里聊聊天。他有事、有意见，也找胡启立谈谈，由其转告。

我把与淡化党的领导有关的、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说，表示了一点意见。胡先生好像也没有表示什么。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结果也是满意的。

（总结的多好啊！真诚的感情！融洽的气氛！满意的结果！请问拥护三中全会派的傻逼们，你们还有什么好抵赖的呢？有些善良的朋友会以为，三中全会派的老龟命们晚年有所悔改，我们不要揪着不放。我要对这些朋友讲，阶级斗争是谈不得什么“广阔胸襟”的。大是大非，容不得广阔胸襟。右派公知们常说，老毛胸襟狭窄。没错！好的很！

老龟命们所谓反思，都是皮毛。他们无一在穷比面前交代任何实质问题。相反，在我们高度重视的原则问题上（如何对待文革，如何对待改开），他们压根就没有做出任何改弦更辙的动作，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于是才有了左王为自己表功的“自传”。恰恰是这样，我们才得以一见端倪，并呈现给我们尚有幻想的同类。

可见，胡先生的所谓“右”，左王先生的所谓“左”，均来自于左右派的剧本。他们没有任何根本对立。他们是戏子，他们是兄弟，纵是争吵，戏后也会相逢一笑。他们的撕咬，只是演肥皂剧，只是吸引穷比们的注意力，而背后，以国资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集团坚定不移的大踏步前进。他们已经在 20 余年里成功的压制住我们，可如今他们正在面临我们越来越

激烈的反抗。穷比们对自身利益愈加清晰，鬼魅魍魉就愈加恐惧。他们不得不祭起各路老龟命们，企图倚老卖老，驯化我们。这目标能否实现，还请问问搅屎棍们答应不答应吧。)

## 怎样读史之文革史（二）

2015年5月26日 08:36 阅读 51 [新浪博客](#)

### 二

时间：66年5·16通知——7月底

事件：改组文革小组 改组北京市委 大批派工作组 撤出工作组

31.毛认为，一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

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无和资有共同目标：反封建，反军阀，反侵略。不是资不想独立完成，是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资压根无法完成，孙和蒋都没干玩

32.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毛的社会主义主张无法实现，毛并没有守成老死，而是继续战斗！刘少奇等一些领导人与毛代表不同路线，我的正常工作就是让你不能正常工作，老板好活必然苦逼难活

33.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正式名称为\*\*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其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新小组成立，原先是资镇压无声音的工具，现在要反过来啦！

34.5月15日成立的首都工作组

成立的首都工作组也好，改组的新文革小组也好，都是政府和党常设机构以外设立的临时机构，而这些临时机构拥有的权力是超过常设机构的。这种方法，国民党也用，蒋公子不就带领一个走私稽查小组去上海查封他姨弟的海关库存吗？今年打苍蝇也打老虎，也是工作小组。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35.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看到这，总觉的老毛太仁慈了！刘邓路线从上到下的成员，十年内压迫无、歪曲无路线纲领的做法，毛未必不知道？毛与刘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完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推他们到了前台，退无可退！毛对刘个人，一直团结—批评—团结

36. “五一六通知”还批判“二月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

直指本质，老毛不愧是无路线最杰出的代表，最善战的战士，同时是指挥家。直接命中资路线的命门，修正的意思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打着党\*\*的牌子，走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

37.毛认为，在资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无先锋队 and 人民群众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

这样的认识符合唯物辩证。领导层出修正，并不是野心家，阴谋，而是有着广泛的中低层基础，是阳谋。另外更广泛的中低层工农，他们的先锋队呢？

38.5月5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苏联斯大林后出了赫鲁晓夫，打着社旗走资路，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毛作为无先锋队的杰出代表，壮士暮年，战斗不已！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教育更多的接班人

39.还在61年至64年间，邓拓、吴晗、廖沫沙分别在《北京晚报》等报纸上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发表杂文，并以共同的笔名在《前线》上合写《三家村札记》

俺看过《燕山夜话》，读来很像读者和青年文摘，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大员对封建官僚附庸风雅的事情乐此不疲，而且还有一大票听评书的粉丝拥趸

40.毛在寻找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突破口，以形成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社会压力。恰在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于5月25日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

力量是现实存在。无和资的路线斗争，上到庙堂，下到课堂厂房，普遍存在。干柴遍地，星火燎原

41.聂元梓等，违反周关于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的指示

这也是文革派的罪状之一，违反“内外有别”规定。这不如说是奖状！如果斗争要钦此，要批准，要在传统的资法权的条条框框下，顾虑上下有别，男女有别，老幼有别，合不合法？那还叫革命吗？他们的贬斥，恰是对我们的表扬！

42.6月1日晚，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聂等人这张后来被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一天，已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鼓动群众起来，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孔老二现在又借尸还魂了。当代衍圣公，吃喝抗日，旅游锄奸，网站致富，筹款敛财，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封建社会穿越到了现代化帝国，堂而皇之成为老板全面麻痹苦逼的工具

43.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联想起5月15日首都工作组保卫安全，和文革小组换血，毛在控制全局的情况下，没有搞阴谋袭击，定点清除掉，而是公开社论大鸣大放。对比一下10年后资路线的秘密反扑，秘密审判，不换思想就换人。他们为什么心虚？因为他们和所有的老板都一样有着共同的噩梦：一旦无再觉醒，就不会只是文革了

44.6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此前一天，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代行党委职权”，对“文革进行领导”。

换了老龟命，路线照旧，继续维稳？！什么情况？

45.度娘一下李龟命：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67年1月至4月，到天津工作。68年2月至70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文革”期间，遭“四人帮”迫害8年之久。

李雪峰同志因病于2003年3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尼玛活97岁，“迫害”是不是帮着他掉了三高？！

46.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鼓动“一切革命同志”起来同维护原单位领导的“保皇派”进行坚决斗争

3号派工作组维稳灭火，4号公布决定，用李雪峰、吴德取代彭真、吴晗，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放小鬼，掀翻阎王——资方和无方在激烈角力！

47.自6月1日起，短短几天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出现了学生造反的“革命行动”。学生们在学校里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矛头指向校党委、党支部及教师

为什么人民日报发文在后，全国发生模仿北大聂元梓们的行为在前提？是干柴遍地的结果，还是阴毛论说的“江怂恿别有用心投机分子搞的”

48.刘、邓面对哄然而起的群众运动，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加以约束，防止混乱局面继续扩大。6月3日，在刘、邓主持下，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按照党领导历次群众运动的做法和毛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大派出工作组的先例，同意北京市委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

理由够不够冠冕堂皇？力量到了，无需解释。我能解决你，我干嘛跟你费吐沫星子？每个工厂都像一所监狱，所有苦逼都接受苛刻的条令管理，从考勤着装，到言谈举止，吃喝拉撒，又哪个老板给理由解释吗？

49.全国大批派出工作组

还是那个问题，到底是先有人煽风点火，群众盲动，还是先有群众基础，遍及全国各条战线从上到下的激烈摩擦，然后是在这次事件中集中爆发，量变上升为质变，隐藏变为公开？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参照毛批准的做法…帽子够不够大，够不够理直气壮，资派工作组，就是占位，让无不能起来造反。刘邓的资路线力量，可以同时向全国所有院校大批派出工作组，丧心病狂可见一斑！

50.薄在一次重庆出租车司机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瓦解手法，堪称典范！

[//news.qq.com/a/20081107/000228.htm:](http://news.qq.com/a/20081107/000228.htm)

派工作组，就是针对应急事件，在原有常设部门外，建立临时集权部门。当临时大量发生，临时部门就变成常设——所谓政府，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对抗中调和出来的。如明末朝廷应对农民起义，从巡抚→总督→督师

51.6月3日，政治局，对大、中学校开展运动作出若干规定。几日内，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学校派出工作组。…对大批派工作组，毛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维稳 VS 运动，河蟹 VS 混乱

52.毛在7月8日给江的信“现在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革，就是一次认真的演

习”。毛确信，中国正处在坚持走社还是走资的紧急关头，从长远看，付出大乱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资无路线从上到下的普遍对抗，提供了遍地干柴

53.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后，宣布停止原校领导的职权，由工作组代行领导。组织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斗争，主持对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批

你相信吗？“钦定”的革命，“批准”的革命，“合法”的革命。工作组的目的昭然若揭——稳腩！同样也是全国铺开，党羽遍地。资工作组在运动初期，双方各打四十大板的方法，俺们只能认为是资对这次运动性质认识模糊的表现。资采取了上次 57 年反右时候的做法，红色政权后代对沽名钓誉的“独立”知识分子实施专政，清洗本阶级队伍

54.6 月 18 日，北大的一些学生避开工作组，将 40 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发生了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等行为。工作组发现后迅速予以制止

这招儿其实没啥新鲜的，不过是德国国会纵火案的翻版，不同的是上次是纳粹，这次是资路线骨干。啥？证据？人民日报社论发了可以公开搞批斗，为啥这一小撮要私下搞？

55.根据刘的意见，党\*\*于 6 月 20 日批转了北大工作组的简报。刘在为批转简报所加的按语中说：“\*\*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照办。”

够快！资路线崽子们在当权派庇护下称王称霸，516 后无路线力量壮大，保皇派成过街老鼠，黄四郎的徒子孙们不能继续明目张胆的称王称霸，接下来会甘心交权吗？他们又会从黄四郎身上学啥招数呢？

56.各地工作组在贯彻党中央上述精神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

哈哈，资无当然都是得到多数群众支持滴！阶级社会，先阶级再左右，群众这个菜筐里面可是啥菜都有。如果造反派是少数，为啥人民日报发文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资崽子唱的这出戏，就是黄四郎打手摸黑冒充张麻子手下，四处奸淫掳掠，转移矛盾，瞒天过海的俗套招数嘛！

57.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刘、邓等领导人同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陈江康等的挑动和支持下，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到 6 月中下旬达到高潮

不是说工作组得到多数群众支持嘛，肿么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赶跑啦？工作组替谁撑腰不是昭然若揭吗？靠跪舔围观，转发关注，可以撵走工作组吗？力量，还是力量！



58.7月19日、22日，刘两次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革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等多数同志的反对。由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立即撤出工作组，陈等的意见被否决

只想着合法跪舔的托派先生们看看，从来都是先有斗争，后有法律追认。托猪喜欢举李立三、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人罢工成功的例子来证明上街有用。俺想，当时一定是资本家良心发现，血液里道德成分噌噌上涨，才同意的工人涨薪等要求。

59.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当斗争陷入胶着，刘邓们继续沿着资路狂奔时，老毛再次选择了战斗！七律·有所思（66年6月）反应了毛当时的心境：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神都”就是北京，“南国踏芳枝”指毛去武汉南巡。“青松”指无，“败叶”指资。“满街红绿走旌旗”指红卫兵们在北京城大街小巷贴的大字报，“潇潇雨”指运动来了的混乱情景，“故国人民”指全国各阶级的都在思考这次运动中如何站位。

60.毛对运动的进展表示很不满，认为北京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7月25日，毛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在京的各大区第一书记时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他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毛敲打工作组，是给刘邓改的机会。太仁慈了！

61.毛又说“要允许群众通天”，认为规定“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7月28日，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五行山搬开了，没有造反群众的力争，靠托猪鼓吹的合法-理性-转发-跪舔-围观，行吗？

62.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周刘先后讲话，代表\*\*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说：派工作组是\*\*决定、\*\*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决定撤工作组

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在\*\*这个位置上，你奈我何？



63.撤出工作组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削弱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

彭真在位的时候，北京是一个铁桶；彭被撵走李龟命继任，北京是铁桶一个。文革前，资崽子和学校当权派穿一条裤子；捅翻了当权派来了工作组，资崽子再和工作组一个鼻孔出气。不斗行吗？

=====

总结 5 月中旬到 7 月底的斗争，文革已经初步发动起来，初期的时候，范围主要局限在学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部门发动起来。同样的路线斗争，在 62-65 之间开展过多次。当时的斗争就已经在工农教文艺多条战线展开。每次都是无先公布个 XX 多少条，资不久就会公布个 XX 后 XX 条反正，基层势力各取所需，都有党\*\*的文件。无力量大的地方，坚持宣传对无有利的条款，为无服务；资力量稳固的地方，对资有利的文件成了尚方宝剑。

## 怎样读史之文革史（三）

2015 年 5 月 26 日 08:38 阅读 42 [新浪博客](#)

### 三

时间：66 年 8 月——67 年 1 月底

事件：八届十一中全会 《炮打司令部》 文革十六条 政治局改组 大串连 安亭事件 上海工总司成立 一月夺权

64.1966 年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到 7 月底经过两个月的初步发动，文革主要在学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部门发动起来：

与 62-65 年之间无和资的路线交锋不同，当时的斗争就已经在工农教文艺多条战线展开。无每先公布个 XX 多少条，资不久就会公布个 XX 后 XX 条反正，基层势力各取所需，都有党\*\*的文件

65.经过两个月的初步发动，文革主要在学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部门中：

66 年这次的开始类似，资原本以为用以前常规走法，就能凭借组织优势化解压制。这次派出工作组到收回，反应了资无对抗程度加剧和斗争走向纵深！围绕运动的领导权，双方热身后将展开更加激烈的争夺！无先锋队员们，战斗吧！

66.8 月 1 日至 12 日，毛在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5月底，清华附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其他中学闻风而动。6月24日和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无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这两张报在8月下旬先后由《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

67.全会首先由刘作报告。他介绍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在国内、国际方面的一些主要工作和基本的方针政策，对派工作组承担了主要责任。在以后两天会议上，一些部委、省委和各大区负责人纷纷检讨文革以来自己“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资先锋队的缓兵之计，无先锋队会不会滋生骄傲轻敌情绪？要不要帮打落水狗？

68.8月4日，毛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违背自己命令。\*\*”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革，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违反马列主义：

老毛是接地气的，是清醒的，对资的缓兵之计，步步紧逼！

69.8月7日，会议印发毛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立场上，实行资专政，将无轰轰烈烈的文革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的威风，灭无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黄四郎偷梁换柱被识破

70.大字报还针对过去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近的是62-64年，远的是57年反右，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发难。文革并不是什么偶然，早在文革前的十年里，就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刻的路线对立。毛代表无说出了5-7月的实际情况，“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

71.”全会通过“十六条”，指出，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改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7人扩大为11人，排名依次为：毛、林、周、陶铸、陈伯达、邓、康、刘、朱、李富春、陈云

66年8月，资无力量对比7：4，经济大权旁落。

那啥？“跟着我，有肉吃！”——无极

72.8月18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革”的集会上，毛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和各地普遍建立

此时的北京有些像二月革命之后的莫斯科，形式急剧变化，各方势力抱着各种目的纷纷涌入，都不明白怎么回事？随着斗争形势渐趋明朗，矛头直指资路线，各方势力才站队开操！

73.8月中下旬，北京的红卫兵率先冲出学校，走上街头，破除“四旧”。城市的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等地方许多老名称、老字号招牌被当作所谓“封、资、修”货色，统统取消或砸掉，换上含有“兴无灭资”的新招牌、新字号。

北京人民的生存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上，所以革命并不是活不下去才爆发的。十月革命不是，辛亥革命（如果算）更不是

74.北京长安街“东方红大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反帝路”，西交民巷“反修路”，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市百货商店”，协和医院“反帝医院”，同仁医院“工农兵医院”，全聚德烤鸭店“北京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首都钟表店”

私有制产权，只是自发的认识到要操，但是怎么操，参与者还不自觉。

75.一些红卫兵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街头巷尾发生抄家、打人、砸文物、烧“坏书”、剪长发、剪烫发等严重违法行为：

资的力量大于无，靠和平竞赛，中间人会往哪头走？革命中有人投机很正常，很多人是被裹挟进来。

76.一些红卫兵组织还肆意冲击、抄掠许多享有很高名望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民族宗教界人士的住所，甚至向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下达无条件“解散”的“最后通牒”

77.从8月18日到11月下旬，毛共计8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达1100万。“大串连”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

高潮意味顶点，静止。在资看来秩序大乱瞠目结舌的时候，在无先锋队看来，斗争才刚刚开始。需要担心斗争被利用被投机吗？根本不需要！被投机说明你有力量？没力量，谁投机你？

78.66年9月中旬，在周主持下，经毛批准，\*\*就维护工农业生产问题连续发出通知，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岗位，完成好生产任务，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不搞群众直接“罢官”

只要经济基础不乱，想唱红歌就唱吧！想骂娘就骂吧！物质力量只有靠物质力量才能消灭，双方都清楚斗争的关键所在

79.10月5日，《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说，“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同日，中共\*\*转发《紧急指示》，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应坚决贯彻执行

林不这样搞，不明确站队，啥时才能跳出刘邓周叶党委、工作组的五行山？

80.工作会议之后，林、陈的讲话被大量印发，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造反派，成分也越来越复杂

这不是很正常吗？骑墙派，没有牢固基础，在斗争中必然快速分化。有经济基础的投机者，会被自己阵营推向风头浪尖，等到弄清楚文革原来就是要操自己时，就该分道扬镳了

81.造反的群众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提出各自的要求

群众傻吗？不傻！知道运动会过去，机会来了，能搭顺风车就搭，能提要求提。现代人不要认为，那时人傻，是被误导利用。自称傻的人，往往不傻；认为别人傻的人，是在给自己的无知找借口

82.10月18日，清华大学校内和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11月中旬，聂元梓率人前往上海“点火”，动乱进一步升级，市长曹荻秋等领导人受到批斗。正在住院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受到冲击

上海作为争夺的主战场并不偶然。资不强大的地方，无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斗争也不坚决不彻底

83.12月下旬，华东各省市造反派在上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各地造反派在会上的发言都把攻击矛头指向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

力量相当的时候才会有激烈碰撞。力量悬殊的时候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资无碰撞最激烈的地方，是中央部委和大型厂矿，小生产占绝对数量的二三线城市，乡村，反而都薄弱

84.在冲击各级领导干部的过程中，各地还出现了“抓叛徒”活动。在北京发生了揪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事件。这是康生为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诬陷刘少奇而捏造的一桩冤案

路线斗争是本质，至于以什么形式达到，抓叛徒可不可以，贪污腐败可不可以，老婆崽子买法国别墅可不可以？这批文革期间第一批倒下的资代表，改开后全部起复委用。这帮人中诞生了诸多清醒的DXP分子。从这个角度讲，文革无发动的第一拨“斩首行动”，可谓定位精准！

85.周于9月8日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周一再强调，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对不能停

周在进行搅屎！毛说革命生产双胜利，周变成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成了目的。

86.11月初，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代表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陶铸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工人组织的规定，没有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

国民党也不承认共产党是合法政党，不过是赤匪嘛！力量到了，自然就追认了

87.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带2000余人冲入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声称要赴京请愿。列车行至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被阻留。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断路，造成沪宁线全线运行中断30多个小时。这一事件被称作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承认以王洪文等人为首的“工总司”是合法组织。

托猪秋火之流推崇的2012港逼码头工人上街罢工走秀模式和台逼退休工人联合会模式，与工总司，与六十年代港英工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罢工相比，简直弱爆了！香港工人的先辈们，那时怀着仇视、鄙视、蔑视的心情，对港英老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88.陶铸、谷牧、余秋里和对工交企业几个月来遭受冲击和破坏深感忧虑的与会者，纷纷以事实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稿，赞同周恩来等人的一贯主张，即工交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厂不要再建立群众组织，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等

捅到了老板的菊花！

89.《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先后下发。此后，在工厂、农村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连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全面地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

合法了，这下大家就满足了吗？

90.有人对所见、所闻的混乱局面感到困惑。有人撰文对“血统论”提出尖锐的批评。出现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一些工矿企业的老党员、老工人、老劳模自发地组织起来，抵制搞乱工厂生产秩序的造反行为

开始时大家都不清楚，操起来才清楚自己的屁股——经济利益所在，阵营开始分化

91.11月13日和29日，军委的几位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江青认为叶、陈“镇压群众”，并作为“十一月黑风”加以批判

学生→社会→厂矿→军队，各路都开操，旧有专政机构全面接受无的检验

92.上海“一月夺权”。1月6日，“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级机构被迫停止办公，上海市的党政大权随即落入造反派手中

王洪文，时为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干部，他听托猪的合法建议了吗？各路合法托派，工运服务商们还在争取亲嘴权，摸胸权和操逼权获得法律认可，否则就抱怨没有这三权，追女友都没安全感？！

93.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贺电，肯定上海“一月夺权”

力量到了，追认的合法就来了。半年前还是临时性质的文革小组，现在已经齐名于传统常设最高权力机构，并且成了能动性最高的机构，引领斗争方向的机构！投机进入的其他势力代表，都要重新站队了。墙头草是挨操的

94.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带动下，山西省，青岛市，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先后在半月内建立革委会，接管原先的省委和人民委员会，党、政、财、文等一切领导权悉归该委员会“接管”。逐步觉悟的群众，纷纷离开造反队伍，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反过来以种种形式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

从这里俺们看到的是逍遥派的屁股，绝不是无这一方。所谓不觉悟的群众，从来就不存在。群众依他们的经济屁股和社会关系，决定在文革中的站队。这些群众很觉悟，国家免费大串连，到哪里都是主席的客人吃喝免费，为啥不串呢？可以批斗骑在头上的领导，厂长，为啥不批呢？

95.周不能否定夺权，但竭力把它的含义解释为夺取“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权，而非全部党、政、财、文大权，一些党政机关业务部门的权力仍应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

周的立场始终与文革小组对立，代表资路线利益团体极进曲解之能事，你见过不要党政财文权的革命领导权吗？空中楼阁？



96. “一月夺权”后，张春桥在上海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对所有的权都要夺”，即所谓“全面夺权”。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在随后的尖锐冲突中不断表现出来。

搅屎与反搅屎——你不说那四个权，我还不知道要全面夺权

97.打倒陶铸，显示了文革小组陈、康、江等人在政治上握有超乎寻常的特殊权力。继陶铸之后，刘志坚，萧华等，也先后被林、江、陈等人打倒

并非是陈康江三人有什么特殊“权力”，而是深得群殴的要领：集团对抗，要逮住对方一个人，往死里打！最好是最霸道嚣张挑头的，像陶铸这样的硬骨头，打倒一个起到震慑作用！示范作用极佳！这种方法，同样适合少对多和多对多的群殴。

总结一下，从文革全面发动（66年8月）到全面夺权（67年1月），从撤离工作组到打倒陶铸，是文革无凯歌高奏的时期。

陶铸在文革爆发前夕，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委书记。“文革”爆发后，由邓提议，毛把他调到\*\*，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文革小组”顾问。陶因为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

奇怪的是，陶、刘这两个67年就被打倒的反动头头们，竟然没有族诛和连坐，罪魁祸首也硬是到了69年底，才咽气。对比一下扛过文革的老龟命，都活到了八九十岁。看来文革的迫害

## 怎样读史之文革史（四）

2015年5月26日 08:40 阅读 46 [新浪博客](#)

### 四

时间：67年2月——68年10月底

代表事件：大闹怀仁堂 二月逆流 三支两军 武汉七二〇百万雄师事件 王关戚被抓 杨余傅事件

98. “大闹京西宾馆”。1月19、20日，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军队开展“四大”。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保家卫国

弱小的无面对强大的资，是和平竞赛，还是主动进攻？道理同群殴



99.在2月11日的碰头会上，叶斥责康、陈和张: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100. “聂也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

聂帅锅，你介是此地无银，不打自招嘛!你咋不说说北京八一中学(荣臻学校)里面的红二代崽子们，在去年夏秋，干了啥黄四郎冒充张麻子的事情?师大附中的同伙都干了啥事?清华附中的?东揪，西揪，海揪，联动……资团队从中央到地方的接班人们都干了啥?周为啥特地安排贴身秘书指导你们崽子的活动?说说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不是时髦反思嘛，忏悔嘛，道歉嘛!“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神马?”

101. “会上，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作了措词尖锐的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抨击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这便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当措词尖锐的时候，往往是处于下风的时候;当能用力量解决对方时，是不需要废话的

102.2月16日晚，陈毅还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长篇讲话，猛烈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卑劣行径

周派工作组收拾聂元梓，是因为北大学生在校内搞大字报不避着留学生(留学生可以不走三角地嘛)，陈立马就对留学生发表长篇训话。介充分说明文革的必要，为啥“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03.2月19日凌晨，毛开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陈毅等人，强调文革不容否定。会上还决定陈、谭、徐“请假检讨”。2月25日至3月18日，政治局连续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批判谭等，周做检讨

文革是路线斗争，双方都是利益集团代言人

104.67年1月21日，毛作出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2月19日，毛要求军队分期分批对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军训。周发出“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决定

周确实是资先锋队的神级搅屎棍！针锋相对！你支一个，我改成三个，分散你力量；你军训，我就加个军管，限制你行动！

105.2月到6月，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各派之间互不相让，争夺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酿成大规模武斗，不少地方的武斗动用枪炮。毛后来把这种局面称为“全面内战”

革命教育了群众。群众在革命中学习，深刻体会到平时感觉模糊而又至关重要的东西！经济就是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发展是硬道理”，前者是无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后者是资的。“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富”只有在市场经济中被操了的“小资”，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经济屁股到底是小资还是苦逼？

106.7月20日，“百万雄师”一些人冲入武昌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打伤并强行带走王力。同时，武汉三镇数十万军民连续几天举行声讨谢、王的游行。这就是“冲击中央代表团住地”、“绑架中央代表”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斗争越激烈，分化越清楚，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苹果派，你是哪一派？

107.7月22日，文革小组组织数万人欢迎谢、王回京。25日，北京举行了欢迎谢、王归来，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江等将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撤职，把矛头指向徐向前、徐海东等

群殴中发现自己人被围困，一定第一时间营救！人数少的一方，往往可以通过对对方首脑的斩首行动，士气暴涨！

108.7月底至8月初，北京和外地的数千个造反派组织组成“揪刘(少奇)火线”，数十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上百只高音喇叭日夜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等人的口号，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邓、陶夫妇，肆意侮辱、抄家

擒贼擒王，斩首计划。我们看到的是无先锋队的清醒思路，斗争坚决！

109.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机关召开的大会上公然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并要求向下传达。由此，全国普遍发生冲砸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事

既然是无专政的国家，旧有的专政机构，必须接受检验。公检法保存了大量的黑档案，笤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

110.王力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外交部的运动阻力很大，不要把外交神秘化，红卫兵也能搞外交，外交部的三结合班子要“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造反派当场成立“夺权指挥部”，外交部政治部被砸，姬鹏飞、乔冠华等领导被关押。造反派以外交部监督小组名义向驻外机构发号施令。

输出革命吧！

111.8月22日，因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拘捕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并封闭香港《文汇报》等报纸，在北京发生了数万人围困英国代办处，焚烧办公楼，批斗英国代办的严重涉外事件。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空前损害。

保护老板的优良声誉，不要也罢！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那么在意老板的意见，为嘛？

112.8月底和68年1月，文革小组主力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抓。

王、关被“请假检讨”，“休假式治疗”，据说跟“揪出军内一小撮”有关。这件事情上，林集团与文革小组存在严重分歧。也就是说，林代表的利益集团，屁股并不是无。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强力反击。周伺机而动，顺水推舟搞掉对手。

113.10月17日，中共\*\*、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

陶铸生前没实现的，死后由周实现。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联想起“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外侨。

114.67年底至68年初，上海市某些群众组织相继贴出怀疑和批判江、张。68年2月，外交部91名司局级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揭露批判煽动打倒陈毅的极左人物，要求陈毅回部工作。2月底，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会，提出要拥护聂荣臻

资的内部争斗先放下，模糊的认识渐趋一致：无要是起来了，就都完了！要反夺权！左左右右的吵来骂去，本来就是一家嘛！

115.《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的一段话：“无文革，实质上是在社条件下，无反对资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和资阶级斗争的继续。

面对资阵线在各地掀起的“右倾翻案风”，文革小组予以坚决回击：反“右倾翻案风”！

116.3月下旬，在北京发生了军队领导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林彪宣称：杨成武犯有“山头主义、两面派”的错误，并同余、傅二人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傅崇碧率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

杨的遭遇说明什么？革命中的骑墙派，随波逐流的可怜虫，想不站队，左右逢源，捅蘸的，必然被操！妄想田园生活的“小资”，当斗争来了后，你的有机蔬菜和粮食，又是为谁准备的？

117.10月，对派性大张旗鼓的批判，是定性造反派普遍犯了错误，在肯定他们“造”、“夺权”的前提下，对他们转而采取“批评、帮助”的态度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当敌人表扬你的时候，要提高警惕！根据教育、解放干部的意见，中央和各地分期分批举办干部学习班，一批干部由此解脱出来，恢复了工作。

周在文革的前中后三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干的就是捞同伙，抓组织！

现代河蟹的老板先锋队——各级官员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干的也是培养接班人，抓组织！

118.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职务，同时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原军委常委会及其所属机构停止工作，军委办事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黄永胜取代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斗争形势急剧变化时，临时设置的组的权力，大于受到冲击停止工作的常设机构

119.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苹果派，亚历山大派……你是哪一派？

当时有很多逍遥派，文革没有触及到这部分人。被斗争推到风头浪尖的，能逍遥吗？杨成武因为骑墙不站队，周和林做出了同样的利益判断：先干掉丫再说！于是周“推荐”杨负责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十个案件有一多半跟老军头有关，接了烫手山芋后杨左右为难，不久就因为“两面派”搞倒，换上一边倒的黄永胜

120.黄永胜接替杨担任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负责 10 案：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叶向真案，汪金祥案，解方案，贺龙案，四三案，无线电案，刘志坚案

问：审案要断清吗？答：不必！把鸟捏在手里，是活是死？大宅门里的白景琦用官司把阿胶业务的竞争对手困在监狱里，西门庆靠买卖词讼搞蒋太医。

总结一下：

1.67年2月到68年10月底这段时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向深入的阶段，从全面夺权，到“揪出军内一小撮”。斗争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无路线的闯将以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在了斗争一线，已经为无的阶级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各地造反派骨干67-69年三年内多次脱离原先工厂到北京参加培训，表面上集中了无先锋队的骨干，实际上骨干回去后纷纷被调离原厂，失去了团结和斗争的基础。无的先锋队，只能是在剧烈的阶级对抗中锻造出来，只能靠在生产一线与工友们一起开展诉苦教育，开展生动的实地斗争才可能产生；脱离了生产一线，坐在书斋里，坐在河蟹大腿上的御用文人，奉旨“革命”，都不可能是代表无利益的先锋队。

2.远到59年斗倒的彭德怀，近到67年的刘少奇，在地方省会城市几乎都有“保彭”，“保刘”的“革命”群众。“群众”之间搞起了斗争，斗争教育了群众——你是哪一派？你的利益由谁代表？

无当时的力量集中在上海等大城市、省会城市，和厂矿铁路枢纽；中小城市，县城，由于资生产关系不发达，资无的对抗也显的不激烈；相比而言，广大农村反而是灰常“平静”，公有制经济基础下的集团劳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小生产，小作坊，小工业大量产生，大寨，红旗渠就是代表。小生产是滋生资的土壤。

文革如此，河蟹如此。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

3.斗争初期迷糊混乱的阶级阵线，随着斗争深入，阵线变的越发清晰。红二代在初期两线开战：一方面斗高级知识分子，一方面打压革命群众。随着斗争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红二代迅速与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结成统一阵线。资内部所谓的好坏，正义邪恶，左左右右，对无来讲都是一回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资内部的分歧，比如好老板和坏老板，老虎和苍蝇，廉洁和腐败，砖家和良心，尊孔和反孔，转基因和反转……当面对无的力量时，任何分歧都可以放下，步调一致，全体调转枪头，坚决对无实施镇压。左左右右们，本来就是一家。

资们在文革中结成了血海情谊。第一批倒掉的资先锋队员们才会这文革后，迅速的把地富反坏右等阶级同盟启用。修正已经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生产资料私有，劳动力自由流动，杀出一条发展资经济的血路！

## 怎样读史之文革史（五）

2015年5月26日 08:41 阅读 36 [新浪博客](#)

## 五

时间：67年2月——69年4月底

代表事件：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革委会 九大

121.#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66年5月文革开始后，校内开展大规模辩论和贴大字报运动。刘、邓决定派工作组进驻。6月8日，新北京市委派出周赤萍到清华大学，宣布次日工作组将接管清华大学，校党委停止工作。13日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在会上宣布，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工作组代行学校党委职权

北大清华这两所学校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在各种回忆录，忏悔录，牛棚杂忆里面提到。不如看看公开刊行的河蟹党史中怎么写

122.#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该工作组由刘亲自过问，其夫人王光美于6月21日以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名义加入该工作组并成为中坚力量。该工作组将从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到各班主任、政治辅导员、教师等103名清华干部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黑帮分子、黑帮爪牙，残酷批斗。

和刘睡一张床的夫人王光美亲自指导清华工作组，这件事情具有代表性，代表了刘邓\*\*在全国各院校派出工作组的目的——高干整高知。老革命干部出面，整理高校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

这种举动，说明资先锋队在文革开始时，对斗争的认识依然停留在57年反右的水平，认为影响自己执政的是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123.#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工作组同时对清华造反学生进行严厉的批判打击。工程化学系902班蒯大富等激进造反学生逐步开始激烈反抗。66年6月，蒯提出“炮轰工作组”、要求夺权，宣称工作组同党委一样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工作组滚出去”

高干一手打压高知，一手打压工农。这一招在57年反右刘已经用过了。刘教主不应该忘记：对圣斗士不能使用同样的招数

124.#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工作组迅速对蒯大富进行批判，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将50多人打成“蒯氏人物”，打击近500人，发生数起自杀事件，两人死亡。7月，毛回京，斥责工作组做法，要求周亲自过问。21日，陈伯达派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宣布撤销。



资无的对立普遍存在，才有工作组对蒯大富的专政；在斗争的风头浪尖，老毛没有选择坐视不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亲自解放被资打压的无的先锋队队员。

125.#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清华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最初多由高干子女主导。8月9日，贺鹏飞(贺龙子)、刘涛(刘少奇女)、刘菊芬(刘宁一女)成立串联会，批黑帮、不批工作组，即“八九”派，8月19日组成了“清华大学红卫兵”

高干工作组走了，高干子弟还在。子承父业，可算是家教做的好

126.#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66年底，兵团在其《井冈山》报上发表清华学生刘涛(刘少奇女儿)的长篇检查，揭露刘、王镇压文革的内情。67年3月至9月，井冈山兵团组织或参加了4月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夺军权斗争)、7月下旬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7月29日对徐向前的抄家、8月1日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8月22日冲击英国代办处等运动

刘涛是刘少奇前妻生的女儿，王光美是继母。俺们不能就此认定是家庭不和导致母女反目。刘涛能够从师大女附中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说明家里对她的照顾和其他子女一样。

子女贴父母的大字报，长期以来作为文革扭曲人性的一项罪行被控诉。实际上，俺们抛开虚伪的人性，从阶级利益角度来看就会很清楚：父母在明知自保无望的情况下，留下子女作为接班人，以后仍然有翻身的机会。于是由子女出面写批判父母的材料，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

同样的方法，在《风声》里面两个被抓的地下党之间使用过，在《啊！海军！》空军大队长平田一郎把活的机会留过他的学员们时使用过，在刘整彭的时候彭的亲属使用过，在文革中刘自己家的子女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都从自发上升到了自觉，明白自己属于哪个阶级，并自觉为本阶级利益服务。

工友不妨问下自己：你属于哪个利益团体，你是自发还是自觉为本阶级利益服务？

127.#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66年下半年到68年年中，在此期间，学校学生在各类文革活动挤占下几乎没有正常学习时间。兵团优先招收贫下中农子女，以推荐为主，不招收五类学生：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镇压者，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屡教不改者或有反动言行者，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

逍遥派、书呆子就是化学反应中的惰性元素，就是维稳的砂子，不参加反应。这样的人群也普遍存在，在中小城市，乡县里面占很大比例。



128.#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是指 68 年 4 月至 7 月，清华大学红卫兵两派间所发生的大武斗，是北京最为严重的武斗事件，动用各种土制武器装备，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等进行抢夺。共致 18 人死亡，1100 多人受伤，30 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余万元

斗殴三个月，每月死六个，这就最严重？群殴随机吧。

拿所谓的耸人听闻的“百日大武斗”与河蟹时代司空见惯的富士康“十八连跳”事件对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俺们除了见到郭老板“除了道歉还是道歉”，工友的血作为改革的必要代价白流了，没见有啥改变！该上坟上坟（俺们管上工叫上坟），该死人死人！

129.从 67 年上海“一月夺权”到 68 年下半年，是“文革”发动以后党、国家和军队处于最混乱、最艰难状态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领导干部或被解除职务，或被下放管制，或被关进监狱

庆父不除，鲁难不已。挪开上百个省部级庆父，依然前仆后继说明啥？路线斗争并不偶然，存在广泛的经济基础。远的有支持 59 年打倒的彭德怀派，近的有支持刚靠边站的刘少奇派，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亚历山大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你是哪一派？

现在不是吗？工友里面有老黄牛派，有混日子派，有搅屎棍派，有逍遥派，有跪舔派……你又是哪一派

130.如果不知道先阶级，后左右，就会被人民，中国人，成功人士，慈善家，雷锋，红卫兵这些词所迷惑；如果不会带入自己到历史情景中站队，只是抱着票友和听书的心态寻艳猎奇，就会弱智的认为历史中那些人是傻叉。其实傻的是他自己！

你属于哪个利益团体，你是自发还是自觉为阶级利益服务？

131.67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2306 亿元，比 66 年下降 9.6%。68 年只相当于 66 年的 86.59%。70 年我国经济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原定该年度的主要指标

不是控诉文革天下大乱嘛！咋滴还超额完成计划呢？罢工是无的假日，是资的末日。并不需要托猪鼓吹的合法罢工权。

132.到 68 年 9 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 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成立，填补了国家和地方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

键盘政治局的左右们：革委会是靠设计出来的吗？政府就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对工具不满意就斗呗！设计轮值的嘟嘟，还欠俺庆功酒呢

133.革命委员会: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于是革委会里,各占 1/3,而且老中青三结合。请问这是肿么设计出来滴?不是斗争出来的吗?民主柿油粉们,肯定说这不科学,应该一人一票选。那斗争的时候,你逍遥哪里去啦?斗完了你想摘果子?没门。

134.国务院各部委精简后,保留人员最多的也只占原来人数的 40%多一点,最少的则只有 7.8%;大多数省级革委会刚成立时,都只设政工、生产、办事和保卫四大组,全部工作人员只有 150 至 200 人,为原有人员的 1/20 或 1/30

可见所谓管理,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砍掉 99%以上的经理老板和官员,不影响完成经济发展计划。

老板之所以保留甚至鼓励发展很大一部分小业主,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断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援手,特别是在鼓吹“劳资合作”的现代骗局上。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拿破仑第三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件由工厂主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工人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工友不妨对照一下河蟹的三十多年历史,俺们几乎可以一字不差的照搬上文——“从河蟹资产阶级革命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土地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承包给农民,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 DXP 南巡后推动股市和发行企业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件由大地产商出面把城市住宅卖给自己的主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主人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135.刘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是“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而奔走呼号”;刘在对资工商业改造中“坚持放任资发展的反动政策”,“使资本家继续掌握企业的领导大权”;“三自一包”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自由泛滥;刘“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复辟资。”

“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

136.刘鼓吹“流通决定生产”，反对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社计划经济，是从流通领域破坏社建设；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搞资复辟的宣言书”等等。认定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

“他们都力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因素“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

137.17 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学术“权威”相勾结，“篡夺了文化界的领导权”，“在文化领域中，向无实行反革命的资专政”，等等。这些都成为召开九大的政治思想准备的一个重要部分

斗争从来都是反复的。关峰，王力，戚本禹“被休假治疗”，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遭到清算——这是低谷；文革小组抓舆论批刘的反动路线是深入教育群众的妙招儿——这是高潮，然而文革小组放松了在省市县乡革委会里进一步建立基层先锋队组织，任由基层组织依然由资的代表盘踞，因而埋下了日后覆灭的隐患——这又是低谷。

138.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于 68 年 10 月中下旬在京举行。原八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文革初期打倒的占总数的 52.7%，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八大选出的中委员总数为 97 人，到会者只有 40 人，不足半数。开会时决定从被允许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增补 10 人为中央委员，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

斗争的成果需要事后的程序进行追认，就叫做“合法化”。而不是先想着修改法律，争取什么鬼“罢工三权”力，再去抄家伙干。

所谓“法不责众”的意思是：法是对力量的追认。当人数变多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于是法依照新的力量对比，追认这种“众力”为“合法”

139.被扩大吸收参加这次会议的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 74 人，占出席会议人员总数的 55% 以上

就像火山熔岩喷发冲出地面，冷凝后形成的岩浆岩一样，力量对比决定用什么样的政权政体来调和阶级矛盾。爱不爱国，不妨先问问，国是谁的。孔老二认为国是淫民的，可这个淫民又是一大筐菜：小业主，小老板，小资……

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揭过他们虚伪的面具了，清晰的帮他们总结了自己躲躲闪闪、缠杂不清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方面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旨在保证市场经济“最佳经

济效益”的“铁的规律”，即依靠饥饿纪律保证资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基本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又安抚工人，等待着将由他们为其找出一些手段和办法（孔老二就说农民工要拥护政府相信 D，因为讨薪最后还要由政府出面搞垫！），诸如说服富人兴办慈善事业，大家努力把 G N P 的蛋糕做大点以产生“涓流滴下”的效应，以及由国家出面用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建立一套临时救济工人的社会保险制度（比如首富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红十字会），等等，来把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福利“提高到有产者的水平”，“使一切雇佣工人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140. 全会批准关于刘问题的“审查”报告，即\*\*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期间，毛制止了林、江等开除邓党籍的图谋。闭幕式上，毛发表讲话，提出九大应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等

在林、周同踩刹车的情况下，毛也只好拽住了江的步伐

141. 69年4月1日至24日，九大在北京举行。1512名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预备会期间，毛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一人一票叫正常吗？为啥监狱不一人一票，决定谁来管怎么管？

142.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当选为九大主席团主席，林当选为副主席，周为秘书长。

一般情况，五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次八大是56年开的，中间隔了13年，开了12次会议。九大召开，是十年文革第一阶段的里程碑，将对两年来的斗争予以制度法规追认，赋予合法性

143. “无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革”的总的指导思想。它的核心在于认为在无夺取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林宣读政治报告

对比看一下辛亥革命前后，就知道为啥辛亥革命算不上革命；毛都没变？！

144. 草案删去了八大党章的一些正确内容，把“无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现代化建设，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加上“林同志是毛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不知为啥右右柿油党们极其不满这条，独裁啦，专制啦。请问，宗庆后霍启刚的接班人是票选吗

145.讨论中充满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革”的高度颂扬。各组还结合文件内容，大搞“斗私批修”，对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批判和攻击，迫使他们作检讨。4月14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河蟹的控诉中，“斗私批修”是指向普通人，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文革中是对走资派的专政手段

146.在4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选出委员170名，候补委员109名。在新当选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原八届委员和候补委员占19%，仅为原八届委员会总人数的29%。在选举中，有的代表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

辛亥革命可以比吗？清朝大吏90%成了民国大员，是革命吗

147.九届一中全会，委员会主席毛，副主席林。政治局常委会5人毛、林，(姓氏笔画)陈、周、康。政治局委员21人:毛、林，(姓氏笔画)叶群、叶、刘伯承、江、朱、许世友、陈、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姚、康、黄、董必武、谢。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148.九大委员会中的力量对比。一共25人，其中无6:毛，康(1975.12)，江，张春桥、姚、谢富治(1972.3)资9:周，叶，朱，许世友，陈毅(1972.1)，陈锡联，李先念，李雪峰、李德生。军6:林，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修正2:纪登奎，汪东兴。无害占位2:刘伯承，董必武。

149.许世友，陈锡联，李雪峰、李德生，四个军区司令员，都在文革期间被周力挺，又分别成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负责各省制止武斗、维护工农业生产秩序。李先念在“文革”后期，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

周对资有重生再造的大德

150.九大政治局通过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中央军委主席；林、刘伯承、陈、徐、聂、叶任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八人为成员。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也停止活动。

151.九大之后，文革小组实际上也停止活动

河蟹在党史中自己打自己的脸：先说十年浩劫，后说 69 年就停止活动。先说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后说三五计划各项指标超额完成。先说几百名省部级干部被打倒，十年中受尽迫害，后说老龟命们寿终正寝于二十一世纪，享年百八十岁，原来迫害就是去“三高”呀？

152.66 年斗争开始，参与各方认识模糊，阶级阵线犬牙交错；九大后清晰的利益格局形成，事实上文革已结束。

此时资方依然占据上风，从\*\*到地方，从革委会到军队，资利益代言人星罗棋布。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无先锋队放弃了寻找战机，没有积极训练厂矿先锋队，准备再次权力争夺，而是展开和平竞赛，这个内因在中苏冲突的外因作用下，资无力量悬殊到文革中后期快速拉大。

总结一下 66 年 5 月 16 日到 69 年 4 月 24 日九大结束，事实上的文革也已经结束。

在初期的混战中，资先锋队由于认识不清楚，误伤同盟——地富反坏右派，高知；当倒台的资先锋队队员与斗争初期被他们整倒的同盟关在同一个牛棚劳动时，才猛然发现：虽然这些家伙出身反动，没落贵族，酸文假醋，可其实和自己是一伙的？！虽然这家伙出身丘八，趾高气昂，可同自己是一道的？！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于是双方在文革中结成血海情谊，秣兵厉马，枕戈待旦，日思夜想，等待变天！

总有人拿“八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文革初期打倒的超过总数的一半”说事，意思是迫害、是残酷。不如调查一下，是不是几乎所有单位十年内的员工流失率都超过一半？！尼玛前者是迫害、是残酷，后者就是自由选择吗？！

工友就是战友，苦逼就是利益集团。

苦逼做事，经常先想的是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有这样的想法，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利益集团成员；

这一点上，苦逼要向老板学习：

老板做事，从来都是先想有利没利。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于是苦逼在工厂里结成血海情谊，

秣兵厉马，枕戈待旦，日夜谋划，改天换日！



河蟹的党史承认：九大之后，文革小组实际上也停止活动。

无的先锋队没能深入革命原因有三个。第一，无力量的事实削弱。斗争初期倚重的林集团，与文革小组分道扬镳，由九大前的秘密走向九大后的公开。第二，资力量空前团结。如果说文革初期，资由于认识不清，误伤友军的话，九大已经给所有的资先锋队员敲响了警钟：不夺回权力，就会被无镇压。第三，中苏对抗的外部环境，国内的阶级斗争被压下。

## 怎样读史之文革史（六）

2015年5月27日 00:03 阅读 39 [新浪博客](#)

### 六

时间：68年5月——70年10月底

代表事件：中苏对抗 刘邓陶 五一六 上山下乡 五七干校

中 1.68年8月，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69年3月上中旬，苏联边防部队两次入侵中国黑龙江省东部珍宝岛地区，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因苏军入侵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在此背景下，新中国掀起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

中 2.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发出战争威胁，甚至进行核恐吓。毛在国庆20周年口号送审稿中加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9月中苏双方同意维持边界现状、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避免武装冲突。

中 3.10月17日，中苏边界谈判前三天，因“紧急备战”转移至苏州的林，给在北京的黄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次日，黄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向全军下令

匈奴的冒顿单于，他当太子的时候想要做掉老爹，也是同样的方法：先是鸣镝射宝马、爱妻、爹滴的马，部下无一不从，最后就是爹滴！

私有制下，即便是亲如父子兄弟夫妻，也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现在不是吗？子女是父母的私产，子女不打工挣钱，父母都不干，一定要逼着去上坟。结婚、离婚、子女抚养权、婚前财产公证，不都是财产关系吗？看到 CCAV 大张旗鼓的表彰全国三百多名孝心楷模就知道，孔老二吃人的时代绵延几千年一直在身边。

河蟹一方面宣传正能量，忠孝仁义，难以否认的是当下的婚姻制度，就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河蟹治下，专偶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

中 4.大规模的战备，一方面，战备的坚决措施，对于抑制武斗、平息动乱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紧张的气氛又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 1970 年上半年各行各业正在进行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就算不备战，势力之间的冲突和势力内部的整顿，都一样会进行。

中 5.69 年底，原来的许多领导人，刘、邓、陶等这些已经被“打倒”了的，包括虽已在群众中点名批判但还不算是被“打倒”的，都被紧急地分别疏散到外地，从而被完全排除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

邓去了江西新建县（省会南昌现在的新城区，可见也不算偏僻）拖拉机厂，开始踩后来的邓小平小道

中 6.刘被“残酷迫害”时，身边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和一年轻的厨师。从 68 年 2 月到 1969 年 10 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68 年 7 月至 1969 年 8 月期间，专家会诊共 40 次，所用药物为特供进口药

这就是“残酷迫害”吗？

中 7.69 年 10 月，刘疏散到河南开封政府办公楼（当时开封市唯一有暖气的地方，高安全，本来是金库）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护送。刘已完全不能自理，11 月 14 日死前的二三十天里，24 小时有人看护，每半小时记录鼻饲，大小便，呼气的次数、心跳频率、血压等

中 8.陶在 68 年被检查出胰腺癌，由中央安排，二零一医院牵头集合全国多名主任医生为陶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69 年十月中旬疏散到安徽省会合肥市，11 月 30 日死

这也是“残酷迫害”吗？

中 9.九大前后到 1970 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前的各项政治活动，基本都包括在“斗、批、改”这个总任务之中。毛亲自抓了“六厂二校”的典型，北京的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北郊木材厂、化工三厂、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以及北大、清华。毛派中央警卫部队 8341 部队进驻这些工厂和学校。

中 10.“六厂二校”经验提出“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的概念，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提出“一批二用”的政策，改善被称为“反动权威”的专家们的境遇；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政策”、“给出路”

文件下达执行时，会依基层各派的力量对比各取所需。结果是对无不利—很多先锋队员就是这时被调离投闲置散。九大后，文革小组停止了活动，然而周叶林陈并没有停止，一天都没停止反攻倒算，一天都没停止破坏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中 11.70 年 3 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这场自 67 年下半年以来的运动，一直到文革结束也没正式宣布结束

五一六是个筐，各方都把对方往里装。类似明末的妖书案，谁力量占上风，就可以大量搞对方。这个五一六清楚通知的来历不可考，从受益分析看，周代表的资是最大受益方

中 12.“清理阶级队伍”当时认为这是为了建立一支“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从而“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清理之初，其对象一方面是所谓“走资派”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另一方面则是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

谁是坏人？那要看站的立场。文革初期，陈小鲁们由于认识模糊，率领红二代，“误伤”了阶级兄弟——高知，地富反坏右。当他们被打掉，下放在同一个地方改造的时候，才结成血海深情。改开后结成利益集团，对无进行疯狂反扑。

道歉，不过体现了资自己内部的民主；对无，绝对是毫不动摇的专政！

中 13.70 年 2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分别召开全军和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至 71 年，在基层组织恢复的基础上，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省级党的委员会。整党重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遏制造反派势力，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周搅屎功不可没，在基层与造反派争夺领导权。

中 14.“教育革命”在毛看来，首先“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于是，各类城镇学校普遍实行工(军)宣队、革命师生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以

工(军)宣队负责人为核心建立各级党组织；农村中、小学则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组)。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校长和教师从来就没有起过主导作用。意识形态，科教文卫，上层建筑，都由经济屁股决定。学校注定了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就是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中 15.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8 年 12 月，毛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难，青年失去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

劳动力被计划和商品流通受阻，资最受不了。

中 16. “五七”干校。干部下放首先是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革委会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的需要

削减 95%的管理人员，地球没有不转。

中 17.除少数大、中城市将一些干部下放到工厂外，多数地区的多数干部被下放到农村。与此同时，大批高等学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被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70 年 12 月至次年 1 月，“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召开，认为“五七”干校对于促进机关革命化，加速“斗、批、改”有深远意义，必须长期办下去

中 18.71 年 8 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毛的无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专了无的政”；大多数教师 and 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的”

中 19.文革开始后，高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根据毛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70 年 6 月，党中央决定进行试点恢复招生，废除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

文革中无才夺回来，学校开始培养无的接班人，为无服务。

中 20. “四五纲要”总要求：“四五”期间要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带来资无关系的新问题。文革初期无先锋队是靠宣传文教打开缺口，中期在生产斗争中失去了根基。

中 21.67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2306 亿元，比 66 年下降 9.6%。68 年只相当于 66 年的 86.59%。70 年我国经济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原定该年度的主要指标

?? 不是控诉文革天下大乱嘛！咋滴还超额完成计划呢？罢工是无的假日，是资的末日。并不需要托猪鼓吹的合法罢工权

中 22.70 年我国经济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原定该年度的主要指标

生产力指标，涨不涨工资，重轻农还是农轻重，这些经济斗争从建国后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重大的政治任务。经济，就是政治。

中 23.#一起读党史# 根据“四五”计划,1970 年计划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发展“五小”工业,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着手进行建立经济协作区的试点工作;搞好企业下放,争取在年内完成

“五小”工业指地县两级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和小水泥厂,是改开后乡镇企业的前身

中 24.69 年 8 月，首钢向武汉重庆包头等钢铁公司发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各行各业纷纷响应.这被《人民日报》宣传为“大跃进的先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的信号”。此后，钢铁会战,汽车会战和拖拉机会战在各省展开.到 70 年底,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均称已能“成批生产”汽车

在资看来是缺乏计划,是混乱和损失。

中 25.#一起读党史# 资认为:重工业生产增长过快,农、轻和非生产性建设积累过少;内地建设挤占大量资金,布局分散,管理混乱,挤占发达地区资源;片面强调“自成体系”的建设,阻碍了各地"相对优势";产品质量下降,造成浪费和损失;职工人数增长过快,出现工业、基建与农业争劳动力,给国家财政支出和市场供应增加了负担

相对优势，庸俗经济神教的药方。周从建国以来，就是“爬行哲学”的坚定代表。认为经济发展顺序应该是农轻重，中国农业有劳动力优势啊，应该出口换外汇啊！尼玛没有重工业，怎么农业现代化？没有机械取代人力，没有化肥育种，怎么高产稳产？

寄希望于国际市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只是纯经济路线吗？不是，是政治。以城市吃粮人口多为由，削减一半国企工人，就是为了削弱无的力量。培养小农经济，小生产来瓦

解公社，就是壮大资的力量。城里的工人难道是白吃饭的吗？造的农业机械不是加快农业建设吗？

周打上半场，邓打下半场，都是资的带头人。

中 26.71 年底,绝大部分经济指标都完成.同时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工资支出突破 300 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 800 亿斤,大大超出预定的计划.随之而来出现了货币发行量的突破.周指出:“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

周是庸俗经济学的拥趸,削足适履给经济大脚穿货币小鞋。

中 27.70 年 3 月初《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截至 9 月底,工交部门直属的 3082 个企事业单位,已下放 2237 个,占总数 73%,撤销的有 104 个

对照现在的央企,就知道当时资是多么不愿意下放,就明白横加指责的原因了。

中 28.三线建设出现了 65 年以来的新高潮.69 年 3 月,连接中南、西南的铁路干线--由湖北襄樊到重庆的襄渝铁路动工兴建.9 月,二汽在湖北十堰市开工.11 月,河南焦作至广西柳州的焦柳铁路动工.70 年 7 月,纵贯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成昆铁路通车.72 年 4 月,甘肃西北铝加工厂建成.11 月,株洲至贵阳的湘黔铁路通车

这个靠小农小生产积累，没有重工业，猴年马月才能搞出来？

中 29.三线建设的工人、干部、科技人员、解放军和民工排除万难,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在短期内初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三线建设,较大规模地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布局,改变了三线地区比较落后的面,为以后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

根据庸俗经济学的相对优势理论，那西部就应该穷，提供劳动力，东部就应该富，提供资本机器，这样就可以发挥“相对优势”喽！背后是劳动力商品的流动和市场的壮大，这就是资打的算盘，可惜在那十年，完全行不通，资能不捉急吗？

中 30.67 年至 68 年间,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工分挂帅”一些地区减少或取消了自留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大寨大队,被树立为“继续革命”的典型.阶级斗争扩大化、“穷过渡”及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经验成为全国农村的榜样

没有物质刺激？！那还咋先富带后富呀？

根据统计，全国 1/3 的公社发展迅猛，1/3 的公社发展缓慢，1/3 的公社发展落后，资的办法是想方设法扩大后 1/3 的比例，瓦解公有制基础，无也办法是依靠基层先锋队力量，带动前 2/3 的公社发展。

以改开第一村“小岗村”为例，小岗村大包干的第一年收获粮食 13.3 万斤相当于其以前 15 年的总和，俺真的很惊诧和惊叹：15 年年均亩产才 17 斤？！——这简直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奇葩案例！然而资专政下，就可以把这样的落后典型捧为致富圭臬，发家典型！

中 31.70 年 8-10 月,国务院在大寨、北京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以“农业学大寨”为号召,但实际上却对大寨的做法限制和否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会议强调,关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社员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反对平均工分;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灵活种植

有没有看到资代理人搅屎的影子？

中 32.三线建设,使地方建设获得较多的自主权.为支援地方“五小”工业,上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地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设备:70 年,上海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为各地制造 100 多套小化肥厂的关键设备.各省、市工业部门,以及各工业部门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为地方工业生产了大量设备

竟然划拨而不是买卖?!OOXX

中 33.文革对城市经济影响较大,给社队企业的产品销售带来拾遗补缺的机遇.社队企业出现了又一次发展高潮。这在沿海一些地区尤其明显.70 年全国社队工业产值为 67.6 亿元,是 1965 年 29.3 亿元的 2.3 倍.不少社队用办企业所得利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支持了农业的发展

利润竟然不归老板,而是投入到集体经济中?!OOXX

生产力大幅提高后，势必产生小生产，小业主，小资意识就会抬头，就会寻找利益代言人。无的基层先锋队，需要保持清醒，坚决的与这种意识做斗争，才能够巩固公有制经济基础。

中 34.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增收,培养了一批生产经营人才,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为 80 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一些地区的“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也存在着诸如消耗大、成本高、原料缺少来源、一些产品没有销路、新增职工过多等问题

尼玛带着放大镜找的吧！周耿耿于怀的是“新增职工过多”，这周眼里，知识分子是需要促膝谈心照顾的，工人就是吃闲饭的。改造知识分子是需要和风细雨，下岗工人就雷厉风行。



中 35.垄断和自由竞争，是资本的一体两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只是资本的不同形式，好老板坏老板是一个藤上的瓜。哭爹喊娘的中小老板是大老板的外围。对于良心关注是左老板还是右老板，好老板还是坏老板，大老板还是小老板多分了肉，俺们兴趣阙付，搬马扎围观。怎么夺回被占有的剩余价值，搞掉所有黄四郎，才是俺们关心的

中 36.中国有：草领阶层、木领阶层、铁领阶层、铅领阶层、锌领阶层、铝领阶层、铜领阶层、锡领阶层、银领阶层、金领阶层、白金阶层、钻石阶层等 12 个阶层……一句话，只要不提人的社会性，不提资无阶级对立，就需要把人的自然性阶层化，15 个阶层不够，还可以搞 50 个，100 个沙粒级阶层，甚至 14 亿个纳米级阶层！

## 怎样读史之文革史（七）

2015 年 5 月 27 日 00:04 阅读 41 [新浪博客](#)

### 七

班车苦逼眼中的庐山会议，三中全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极左和极右

时间：70 年 11 月——71 年 2 月底

代表事件：庐山会议 批陈整风 黄吴李邱 国家安全委员会 三中全会

中 37.#一起读党史# 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阴谋手段,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破产后,林彪等人乘飞机外逃,机毁人亡.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套用一下：邓叶河蟹集团采取阴谋手段,篡夺最高权力成功.逆取顺守,改开后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黄赌毒腐主观上都是发展生产力,客观上宣告资成功夺权，巩固了老板专政苦逼。

中 38.#一起读党史# 九大以来林彪集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是文革破坏党的基本原则的产物.文革初期,由林彪、叶群出面,以“高举红旗”、“突出政治”、“反罗(瑞卿)有功”为理由,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从受冲击中保了下来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文革,林不会成为二号人物.黄吴李邱从受冲击中保了下来,世上没有无缘故的爱。

中 39.67 年五一三事件后,又由林出面,并借助于文革小组的支持,使黄吴李邱压垮了反对他们的另一派,得以掌握全军的运动.在 9 月下旬成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中,吴法宪为副组长,叶、



邱、李均为成员。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改组和重新成立了以黄为组长,吴为副组长,叶、李、邱等人为组员的军委办事组。

办事组能量巨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河蟹在极力强化资专政的国家机器。敌人越疯狂,说明离他们倒台越近!

中 40.办事组下设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同年9月,继吴 67 年底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李、邱也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同月,在一次研究战备工作的会议上,林向黄等人宣布: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

从黄吴李邱成长日记看,一没有联名争取组阁权,二没有上街跪舔关注转发。

中 41.在文革的前一阶段,江林需要相互勾结和支持.没有林的支持,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没有江的捧场和沟通,林也难于扮演“副统帅”、“紧跟”、“照办”的角色.两个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私下攻讦已时有发生

毛粉,孔粉常引毛的话:政治不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吗?毛八大的时候,政治局委员 26 人,只有康生一个战友;九大时,才又掺了 4 个进来。无始终处于弱势,毛始终是少数派,那为啥反对多多的刘邓资路线呢?

力量弱小的时候,更应该斗!稳定,在文革前是刘周邓叶需要的,在改开后是历届河蟹需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专政机器,政治宣传加强中国梦,都是为了稳定。稳定的基础是生产,因此一线厂区就是赤裸裸的资无对抗的战场。

中 42.69 年 9 月,林在江西视察时提出: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现在就要注意.他还进一步说:据我看,上海就是小资产阶级掌权.林等人担心张春桥有可能成为“接班人”,而张等则最担心军队不在自己手上

无,资心里都雪亮:小资怎么可能夺权。可是林又说小资可以夺权,是什么意思?是林在喊话,期待着听懂的人站队.就像赵高指鹿为马一样。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个含话听懂了吗?其实苦逼和老板心里都雪亮:如果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就能创造剩余价值,那还要苦逼干嘛?是大资在喊话,老板们,经理监工们,砖家叫兽们继续嗨皮吧!一定要坚持走资本主义路线不动摇这个最大的政治,继续深入发展市场经济。

中 43.九大以前,由于与江等人积怨渐深,陈伯达转而靠向林等人.九大以后,林陈的关系更加密切.九届二中全会的临近,两个集团的斗争愈来愈尖锐和表面化了。

从公布的五七一纲领来看,林团伙是有一套经济纲领的,这个经济发展纲领与无和资都不同.从 67 年 3 月林立果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开始,就已经在培植班底了。

有人问,无的力量在九大前后分化,是不是革到自己头上就怂了?

无路线在\*\*的代表文革小组,和资路线在军队的代表林彪团伙,本来利益就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度过一段蜜月期,是资的先锋队“误伤友军”。

资在党政里面的先锋队,在大专院校里将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高知和中下层革命群众;林团伙基于本集团的利益,为了巩固副主席地位,夺权,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政军里面与自己利益不一致的资。

不久,斗人的高干和被斗的高知都被解除职务,剥夺权力,到同一个地方劳动改造。“全面夺权”、“揪出军内一小撮”,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化,此时资的先锋队才幡然醒悟:周叶刘邓陶资、林资、高知,尽管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是斗争把他们赶到一起,在斗争中结成血海情谊。

力量分化,正说明斗争的彻底性。林集团的暴露,不是文革的失败,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胜利!

中 44.70 年 2 月,政治局在讨论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提出,新宪法中应设国家主席一章,并由毛任国家主席.毛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从 69 年 10 月林副主席第一号令起,到这次设不设主席,都是鸣镝为令。设不设,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站队听话。

中 45.但是,林仍然坚持己见.在 4 月 11 日向政治局提出的意见被毛否定后,他便在小圈子里散布设国家主席的主张.5 月上旬,林让黄永胜带话给吴法宪与李作鹏,在修改宪法时,要坚持在宪法草案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中旬.林在与吴谈话时强调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个头;并要吴在宪法修改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斗争日趋激烈,林集团的先锋队员被斗争推到前沿,必须上!

中 46.70 年 8 月 13 日,在康生召集的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林集团与江集团之间爆发了关于“三个副词”的争论.张春桥说,应把毛思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中的三个副词删去.吴法宪予以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思想"。

中 47.8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吴再次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思想”,并与康生发生了争执.吴的这些做法,得到叶群的鼓励.同时,林、叶还布置人员和陈伯达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称“天才”的语录。

中 48.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会上,事先未曾表示要发言的林突然要求首先发言.重申:“毛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中 49.林说:宪法草案“肯定毛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进一步强调说:“毛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比如黑猫白猫,带三块表,共富中国梦…都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当下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任务。

中 50.毛对林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的讲话.收回有陈伯达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3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等“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中 51.毛为了稳住林,特地在《我的一点意见》写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样的话.按照毛的意见,全会开始揭发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也受到批评

从高岗事件,到八大,庐山会议,四清四不清,农业十六条……毛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老战友,都抱有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妥协只会让无的力量继续被打压。直到文革,才清醒的提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既然是路线斗争,敌我矛盾,和稀泥,林利益集团的人会领情吗?林的儿子林立果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对他的心腹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中 52.70年11月16日,党\*\*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列毛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野心家、阴谋家的

面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就这样由上而下地开始了。

无的先锋队在政治宣传上面握有主动，因此“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预设战场在政治宣传上面，是对无有利。

无没有深入在经济领域培养挖掘先锋队员，忽视经济，对经济不敢抓，不敢碰，怵头畏难的情绪，埋下了日后被资从经济上复辟的祸根。

经济领域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从文革前到文革期间，始终都牢牢的掌握在资的先锋队手中。

\*\*的“阶级斗争为纲”先是被周大搅屎棍修正成“抓革命，促生产”，既而变成“工作时间抓生产，业余时间搞政治”，于是政治脱离了生产，成了“业余”爱好。生产本身就是政治，脱离了生产的政治就只剩下读报，抄语录等空洞的形式，成了“空对空”。放空炮的“政治”学习，干瘪脱离实际，当然变的面目可憎。于是，资牢牢的把握了生产一线的绝对控制权！

现在，工友们应该吸取教训。斗争的焦点不在选举，不在立法，不在 XX 界 X 中老板大会，不在上街，就在生产线。既然老板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发展经济的第一线，有什么理由工人不在这个经济战场对老板的生产过程实行破坏，蚕食，瓦解，阻滞，直到歼灭？

没错！这个战场上，敌强我弱——老板占有优势和主动权，有经理，监工，保安等专政工具确保生产顺利进行。但是，工友的优势也很明显，就是熟悉生产。

自发的破坏生产工具，并不能对老板产生致命打击；自觉的联合各工段各部门的工友，厂内外上下游产业的工友，展开麻雀战，袭扰战：今天捣反一堆材料的方向，明天焊坏一块主板，后天油箱里加些白糖……误工节省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吐槽生活艰辛，揭露老板伪善，进行仇恨教育。日积月累下来，可能一个资产上千万的厂，就成了资本黑洞——一切都在运转，可是无论投入多少“知识、技术、管理、资本”，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零产出

失业怎么办？裁员怎么办？哪里还不是吃饭钱，换个地方继续窝工，怠工，组织起来搞破坏……

中 53.70 年底,根据毛的一个批示,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又称华北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在继续揭批陈的同时,还批判了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政治委员李雪峰.71 年 1 月,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毛称为“挖墙角”、“掺沙子”“甩石头”。

有人说，这些是上层，最高权力中心的斗争方式，工人没条件，学不来。

这种认识只是停留在个别工人的自发斗争阶段，没有看到自觉组织起来的工人展示的力量。三十个组织起来的男女汉子，封锁工业园区入口，就可以瘫痪一个上万人工业园区 24 小时，并且造成短时间的红色恐怖！

平时可以采取的斗争方式更多啦！可以参考抗日最艰苦时期的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政治进攻为主。

武工队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一是对群众宣传，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至于其方式方法，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写信、打电话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法，比如截住过往邮车，在来往的信封上写标语口号；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比如给天津市长打恐吓电话，给河北省长的家里寄传单，等等等等。这些作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十分常见的心战方式。

武工队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是在棒子垅里在地道里在炕头上，是在满脑袋高粱花子一身臭汗的庄稼汉身上，是在伪军伪警伪组织的下层。为什么呢？其一，占领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是中共武装斗争历来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当时面临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农村中，有敌人建立的各级政权组织，分驻着遍地的伪军下层单位。这些维持会长、自卫团长、特务系长、伪军小队长、警察分所长们，如果工作做不好，他们就成为恢复与开辟根据地的绊脚石，而工作做的好，又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内线，所以自然就成为武工队争取与打击的头号目标。

其三，这也是武工队的能力决定了的。城市上层县知事市长团长集团长等中高级伪官，一般住在较大城市，对于武工队来说，一来不容易经常接近，二来这些高官受奴化影响较大，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较深，在没有受到严厉的打击之前，在敌我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农村，那些伪军伪组织中的下层官差们，除个别日寇直接豢养的特务武装外，多数并不把日本人当成唯一的靠山，从他们身上很容易打开突破口。至于农村中的各种“群众防共组织”，本来就是被胁迫加入的，其成员全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队的二十响比鬼子的刺刀离他们更近更显力量了，他们是极愿意参加秘密抗日活动的。只要自卫团长呀警察分所长呀什么的装看不见，武工队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样高喊“平安无事”。到后来“两面派政权”出现后，这些农村中的伪政权组织，名

中 54.70 年底,根据毛的一个批示,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又称华北会议)议在京继续揭批陈的同时,还批判了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政治委员李雪峰。

度娘两个老龟命,都是因为庐山会议上支持设国家主席被归到林一伙,都是九一三前后被收押.改开后都没在第一拨被平反.后来都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老死。

中 55.82 年,也就是改开后 4 年,这两个人的老婆找到胡耀邦.解放战争中,郑维山是华北第三纵队司令员,胡是政委.胡出面,邓点头,最后不调查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精”,就都平反了.因为不是文革第一批倒掉的,涉嫌在文革初期整过人,没法官复原职,也没法重用,因为很多人会咬.不厚貌似嫌前妻影响他前程离了婚。

左粉、孔粉极力鼓吹的不厚书记，红色书记，泽民的好书记……难道忘记瓜爷爷是建国初期\*\*人民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华北局第一书记，文革初期和刘少奇一起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第一批倒掉的资先锋队代表？难道忘记瓜爷爷是改开后第一批被平反，并委以重任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国企私有化的急先锋——一句话，瓜爷爷是邓的左膀右臂。左粉、孔粉你们反邓却粉瓜爹，不精分吗？

中 56.李雪峰八大的时候,是书记处书记.文革初期彭真倒台后李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周的推荐.九大中被选为候补委员.文革期间,周力保李当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为平息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立下赫赫战功.庐山会议上发力支持设国家主席。

俺们并不是阴毛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难道没有周和林的影子吗？可见林一伙和刘邓周一伙,没啥本质区别,改开后合流很容易

再往前数 59 年庐山会议倒台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和他们的势力在地方的代表，改开后，很快也陆续被平反，与邓胡迅速合流，可见他们本来就是一伙，没啥本质区别，改开后合流顺理成章。

胡耀邦拉着劫后余生的老干部的手，感慨的说，“我们是十年，你们是二十年，不容易啊！教训太深刻了！”。

中 57.李雪峰活到 2003 年,97 岁挂.郑维山活到 2000 年,85 岁.李雪峰的其中一位女儿李丹宇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来的前妻.李雪峰的儿子李小雪则是薄熙来的连襟,同时为薄熙来的前大舅;其妻子谷丹是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的三姐.李小雪的老婆是谷丹,是谷开来的三姐.谷家五朵金花,各个是真金白银,货真价实的千金,资产上亿的主。

左逼五毛们又从哪里看出来瓜爹是代表工人利益，不是代表老板利益的？瓜爹本来可以走的更远，可惜就是被你们这样猪一样的队友给拖累了。

中 58.文革中,谷景生遭受诬陷、迫害,被监禁关押 12 年.改开后马上平反.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



文革第一批撂倒的,基本都可以恢复到原职.像李雪峰郑维山这种后面撂倒的,晚个4年也可以平反,挂个虚职.不能不叹服:文革第一批迫害的真是精确啊!可惜无自己团队建设没跟上,被周的人抢位.先撸先平反,后撸后平反,邓很公平

中 59.还在 70 年 10 月,毛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示:“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明确地表达了对军委办事组的不满.15 日,毛在叶群的检讨信上批评叶等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不铤而走险就没机会了。

中 60.70 年 11 月 6 日,党\*\*发出《关于成立\*\*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宣布\*\*组织宣传组在政治局领导之下,管辖\*\*组织部、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等机关的工作,以及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组织宣传组组长为康生,组员中有江、张、姚等。

政治宣传领域,无的力量占主导。脱离了生产,脱离了经济,单纯的政治宣传,就成了空洞的口号和乏味的灌输——政治,和经济,本来就是一回事。

顺便回答一下什么是极左极右。

孔老二的回答是:

“你家房顶漏雨,让你把房子送给西门庆然后给西门庆当牛做马的是极右,让你把房子推倒睡在大街上高喊革命万岁的是极左。”

这是脱离阶级的空泛比喻,孔粉和左粉意淫自撸的震动器。

孔粉不敢回答孔老二,李小二,张小三,司小四,陆小五都是啥阶级?俺们来回答,他们的经济屁股都是正儿八经的小资,政治观点都是典型的资左翼。他们和他们批判的右翼实际是一伙,左左右右是一家,他们都住在共同的河蟹大资的房子,享受着作为资产阶级内部一员的民主和自由,当然反对推翻资专政的社会。

先阶级,后左右。

对于工人来说,放弃基于工作场所的经济斗争,懒于在工友之间广泛开展诉苦教育,放弃平时立足工厂展开积聚力量的工作,寄希望于欠薪厂子被搬空后,坐等工运服务商维权,寄希望于上街,跪舔,理性维权的托猪,这样的行为就是极右。放弃对身边工友的宣传,对身边工头,监工,经理,老板的日常斗争,孤身犯险,去破坏工厂以外河蟹的县级以上



的党政机关，寄希望于“搞大的”，造成“政治影响”，这样的行为就是极左。至于勤劳敬业，以厂为家的劳模，那简直就是工贼，正如一位同志总结的：

“残酷的普通人现状：你每付出十分，就会被剥削七分，你每奉献十分，就会被霸占七分。你每软弱一次，就会被强奸一次，你每忍让一次，就会被打劫一次。你每傻逼一次，就会被欺骗一次。你每慈善一次，就会被耍弄一次。你每善良一次，就会被愚弄一次”

====

总结一下，文革的产生，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从建国开始到文革前，从中央到地方，对立的资无路线各自的先锋队员，无时无刻不在爆发着激烈的冲突（工友不妨去下载一下《周恩来传(四)》.pdf，中共\*\*文献研究室的又一巨著，河蟹自白书，周从建国到文革前的一系列搅屎工作，极大的削弱了无力量，壮大了资力量，极好的佐证文革并非是偶然发生，阴毛，文革的爆发是有着广泛基础和长期对立背景的，是必然会发生的）。

文革初期的三年是这个冲突的最高阶段。除了 66—69 年，无抓住了资内部“误伤友军”的机会，主导了斗争方向，其他期间，资的总体力量都占据着绝对优势。

有的工友担心，我们的力量那么弱小，怎么斗争？

恰恰相反，越是力量小的时候，越是要斗争。

远的抗日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是哪方力量占优势？哪方极力维持秩序，维护稳定？河蟹对哪方最有利？力量最弱的一方，采取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方式，展开了普遍的政治攻势，发明了麻雀战，袭扰战，夜战，蚕食敌占区，日伪区，今天歼灭三个人，明天缴获五条枪，积少成多，成千上万个青纱帐里，半年剿灭的敌有生力量超过一次大会战，既打击敌人士气孤立瓦解顽敌，又扩大了根据地盘，还在斗争中壮大革命队伍。弱小力量自觉破坏秩序，积极

文革第一批撂倒的,基本都可以恢复到原职.像李雪峰郑维山这种后面撂倒的,晚个 4 年也可以平反,挂个虚职.不能不叹服:文革第一批迫害的真是精确啊!可惜无自己团队建设没跟上,被周的人抢位.先撂先平反,后撂后平反,邓很公平

中 84.71 年 1 月,李德生接替郑维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当时任十二军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奉周指示赴安徽制止武斗,立下投名状!

撵走一个周恩来叶剑英推荐的郑维山,换来一个周恩来叶剑英推荐的李德生.不能不慨叹周真是个人才。那啥:二十一世纪啥最贵呀？

中 85.#李德生#71年9月12日下午,毛安全抵京.在丰台车站,毛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市委书记吴德、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毛在和李德生等人谈话时,不时流露出这种担忧.毛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让李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却没有说.当晚,林彪携妻带子乘机叛逃

李调动部队,会不会告诉周知道?

中 86.#李德生#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的死党.紧急关头,周最不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五天五夜值守.事后,周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情况不明?还是很明?又是无缝对接的顶位,周的组织工作牛 B!

中 87.73年8月#李德生#当选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至此李作为资代表,被斗争推上政治斗争第一线最高峰.后因反对“批林批孔”,取消了八一厂的革命委员会,被江“迫害”:先是12月份“八大军区对调”从北京调到沈阳军区,安徽革委会主任由无路线的宋佩璋接替.75年1月,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常委、副主席的职务。

“取消了八一厂的革命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行为，江应该是抓住了战机，及时反击！

中 88.江等当着李先念的面,追问#李德生#和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联系.接着追问总政治部为什么不抓批林批孔,却请陈永贵作报告.此事李德生是请示过叶剑英的,现在又当着叶的面追查.李德生看出,他们是想强攻自己,进而兼及与会的叶、李先念.一定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于是,他只好沉默不语

这时的沉默不语，就是深刻的阶级觉悟。

工友们如何识别身边的工贼，就是那些无私奉献的劳模，那些动不动“体谅老板难处”“大家都不容易”挂在嘴边的，罢工的时候，积极倡导复工的。

11.72年1月6日,毛在同周、叶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的意见.8日,毛在审阅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划掉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10日,毛临时决定,抱病赶往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

形势比人强

下 12.72年8月14日,毛在邓的来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他认为邓“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加以区别”.此前,毛还批示同意陈云请求\*\*分配“做些力所

能及的工作” 73年 12月,毛表示要对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承认自己听了林的一面之词,要做自我批评

人在矮檐下。毛为高岗事件背黑锅，为反右背黑锅，为大跃进，浮夸风，三年困难时期……背黑锅。毛不是神，只是一个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下 13.周把握机会,精心安排,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71年 10月,周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并严肃批评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使许多一时不能解放仍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

周还同时开展了三项举措保护老干部：一是解除监禁；二是安排公开露面；三是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医疗问题。

下 14.周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针对当时落实干部问题,阐明毛历来倡导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政策

和风细雨，温言软语对资 Vs 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对无。周搅屎抽离老毛讲话的时空，“毛历来倡导 XX”，然后夹私货

周搅屎把老板和工人都装在人民，劳动者的筐子里面，保护资本，打压工人。像这样搅混水的说法，在现在的媒体报刊上大肆宣扬；混淆阶级分析，空谈 1%的精英和 99%大众对立

马列毛在河蟹也成了一项产业，“红色经济”，也没有丢嘛！河蟹豢养一批砖家、学者负责“无害化”马列毛的工作。剥离时空，抽掉阶级斗争，教条化，把马列毛或者神化，或者变的枯燥面目可憎，这些工作都做的很出色@余斌批判 @杜建国微博 @赵磊教授！当然了，孔老二也有一份狗粮，中华帝国不差钱！

下 16.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

宣传媒体明明是文革小组的阵地，结果成为资路线大造舆论的平台。下层有广泛的资力量代表，上层有政治局常委压倒性的支持，老干部们在暂别政坛 3年后，重回舞台。一切似乎没有变，又似乎变了些什么。眼光中不再迷茫，三年来被动掉三高的靠边站，痛定思痛，我们终于又回来了！

下 17.在福建省，到 1972 年 5 月中旬，3060 名省管干部中，已解放的为 2710 人，占 88.6%；其中结合到领导班子中的为 2044 人，占已解放干部的 75.4%。1972 年，湖南省下放农村、厂矿和“五七”干校的近 8 万名干部有 90%分配了工作；原省管干部解放了 91.8%，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为 83.8%。

在山西省，到 1973 年上半年，省、地两级管理的干部已解放 97%，其中已安排工作的占 98%；全省 46796 名工程技术人员，已分配使用的为 45351 名，其中 96.2%的人回到专业技术岗位。

瞧瞧，有没有“王者归来”的态势？去而复返，失而复得。除了走不动路死掉的，全捞回来了！

下 18.通过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九大后，文革小组实际停止活动。“树欲静，而风不止”。资路线代理人抓紧时间，反攻倒算，积极扩充势力范围，紧锣密鼓，随时准备着！

就是这些捞回来的省、地级干部，成了坚定的资先锋队员的中层骨干，回来后清理基层造反派，无的先锋队员绝对不手软！希望结束文革的资力量已经整装满员，就等号令了！

下 19.九一三事件后，在 1971 年 12 月至 1972 年 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任务。会议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

经济生产领域，始终是文革小组的短脚。结果被资抓住大做文章。谁做计划，发展谁的生产力，这是很大的政治问题，文革小组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67—69 年三年期间培训的各地造反派骨干，在培训结束后，纷纷被调离原单位，文革小组的底层力量被清洗一空。九大后，除上海以外，其余地方的无产阶级都处于被管制打压状态。

举个当时工厂的作息制度：八点上班，七点半提前到岗半小时，理论学习一小时，一天的政治任务就算完毕；接着是连续工作，下班后加班，属于完成生产任务——政治和生产脱节，政治变成放空炮，变成业余时间的任务，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政治，变的面目可憎。

莫非只有老板和专家才知道重视质量，厉行节约，工人就不知道吗？

涨不涨工资，什么时候涨，同样也是重大政治问题。文革十年未涨工资，是谁在抵制？文革后马上涨工资，又是谁在支持？当然是处于力量上风的资路线喽！

下 20.会议纪要经周主持讨论定稿后，张春桥却说“文件长了，不好发”。张春桥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由与会代表广为传播，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文革小组作出了反击，但是力量弱小。

“未能在会上通过，基本精神却由与会代表广为传播”，说明所谓“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完全是诬蔑！对老板，对资路线有利的政令，可以顺利的插上翅膀，从中南海飞出，畅行四方；对工人，对无路线有利的政令，就遭到封锁，歪曲，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的就是四面围剿，老毛在文革开始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资力量的反扑，也是十面埋伏。

可笑的是，最近秘密传出了“衣带诏”，据孔老二证言，是 X 总的声音不能顺利传达，所以秘密传达给左派大佬，爱国主义士，约好召集各路正义力量，发动勤王之师，清君侧。工友们，是不是“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现代版？

受“成王败寇”思想影响的人，会觉的专家教授、将军元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命天君，其实扒开皮看看：

所谓专家，学者，教授，他们并没有什么神秘的。66—71 没有他们，生产依然一日千里的发展。从工农各条战线，涌现出大量的工人专家，种粮能手，养猪先进。72 年这帮被打倒的干部、工贼、和技术人员又回来了，重新垄断了知识和技能，重新骑在工人头上吆五喝六，摘取工厂发展果实，这样的敌对连续基层代理人，工人要不要斗？

所谓将军，元帅，老军头，他们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常备军，荣誉归上级；军功章，就是烈士尸骨堆出来的；打仗活剩下来的人，就成了将军，元帅，老军头。军队成了文革时期的保温箱，避难所，收留资路线火种的诺亚方舟，世外桃源。邓楠之流当时躲在中科院（属于军队编制），陈毅的龟儿子不承认了吗，他们当时都躲在军队里，没人扫荡。老军头向总理保证，留在军队，提拔一点问题没有

军队插手地方生产，直接结果就是改开后的军队走私一条龙。文革中军队借战备又扩编，给经济独立披上革命的迷彩。经济独立，改开后就直接用潜艇走私，任志强用军机走私。

有人说，军队不能乱，是因为怕苏联进攻！笑话，苏修的军队连阿富汗都打成一坨屎。

中苏对抗是九大重要议题，69 年 4 月九大期间，就已经全国动员了。

68年8月，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69年3月上中旬，苏联边防部队两次入侵中国黑龙江省东部珍宝岛地区，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因苏军入侵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在此背景下，新中国掀起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

战备的高潮是69年底快要签和平协议的时候，就是“林副主席第一号令”的时候，之后边境已经缓和，国内刚好借备战，大力发展三线建设。

不应该是军队参加生产，而应是生产工人学军事，搞民兵师，基层有党小组的，政委是一个，生产一个主管，军事一个主管，平时一起干活，一起训练，军队的军官让他们去工厂讲军事课，让他们手下没兵。不是军队职业化，而是工人要求掌握一切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技术，就像他们作为统治阶级，掌握如何管理经济，管理国家，学习文史哲艺术等等。

军队里面恢复士兵委员会，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军队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和工农一起参加生产；五是作士兵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工作；六是教会每一个工农现代战争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能，为最终”消灭“常备军打下基础！

当面临战争和重大军事威胁时，应该以党为核心，建立权力集中的军事中央，集中指挥，统一调度。当战争结束和威胁基本解除，应将恢复基本的无产阶级军事组织。

无产阶级的军队制度不革命，换谁上去当司令，无产阶级革命的下场都会和上次一个样！

一句话，你不乱，底下的上不去，基层的人就容易对上层产生神秘感。以为：党的领导是三头六臂，专家是文曲星下凡，司令是丈八蛇矛，军头是不死之身。

现在的 CCAV，贯彻了资路线的指导思想，有意识的加强这种造神迷信。宣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收买拉拢劳模，工贼。避而不谈阶级斗争，谈个人斗争，谈宿命。

下 21.1972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需要合理的规章制度。多数省市的企业先后展开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竞赛除了提出政治学习、纪律、作风等当时所称的“大指标”外，还规定在生产领域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安全、比消耗等“小指标”，并与某种物质奖励相联系。

资在对无进行“甩石头，掺砂子，挖墙脚”的工作。样样都抓，实际就是样样不抓，目的就是弱化阶级斗争与实践的联系。

物质奖励，而不是生产竞赛，目的就是分化工人，造成普通工人与劳模之间的紧张关系，筛选工贼，瓦解基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工友应对身边的老好人，业务能手，劳模先进，提高警惕。他们并不会把手艺，要点教给我们，一起展开生产线上的斗争，而是藏私，讨好老板，博取上位。劳模能手与普通工友拉开生产效率，作为老板增加任务的依据。

下 22.1972 年 1 月 21 日，周恩来就援外汽车质量问题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四五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待，怎么向人民交待？从产品质量问题入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问题的实质：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

周是把生产当成政治任务抓的。

周对援外很重视。周对保质保量完成外国资本家的订单任务很看重。赶工势必造成质量下降，然后再把质量下降的屎盆子扣在工人身上，用森严的纪律和条条框框绑住工人，禁止罢工，禁止生产时学习政治，政治学习不学或者只安排业余时间看书读报学。

现在也一样，富士康代工的 PS4 电视游戏机陷质量门，三星 Note2 手机质量门，大众全球召回几百万台汽车维修……数不胜数

八个字评价周在文革中资路线的做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事无巨细的插手生产，过问工作细节，就是不给无上位学习的机会。然后运用资垄断技术和管理获得的利益，巩固资阵营。

去而复返的资分子，淬炼成了坚定的资路线中坚力量。他们王者归来后，一方面，配合上层资路线，清理工厂里面的造反派，“三类人”；另一方面，培养工人贵族，收买工贼，强化管理，将工会做成党委的一个部门，空摆设；同时，将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排除在外，阻止无先锋队发动、组织起来斗争。

时间：71 年 9 月中旬——72 年 10 月



下 2.9 月下旬至 10 月初, \*\*相继决定成立由叶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在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为彻查林、陈的问题, 成立以周为首的专案组, 集中处理

从这个安排来看, 无先锋队对林出逃准备不足, 两个位置竟然一个都没占到? ! 另一

下 3.9 月 26 日至 10 月 15 日, 在李富春主持下, 党\*\*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九次座谈会.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 他们愤怒谴责林集团, 揭批林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史的行径. 此时, 包括邓在内的许多老同志给毛写信, 表示坚决拥护党\*\*

老龟命的第二春。周的占坑卡位做的很出色，算是资产阶级的大恩人

下 4. 在揭发、清查林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 一些原造反派组织的少数人趁机浑水摸鱼, 积极串联, 准备拉山头, 算旧账; 一些领导干部又受到批判和冲击; 一些单位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加剧; 一些工厂停工停产; 一些地区一度又出现混乱局面

资掌握了清洗权后对无开刀, 无奋起反击从\*\*到地方

下 5. 周在主持工作中, 开始比较系统地纠正极左思潮, 落实干部政策, 恢复正常秩序, 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转机”的意思就是资力量占了上峰! 落实干部政策, 就是捞文革初期被撂倒的老龟命. 恢复正常秩序, 就是资可以正常工作, 让无没法正常工作.

林空位后,叶及时顶上.从59年彭之后,军队再次回到资手中,并且是经历了文革初期整顿的资先锋队手中,痛定思痛!

下6.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在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312人与会.在会议所发的文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66年7月8日给江的一封信.在信中,毛表示了对林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应该是老毛看到了资产阶级路线回潮的危险,试图把握“批林整风”的方向.斗争的方向不是被资控制指向无,就是被无控制指向资.从林被周.。后的组合拳来看,资的第二春来了,资力量占了上风

下7.“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就算是老毛,在力量对比处于弱势的时候,也被迫妥协.同样的情况还在高岗事件、反右运动、大跃进、浮夸风、彭德怀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中屡次出现,文革前17年的老毛是孤独的,不得不屡次被资团队当枪使;文革前17年的老毛是伟大的,一直没有放弃战斗!

下8.“文革开始后,周一一直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以减轻损失.在67年的夺权高潮中,周,对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断然措施,遏制了极左势力的嚣张气焰,对极左思潮有所抑制

“两个不能否定”提出反对极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下 9. 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契机. 71 年上半年,周在一系列专业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反对极左思潮. 他严肃批评一些部门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说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

嘴里喊着“不要上纲上线”,实际是只许自己上纲上线,逢会必讲,但不许别人

下 10. 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的决策,周因势利导,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各地区、各部门一系列工作的调整和整顿

“因势利导”就是搅屎,周抓住机会把被打倒、被专政的队友解放出来,恢复原有待遇,安排工作.

工人也可以利用各种规章制度和漏洞搅屎“做好风控”OK!那就“拉长周期”

下 11. 72 年 1 月 6 日,毛在同周、叶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请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叶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的意见. 8 日,毛在审阅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划掉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 10 日,毛临时决定,抱病赶往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

形势比人强

下 12. 72 年 8 月 14 日,毛在邓的来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他认为邓“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应与刘加以区别”. 此前,毛还批示同意陈云请求\*\*分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3 年 12 月,毛表示要对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承认自己听了林的一面之词,要做自我批评

人在矮檐下。毛为高岗事件背黑锅，为反右背黑锅，为大跃进，浮夸风，三年困难时期……背黑锅。毛不是神，只是一个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下 13. 周把握机会, 精心安排, 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 71 年 10 月, 周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并严肃批评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 使许多一时不能解放仍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

周还同时开展了三项举措保护老干部：一是解除监禁；二是安排公开露面；三是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医疗问题。

下 14. 周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 针对当时落实干部问题, 阐明毛历来倡导的“打击面要小, 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 以及“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政策

和风细雨，温言软语对资 Vs 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对无。周搅屎抽离老毛讲话的时空，“毛历来倡导 XX”，然后夹私货

下 15. 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一批

评一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老毛比斯大林取得的理论进展在于做出了下面的论断——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从内部产生，即“社会主义内部依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周搅屎把老板和工人都装在人民，劳动者的筐子里面，保护资本，打压工人。像这样搅混水的说法，在现在的媒体报刊上大肆宣扬；混淆阶级分析，空谈 1%的精英和 99%大众对立，是张天师的最爱。

马列毛在河蟹也成了一项产业，“红色经济”，也没有丢嘛！河蟹豢养一批砖家、学者负责“无害化”马列毛的工作。剥离时空，抽掉阶级斗争，教条化，把马列毛或者神化，或者变的枯燥面目可憎，这些工作都做的很出色@余斌批判 @杜建国微博 @赵磊教授！当然了，孔老二也有一份狗粮，中华帝国不差钱！

下 16. 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

宣传媒体明明是文革小组的阵地，结果成为资路线大造舆论的平台。下层有广泛的资力量代表，上层有政治局常委压倒性的支持，老干部们在暂别政坛 3 年后，重回舞台。一切似乎没有变，又似乎变了些什么。眼光中不再迷茫，三年来被动掉三高的靠边站，痛定思痛，我们终于又回来了！

下 17. 在福建省，到 1972 年 5 月中旬，3060 名省管干部中，已解放的为 2710 人，占 88.6%；其中结合到领导班子中的为 2044 人，占已解放干部的 75.4%。1972 年，湖南省下放农村、厂矿和“五七”干校的近 8 万名干部有 90%分配了工作；原省管干部解放了 91.8%，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为 83.8%。

在山西省，到 1973 年上半年，省、地两级管理的干部已解放 97%，其中已安排工作的占 98%；全省 46796 名工程技术人员，已分配使用的为 45351 名，其中 96.2%的人回到专业技术岗位。

瞧瞧，有没有“王者归来”的态势？去而复返，失而复得。除了走不动路死掉的，全捞回来了！

下 18. 通过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九大后，文革小组实际停止活动。“树欲静，而风不止”。资路线代理人抓紧时间，反攻倒算，积极扩充势力范围，紧锣密鼓，随时准备着！

就是这些捞回来的省、地、县级干部，成了坚定的资先锋队员的中层骨干，回来后清理基层造反派，无的先锋队员绝对不手软！希望结束文革的资力量已经整装满员，就等号令了！

下 19. 九一三事件后，在 1971 年 12 月至 1972 年 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任务。会议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的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

经济生产领域，始终是文革小组的短脚。结果被资抓住大做文章。谁做计划，发展谁的生产力，这是很大的政治问题，文革小组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67—69 年三年期间培训的各地造反派骨干，在培训结束后，纷纷被调离原单位，文革小组的底层力量被清洗一空。九大后，除上海以外，其余地方的无产阶级都处于被管制打压状态。

举个当时工厂的作息制度：八点上班，七点半提前到岗半小时，理论学习一小时，一天的政治任务就算完毕；接着是连续工作，下班后加班，属于完成生产任务——政治和生产脱节，政治变成放空炮，变成业余时间的任务，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政治，变的面目可憎。

莫非只有老板和专家才知道重视质量，厉行节约，工人就不知道吗？

涨不涨工资，什么时候涨，同样也是重大政治问题。文革十年未涨工资，是谁在抵制？文革后马上涨工资，又是谁在支持？当然是处于力量上风的资路线喽！

下 20. 会议纪要经周主持讨论定稿后，张春桥却说“文件长了，不好发”。张春桥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由与会代表广为传播，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文革小组作出了反击，但是力量弱小。

“未能在会上通过，基本精神却由与会代表广为传播”，说明所谓“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完全是诬蔑！对老板，对资路线有利的政令，可以顺利的插上翅膀，从中南海飞出，畅行四方；对工人，对无路线有利的政令，就遭到封锁，歪曲，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的就是四面围剿，老毛在文革开始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资力量的反扑，也是十面埋伏。

可笑的是，最近秘密传出了“衣带诏”，据孔老二证言，是 X 总的声音不能顺利传达，所以秘密传达给左派大佬，爱国义士，约好召集各路正义力量，发动勤王之师，清君侧。工友们，是不是“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现代版？

受“成王败寇”思想影响的人，会觉的专家教授、将军元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命天君，其实扒开皮看看：



所谓专家，学者，教授，他们并没有什么神秘的。66—71 没有他们，生产依然一日千里的发展。从工农各条战线，涌现出大量的工人专家，种粮能手，养猪先进。72 年这帮被打倒的干部、工贼、和技术人员又回来了，重新垄断了知识和技能，重新骑在工人头上吆五喝六，摘取工厂发展果实，这样的敌对连续基层代理人，工人要不要斗？

所谓将军，元帅，老军头，他们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常备军，荣誉归上级；军功章，就是烈士尸骨堆出来的；打仗活剩下来的人，就成了将军，元帅，老军头。军队成了文革时期的保温箱，避难所，收留资路线火种的诺亚方舟，世外桃源。邓楠之流当时躲在中科院（属于军队编制），陈毅的龟儿子不承认了吗，他们当时都躲在军队里，没人扫荡。老军头向总理保证，留在军队，提拔一点问题没有

军队插手地方生产，直接结果就是改开后的军队走私一条龙。文革中军队借战备又扩编，给经济独立披上革命的迷彩。经济独立，改开后就直接用潜艇走私，任志强用军机走私。

有人说，军队不能乱，是因为怕苏联进攻！笑话，苏修的军队连阿富汗都打成一坨屎。

中苏对抗是九大的重要议题，69 年 4 月九大期间，就已经全国动员了。

68 年 8 月，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69 年 3 月上中旬，苏联边防部队两次入侵中国黑龙江省东部珍宝岛地区，6 月和 8 月，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因苏军入侵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在此背景下，新中国掀起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

战备的高潮是 69 年底快要签和平协议的时候，就是“林副主席第一号令”的时候，之后边境已经缓和，国内刚好借备战，大力发展三线建设。

不应该是军队参加生产,而应是生产工人学军事,搞民兵师,基层有党小组的,政委是一个,生产一个主管,军事一个主管,平时一起干活,一起训练,军队的军官让他们去工厂讲军事课,让他们手下没兵。不是军队职业化,而是工人要求掌握一切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技术,就像他们作为统治阶级,掌握如何管理经济,管理国家,学习文史哲艺术等等。

军队里面恢复士兵委员会,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军队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和工农一起参加生产;五是作士兵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工作;六是教会每一个工农现代战争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能,为最终”消灭“常备军打下基础!

当面临战争和重大军事威胁时,应该以党为核心,建立权力集中的军事中央,集中指挥,统一调度。当战争结束和威胁基本解除,应将恢复基本的无产阶级军事组织。

无产阶级的军队制度不革命,换谁上去当司令,无产阶级革命的下场都会和上次一个样!

一句话,你不乱,底下的上不去,基层的人就容易对上层产生神秘感。以为:党的领导是三头六臂,专家是文曲星下凡,司令是丈八蛇矛,军头是不死之身。

现在的 CCAV,贯彻了资路线的指导思想,有意识的加强这种造神迷信。宣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收买拉拢劳模,工贼。避而不谈阶级斗争,谈个人斗争,谈宿命。

下 21. 1972 年 5 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需要合理的规章制度。多数省市的企业先后展开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竞赛除了提出政治学习、纪律、作风等当时所称的“大指标”外,还规定在生产领域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安全、比消耗等“小指标”,并与某种物质奖励相联系。

资在对无进行“甩石头，掺砂子，挖墙脚”的工作。样样都抓，实际就是样样不抓，目的就是弱化阶级斗争与实践的联系。

物质奖励，而不是生产竞赛，目的就是分化工人，造成普通工人与劳模之间的紧张关系，筛选工贼，瓦解基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工友应对身边的老好人，业务能手，劳模先进，提高警惕。他们并不会把手艺，要点教给我们，一起展开生产线上的斗争，而是藏私，讨好老板，博取上位。劳模能手与普通工友拉开生产效率，作为老板增加任务的依据。

下 22. 1972 年 1 月 21 日，周恩来就援外汽车质量问题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四五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待，怎么向人民交待？从产品质量问题入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问题的实质：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

周是把生产当成政治任务抓的。

周对援外很重视。周对保质保量完成外国资本家的订单任务很看重。赶工势必造成质量下降，然后再把质量下降的屎盆子扣在工人身上，用森严的纪律和条条框框绑住工人，禁止罢工，禁止生产时学习政治，政治学习不学或者只安排业余时间看书读报学。

现在也一样，富士康代工的 PS4 电视游戏机陷质量门，三星 Note2 手机质量门，大众全球召回几百万台汽车维修……数不胜数

八个字评价周在文革中资路线的做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事无巨细的插手生产，过问工作细节，就是不给无上位学习的机会。然后运用资垄断技术和管理获得的利益，巩固资阵营。

=====

总结一下：

文革失败的种子，就是在中期埋下的。生产和经济，始终是文革小组的弱项和短脚。大量资分子回潮，伴随着的是工人数量的绝对减少。同期人口的快速增加，工人力量相对的也减少。

去而复返的资分子，淬炼成了坚定的资路线中坚力量。他们王者归来后，一方面，配合上层资路线，清理工厂里面的造反派，“三类人”；另一方面，培养工人贵族，收买工贼，强化管理，将工会做成党委的一个部门，空摆设；同时，将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排除在外，阻止无先锋队员发动、组织起来斗争。

## 怎样读史之文革史（十）

2015年5月28日 09:38 阅读 54 [新浪博客](#)

十

下 23—37

时间：72年10月—73年2月

代表事件：三个突破 全红总

下 23.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72 年 10 月至 11 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这次会议还提出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

### 物质奖励 Vs 生产竞赛

会后，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 1973 年 1 月的全国计划。72 年因为文革小组阻挠没通过的，73 年得以通过，力量此消彼涨。所谓经济计划，实际是政治任务。经济和政治，本身就是一回事。

下 24.《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

收权、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绑住手脚，工资总额，涨不涨，什么时候涨，要看什么时候对资路线有利。工人作为主人，竟然管不了给自己发多少工资？

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

越多的工人参与管理，管理就越没有神秘感；越多的工人懂技术，技术员就没有神秘感；层级越森严，分工越明确，下层空间越狭窄，压迫越深重。

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

革委会已经被厂长负责制取代，这本来是重大的反革命行径，但是文革小组无力反击。

企业党委成员，就是周恩来花一年时间，“大会小会逢会必讲，大报小报逢报必发”解放出来的干部，工厂的管理职位，则由下放回来的技术人员担任。

下 25.金融系统也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调整。1972 年 9 月，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华国锋听取汇报时，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正确认识银行的职能作用，对银行在新中国成立后 20 多年来的成就要给予充分的评价；要加强银行工作的独立性，全国信贷资金统一调拨，全国统一结算，金、银、外汇统一管理。他们强调:当前银行管理偏松，要加强分口管理，不能乱来，否则一定要多发票子。

金融资本服务着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金融，可以扶植资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工厂单位，打压无路线的阵地。

在恢复工作的资先锋队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面前，修正队员华国锋就和小学生一样无知。修正因为放下了阶级斗争，幻想什么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 和平竞争 和平过渡”代表资无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小生产社会主义，结果就是根基不稳，东倒西歪。

下 26.1972 年至 1973 年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还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的若干基本关系进行调整。针对“三个突破”，国务院要求: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总体控制；

不知道工友看到“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总体控制”，能不能看出字字血、声声泪来？

周所谓的“三个突破”，是指：71 年底,绝大部分经济指标都完成.同时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工资支出突破 300 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 800 亿斤,大大超出预定的计划.随之而来出现了货币发行量的突破.周指出:“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

周是庸俗经济学的拥趸,削足适履给经济大脚穿货币小鞋。

周开的药方是削减工人数量。周的眼里，工人就是蝗虫，就是吃白饭的。

下 27.为了解决粮食购销差额的问题，1972 年商业部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确定采取如下措施: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超计划招工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歉;核减农村不合理的销量，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此外，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问题，共同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和风细雨，“知识分子不喜欢开长会，要长期教育”。对工人就是雷厉风行！“压缩一切不合理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超计划招工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

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

下 28.这些措施的实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精简职工方面，不但将 1972 年超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还动员了一部分 1970 年以来招收的临时工、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

用的常年民工和不符合国家规定进入城市的人口回乡务农。另外还决定 1973 年不再招收新职工。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后，1973 年全社会粮食收购 968 亿斤，粮食销售近 956 亿斤，做到了国内粮食收支平衡。

====

对待工人，一句话，“不符合规定”，就“临时工、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不符合国家规定进入城市的人口回乡务农。……1973 年不再招收新职工”

对待专家，九一三后，翻身的专家，干部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出工人，进工贼。出造反派，进保皇派。这一进一出，工人贵族，工头监管，技术白专，厂长就在工厂中占了绝对上风！

72 年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因为姚文元的阻挠没有下发，73 年就阻挡不住了。

下 29. “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是于 1966 年 11 月 8 日由部分合同工、临时工联合成立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跨省市的工人造反组织。“全红总”在北京成立，造反派头目是王振海等人。

1966 年 11 月底—12 月初，“全红总”近 400 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大礼堂，提出了他们的造反要求。12 月 4 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合同工，临时工，在文革初期头一次以组织形式发声。

下 30. 1966 年 12 月 18 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这次接见之后，“全红总”听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迅即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文革小组站队支持“全红总”

下 31. 1966 年 12 月 26 日晚，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会见一开始，江青就阶级感情“充沛”地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立刻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则插话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显得



更为马列主义化地说道：“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家的支付。”

劳动部长不劳动。现在有郭明义工人代表，不代表工人利益的代表，要他干吗？

下 32. “全红总”的代表汇报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且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陈伯达立刻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照样工作！”江青更为激烈地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康生也紧跟着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

办公地点……所属单位……全国各地分团……劳动调配部门……最后是总工会。这一系列动作能完成，不正说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吗？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所在的城市发生混乱，你知道要联系哪拨人，占领什么地方，专政什么人吗？

下 33. 江青还以中央文革最实权人物的口气总结道：“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2，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按《十六条》处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这时，江青对两个靠边站立的领导干部说道：“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什么时候，可以把你的老板，所在的市县领导人，也享受一下这种待遇。

下 34. 中央文革的讲话，“全红总”立刻以大字铅印传单发向全国。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1967年1月2日的《联合通告》。《通告》指出：“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这就是力量。合法吗？无所谓，不愿意签，不签就走人，换个能签字的。

下 35. “全红总”的造反派开始揪斗领导干部，围攻领导机构，通告全国各分团展开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的造反活动。一时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刮起了被后来批判为“经济主义”的“歪风”。不仅属于《通告》内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要求兑现《通告》的规定，类似的“经济主义”要求超出这个规定扩张开来。很多地方将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有些地方将 1961 年—1963 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

“有些地方将 1961 年—1963 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查了一下 60 年到 63 年的工人数量，60 年 5044 万峰值，降到了 63 年 3293 万最低。

工业基建规模有那么大，不可能一天之内砍下去，也就是说将有大量的工人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存在。

“大跃进”表明周恩来的庸俗经济学路线已经不可能胜任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任，并走向反动。周恩来变本加厉，索性借机打压无产阶级。

尼玛对照苏联 30 年代的数据，周恩来的经济管理水平真是低下啊！这是其庸俗经济学派路线所导致的。

下 36. 政策调整后出台的一系列部署是性质明确的。1967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质上就是针对“全红总”这样的潮流在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同年 1 月 20 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省造反派代表时，又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周恩来还说：“至今中央还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这里首当其冲指的是“全红总”。同年 1 月以及 1968 年的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

周恩来出来表态：“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

英特那啥熊要到社会主义后期，条件成熟了再实现。

下 37. 1967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发出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又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但是，“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通告特别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

“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按照原来办法执行”工人，干活可以，千万不能组织起来。

苏拉密眼里，这样雇佣农民工，又遣返农民工，就成了城市工人喝农民血的罪证！

查了查一五到四五期间的职工总数。到 1957 年底，我国职工总数为 3101 万人，比 1952 年增长 93.4%。1960 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高达 5044 万人。而到 1971 年底全国 5318 万职工，这意味着 60 年到 70 年之间，全国职工人数没增加。同时期的人口从 60 年的 6.6 亿，增加到 71 年的 8.5 亿，增加了近 2 亿，近三成。

职工人数却没增加对于一个发誓要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政权，工人阶级人数在 10 年长期停滞不前，这是文革失败的重大原因。

大跃进的暂时失利，明明是周恩来之流的老干部集团无能的表现。同时与苏共二十大的修正路线斗争，与苏修展开的论战，更让无的先锋队明白：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全面激化，前车之鉴就在身边！

60—62 周刘邓路线失利之后，中国的阶级斗争全面激化，中共日益分裂成两条路线两大阵营。无产阶级阵营认为，失利恰恰表明老干部集团的无能，必须予以铲除才能全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阵营认为，极左分子阻碍了他们安享江山用资产阶级封妻荫子的图谋。

资产阶级阵营的头面人物：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之流，疯狂压缩工业规模，疯狂推行工人的下岗分流，而由于工业基建规模有那么大，不可能一天之内砍下去，也就是说将有大量的工人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存在。

附：

查了查一五到四五期间的职工总数：

“到 1957 年底，我国职工总数为 3101 万人，比 1952 年增长 93.4%。1960 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高达 5044 万人，1971 年底全国 5318 万职工。”意味着 60 年到 70 年之间，全国职工人数没增加。“60 年 5044 万峰值，降到了 63 年 3293 万最低”

工友们，你们单位开过人吗？当然，现在是资本主义国家，老板专政，开人很正常。想想在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面，主人被砍了近一半，这还不够反动吗？

要知道，工业基建规模有那么大，不可能一天之内砍下去，也就是说将有大量的工人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存在。资路线在招工辞工过程中，就可以培养、发掘工人

贵族，工贼，分化瓦解无路线的基层力量。清醒的无先锋队员当然要激烈反抗，展开团结工友，对抗资路线安插的劳模，工贼，监工。

大跃进表明周恩来的庸俗经济学路线已经不可能胜任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任，并走向反动。这个时候，资路线的总代理周恩来采取了变本加厉，索性借机打压无产阶级的做法，工友们，你们依然认为改开后，被老板们小资们捧为神的总理，他执行的是无路线，不是资路线吗？对照苏联 30 年代的数据，周恩来的经济管理水平真是低下啊！公有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解放的生产力所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是庸俗经济学派路线的执行人无法想象的！

周恩来反映出来的认识就是五个字：生怕没饭吃。就是小农资本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在前 17 年的经济路线甚至回到了资产阶级早期的重农学派。认为：工人越多，国家负担越重。

明明是自己计划不力，却推给工人冗员太多。周惦记无内债无外债，标准的小农资本主义作风。

周恩来是小资，邓是青出蓝胜于蓝，三年踩 DXP 小路，掉三高运动，认他认清复辟的方向。到邓上台就是大资作派。

红卒要过河

红卒要过河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扯扯西安事变的淡

2015-09-04 19:53

阅读 510

大月饼刚吃完，小资心潮澎湃。月饼阵仗大，小资分肉稳。不过，月饼再大，也没俺们什么事。俺们还是那点吃饭钱，说不定哪天这饭碗也得丢。不过，俺们还是愿意凑个热闹，扯扯这抗日的淡。西安屎变，据说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里程碑。张大嫖，据说是国军中识大体之将帅；周搅屎，据说是此次伟业的第一功臣。俺们的嗨点历来比较低，所以对于所谓伟大人物，伟大事件，总是喜欢扒开来看看。这不，俺们就琢磨了一下，如果当年把老蒋弄死了，会有啥后果。是不是把老蒋弄死了，历史就要重写了？想来想去，俺们也没想出来把老蒋弄死有啥后果。于是，对于所谓的里程碑，俺们觉得就只是一块婊子牌坊而已。至于俺们具体咋想的，还得听俺们说道说道。

话说张大嫖子张学良先生，啪啪啪是把好手，吃喝玩乐，样样精通；至于带兵打仗，那就是个怂逼，不抵抗挂白旗干起来无师自通（纨绔公子是压根忘了小日本是怎么把他老子炸得体无完肤了，张老帅要知道少帅这怂逼样，估计能气活过来）。老蒋这个人心眼儿坏啊，派张怂逼当项目经理，去围剿陕西赤匪，无非就是让他早死早超生。借刀杀人这招老蒋最拿手，借鬼子的刀杀赤匪，借赤匪的刀杀土匪。不过借来借去，最后还是把自个儿的家底全送给了赤匪。

老蒋精逼，小张也不傻。到了古都，少帅还想着继续啪啪啪。只要赤匪不碍事，那是大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可偏偏赤匪天天围着他“啪啪啪”，让他不能啪啪啪。更可恨赤匪所到之处，就要打着什么解放妇女的旗号砸窑子，搞得鸨心惶惶，妓心思变，让大嫖先生无端少了很多乐子。

还有那老蒋最喜欢催工期，每周例会都要问进度，可少帅明明只想在自家屋里啪啪啪，或者去高级馆子啪啪啪，懒得去找赤匪啪啪啪。老蒋一天到晚像一只苍蝇似的在旁边嗡嗡嗡，少帅先生终于忍无可忍（尼玛你以前就是个上海瘪三，老子可是正牌的东北天王），干脆把老板给抓起来了。

就跟民工跳桥那样，围观的不嫌事儿大。好多人喊着，杀了他，杀了他。这不，真有不怕事的，比如一起玩的老杨，就主张赶紧做了他（老杨大名里的那个虎字可不是白叫的）。少帅觉得当初还是太冲动了。可老板都被捆起来了，肿怎么办呢？婊子嫖完扔把票子就行了，没票子给颗枪子也能了事。可这下子抓的是老板，少帅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关键时刻，史上头号装逼犯周仲尼先生出现了。他带着统一战线的光环飘了过来。当年我要是在场，肯定也是围观起哄的屌丝之一。名流死



了我开心，为我苦闷的生活增添些乐事。可是，狡猾的周仲尼让我不开心，其实当时好多赤匪也都不开心，因为家里人被老蒋杀了好多。屌丝就是屌丝，就知道报仇，目光短浅，不识大体。周仲尼可就完全不同了，要不人家怎么是大领导呢。所谓装逼高手，正在于此：一边让好多人不开心，另一边又能让好多人表示，丫真是顾全大局、高瞻远瞩耶。现在的屎书不都这么讲的么：好棒耶！如果老蒋挂了，哇塞，多可怕耶，又是军阀混战不休，又是倭寇长驱直入，国家沦丧耶.....

当年老蒋跳窗逃跑的时候，一个营长下的命令是，如有反抗立即击毙。人走墙根都能被砖头砸死，何况慌不择路逃跑呢？摔死、砸死、心肌梗死、被穷屌士兵逮住做掉。反正好多办法能让他死掉，而且不需要怎么深谋远虑。这么多条死路摆在老蒋面前，这么多死法。要是老蒋就这么像狗一样死掉，历史就会大变样？如果是，那就是说，有没有亡国，原来就看老蒋那几根心脑血管是否正常工作，就看穷屌士兵的枪支质量是否过关，就看老蒋翻过的围墙砖瓦是否砌的够好。

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解决常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与此相应，还有一种人的价值跟这个不相上下，那就是他制造出了常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于是乎，少帅先生成了人生赢家，因为他捉了老板，搞出了常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周仲尼也是人生赢家，因为他解决了这个常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伟大的非暴力、要合作方案！这就是伟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抗日战争史上的里程碑！于是乎，好像和平的最终保障在于他俩。可是俺们想了想，实际上，能否和平这个课题完全是他们制造出来的，根本就是个假命题嘛。

少帅先生要是不捉老板，他也就是军阀一个，跟很多被赤匪击毙的国军将领一样。

仲尼先生要是不搞统战，他也就是赤匪一个，跟很多被国军击毙的共军将领一样。

和平的最根本保障，要是按屎书的逻辑推演出来，那首先是老蒋的心脑血管，枪支质量，围墙建筑质量，所涉及到的就是老蒋的厨师医生，枪厂工人和泥水工人。

按照共军的性质和实力，它必定会在敌后扩大地盘，跟当地日军形成对峙，这跟老蒋死不死没啥关系，共军从头到尾都习惯自生自灭自娱自乐。

按照国军的性质和实力，它也必定会分裂成投靠日军的部队和抵抗日军的部队，这也跟老蒋死不死没啥关系。

唯一有点区别的是，老蒋在，那就是装备差的地方军当先锋，什么李宗仁，张自忠之类的，都要冲到前面去战斗；老蒋不在，应该是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冲前面。这样没准效果更好会更好，而不是跟着英国佬去缅甸丛林里喂蚊子。

有老蒋在，南京都要放弃，那没有他，也肯定会放弃。

那重庆能否守住呢？很不幸，这又是个伪问题。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防守重庆的问题。日军追求的一直是如何把东北，华北的农业和矿产资源跟东

南亚的石油资源互联互通，而且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推进的，侵占东北，扫荡华北，出兵越南，分兵东南亚，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可谓有条不紊，而中间的豫湘桂战役就是要肃清这条命脉的国军有生力量。而重庆，拜托，那根本不是人家的目标，丫自动崩溃最好，不崩溃也没事，就当个充气娃娃，有事儿没事儿摸一下。小日本扔几颗蛋蛋也把老蒋吓得不轻。

所以，有老蒋在，日军这个战略目标也已达成。没老蒋在，日军当然也能达成。

那么老蒋不在，统战就没法弄了么？不好意思，这依然是个伪问题。因为老蒋在，本来也没啥统一战线。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统一战线。俺们说，去尼玛的统一战线。国军给了共军多少钱？国共互相配合打了多少仗？相反，国军明面上屠杀了多少赤匪？暗地里又搞掉了多少共军？直接地结果了多少？间接地害死了多少？要说老蒋对土共，那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血债累累；要说土共对老蒋，那也只能用一个词来描述，那就是恨之入

骨。土共要不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玩自己的一套，而傻傻地真搞什么统战，早不知道被老蒋活埋多少次了。

所以，如果当初，老蒋几根心脑血管断了一根，或者枪支走火，或者俺们这种读书少的屌丝在场，秒杀了老蒋，对所谓历史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有了张少帅和周装逼的出现，就不同了，他们制造了一个杀和不杀的悬疑剧，进一步变成了一个战争与和平的悬疑剧，最后成了一个完全虚假的什么统一战线的狗血剧。然后整个的圈子都在颂扬他们，介个是英雄，那个更牛逼。从 80 年代至今，成了两尊神，——比汉良更帅，比发哥有型，比霍金聪明，比岳飞爱国.....

俺们一直觉得吧，好不容易逮住了，真的要赶紧杀掉，真没啥后果不后果的，压根没必要想鸡巴太多，好多狗血剧都是坏蛋捉住主角后废话太鸡巴多，然后就狗血了。

别觉得杀个名人能影响走势，俺们心态要平和。任何大人物，你要是把他当狗了，他就是狗。至于俺们嘛，那本来就是狗，怕个屁。俺们从来只认阶级的力量，所谓英雄，无非是自觉顺着阶级力量前行的人而已。英雄，看得清阶级的利益，牢牢地站在阶级的立场上，紧紧地围绕阶级的利益战斗。因此所谓英雄，就是阶级的战士而已。我们承认的英雄，那就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离开阶级的力量，英雄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至于那些看不清阶级利益，站不稳阶级立场的人，也根本不可能逍遥自在，而是会被阶级斗争裹挟进来，盲盲目目，随波逐流，连自己咋个死的，为了啥死的都不知道。



